

李達輝與台灣



李達輝 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李登輝與台灣

李達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李登輝與台灣

編著：李達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ong Kong.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8年1月初版

定價：港幣30元

書號：ISBN 962-226-176-0

目 錄

台灣「總統」李登輝	1
「總統」辦公室	20
李登輝的前半生	25
從台北市長到台灣省府	30
蔣經國聲明與李登輝地位	37
蔣經國身邊接班人	43
李登輝的政治實權	56
李登輝的政治觀點	66
李登輝負責「探親」小組	68
〔附〕台灣當局一項秘密調查	74
李登輝的健康問題	78
李登輝未來角色	85
李登輝父親李金龍	92
曾文惠寫真	95
林洋港不敵「李表哥」？	103
李登輝和教會之間	108
台灣政要的宗教信仰	123
高爾夫球和北京狗	129
李登輝看台灣農業	132
田園之樂——	
李登輝的農政理想	李登輝148
我國未來贏的策略	李登輝156
台灣歷任「副總統」側寫	162
「本土化」政策	174
〔附〕台籍政客一覽表	178
歷任台灣省省政府主席簡表	183

台灣「總統」李登輝

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接任「總統」

1987年8月以後，蔣經國要坐輪椅公開見客。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接任「總統」。

蔣經國走進生命的最後一段！

台灣的接班問題，惹人矚目。

1988年秋天，國民黨中央舉行十三次代表大會。台灣的權威消息紛紛透露，國民黨「十三大」之後，要選任一位新的國民黨副主席，而其熱門人選，正是現任台灣總統李登輝。

1987年3月25日，台灣「副總統」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主持國民黨每週例行的「中央常會」，引起外界的注意和揣測。一般認為，這雖是一項臨時性的權宜安排，但卻體現了一個新的動向。

蔣經國因感冒，接受醫生建議，暫在官邸處理公務，以便稍事休養。過去遇此情況，皆由前「總統」嚴



家淦代理主持中央常會，但因嚴86年中風目前尚在養病，於是，3月18日和25日國民黨兩次中央常會，乃先後由國民黨中常委謝東閔、李登輝代理主持。

國民黨目前中常委前三位的排名，依序是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在嚴家淦未能出席的情況下，中央常會委由謝東閔代理主持。因為謝氏以曾任副總統的經歷，名列於嚴家淦之後，為排名第二位的中常委。

而李登輝副總統以中常委排名第三的地位，在1987年3月25日擔當中央常會的代理主席。據指出，

此舉係考慮到謝東閔已於上週擔任過代理主席，接下來，一方面爲了體現所謂憲政體制的精神，一方面也著眼於領導結構的前瞻取向，因而轉請李登輝代理主持中央常會。

這樣的權宜安排，一說是用以建立黨內實質權力運作結構的憲政化與合理化爲主要瞻望之點。

不止於此，在國民黨中央常會十二人政治革新小組的運作上，也貫徹了國民黨權力結構運作的憲政化與合理化取向。按該專案小組總召集人原爲嚴家淦，其下分爲兩組，第一分組召集人由嚴氏自兼，第二分組召集人則爲黃少谷。後來嚴家淦因中風臥病不能主持，原經安排於第一分組的李登輝，不但因此而代理了第一分組召集人，也再進一步代理了總召集人，成爲目前國民黨中央常會十二人政治革新小組的實際主持人。

李登輝面臨鬥爭

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排名，經過國民黨三中全會的調整，躍居第三，排名在他之前的嚴家淦已長臥病榻，謝東閔只是佔了個虛銜，兩人都已離開權力中心。李登輝在國民黨的地位，排名上既已凌駕黃少谷、袁守謙、俞國華等實權人物，實際上，據一些國民黨高階人士表示他也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唯其如此，三中全會之前，曾盛傳他將出任國民黨副主席，也唯其如此，他在國民黨內絕無可能免於激烈的權力鬥爭。據悉，以黃少谷爲首的保守派對他頗爲排斥，軍方和情治系統以及財經系統的外省籍官員，打從心底都不認同這個「空降部隊」的台籍政客，他們對他只充滿



▲李登輝權力來自蔣經國生前的提拔，蔣經國死後，李登輝接任「總統」，他有能力統管台灣，抑或只是未來的過渡人物呢？

了妒羨之情，能不說他的壞話，就已經不錯了。

最近傳說黃少谷以「李登輝不能兼任行政院長」作為向蔣經國自請退休的條件，黃少谷夠不夠資格向蔣經國「開條件」，固然不無可疑，但是國民黨保守派由於美麗島受刑人分批出獄與黨內外溝通等等情況，不喜歡這名參與對黨外決策而日漸走紅的台籍副總統，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因此，假如國民黨內反對李登輝接班的人獲悉李登輝的健康狀況，黨內的權力鬥爭矛頭或許很快就會對準李登輝。

據權威人士指出，以黃少谷、袁守謙為首的保守勢力，正暗中培植陳履安邁向權力核心，而台籍政客中目前官階最高的李登輝，就成了他們的頭號政敵。

►海內外政界人士對「新總統」李登輝能否順利接蔣經國的班，並不好看。



李登輝在他的副總統職位上，既無法與預黨、政、軍、情治業務，他的「轄區」業務自然只有放在從前的黨外，現在的民進黨上。他雖然還沒有決策權，但必須經常向蔣經國報告民進黨的情況，保守派一方面認定他是未來保守勢力接班的最大阻力，又把對黨外溝通的帳算在他頭上，他們急於鬥倒他，這種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登輝在鬥倒有形政客之前，
必須先戰勝那不可知的無形敵人。**

事實上，李登輝也並未像國民黨保守派想像中為



▼李登輝（前排右一）四十年代在台灣淡水中學與同學合影。

黨外和台灣人做過什麼，包括「放不放人」、「開不開放黨禁」。李登輝只是蒐集黨外的情報，提供蔣經國做決定罷了。但即使是這樣，他已不見容於蠢蠢欲動的保守派與軍方，雙方的鬥爭幾乎一觸即發。

根據了解，李登輝也在從事他「紮根」的工作，也結納了一批專家學者，交好新聞界，支持地方派系，努力建立他的「下游工業」。這麼做，當然也是出於鞏固他現有的地位，為未來的變局打好立足的基礎。不過，他可能也必須像其他的國民黨高官一樣，在鬥倒有形政敵之前，首先必須戰勝那不可知的無形敵人——他那看來完好，其實充滿危機的健康。

1988年，在台灣局勢大轉變的關鍵中，國民黨老人的健康問題尤其令人關注，台灣的命運是在改革之聲中獲得新機，抑是在老人的死亡中取得重生？這是海內外所關注着的問題。

70年代時，李登輝並不怎麼受人注意。他從主政台北兩年，到接掌台灣省府主席，推動「八萬農業大軍」遭遇挫折，他的能力並未獲得褒揚；但自1984年2月蔣經國提名他為副手，隨即在三月高票當選「副總統」，李登輝最近四年來，才開始受到外界較多的注意。

雖然李登輝未曾參與過台灣任何基層選舉，他的崛起，完全緣於蔣經國的賞識拔擢，但任何一個位居要津的政治人物，能身處權力最高層，尤其在一個傳統權威型態的權力中心，能有所作為並知所進退，扮演適當的角色，誠非易事。李登輝自接任「副總統」以來，協助蔣經國匡輔內外政務，也非簡單，這位富傳奇色彩的農經專家，在短暫的十五年內地位一直躍升，雖非全憑機緣，可也是異數。

李登輝的學業成果

李登輝的學業成果，除了憑一股傻勁外，還有其堅韌的毅力，這種毅力，也表現在他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上。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期間，美國大學對聖誕節的同學晚會活動一向重視，每到耶穌誕節日每個學生均將自己看家本領托出來，期望達到突出的表現而爭取聲譽。來自台灣的李登輝，那時亦不動聲色的暗中勤習小提琴。耶誕當晚，當瘦高身材的李登輝，站在晚會台上，奏演動聽的小提琴時，台下聽眾均以驚奇眼光注視之。一曲完畢，博得滿堂掌聲，由此大家始知道他對音樂的精湛造詣。後來同學發現這位能拉小提琴的中國同學，還會做可口的牛排。作為同學中的老大哥，他不能太過封閉，尤其是和同是台灣來的同學交往，於是他學會做牛排，以便假日或年節，邀集中國的留學生到寓所，自己下廚烹飪，既可增進情感，又能為大家加「營養」。久而久之，李登輝的寓所就成了免費牛排店。

完成康乃爾大學的深造後，李登輝返回台灣「農復會」，專心撰寫研究報告，對台灣農業現況提出許多建議。

受到蔣經國注意

五〇年代台灣主導農業建設和政策的有兩個單位，台灣省政府方面是「農林廳」，國民黨「中央」當局方面是「農復會」，「農復會」是在美援之下所成立的政策主持和技術協助單位。早年李登輝曾在台灣省「農林廳」供職，獲得博士學位返台灣後，李登輝到「農復

會」擔任組長，開始他與台灣政治緊密結合的新階段。這時，台灣社會正由傳統農業轉型為密集的基礎型工業，農業在強大工業化趨勢下，逐漸受到輕視，李登輝所屬的「農復會」內專家羣，是當時振興台灣農業的一支力量。



▲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頒農經博士後在校園所攝。

昔年，居住在台灣的居民，包括講閩南語的及講客家話的下層農民，一般都十分樸素，日未出而作，日已落仍不息，吃的是地瓜（蕃薯）或地瓜絲加少許米的稀飯，佐飯的是菜脯（蘿蔔乾）和鹹菜，鮮少能吃魚肉。所以，每逢祭神的「大拜拜」，莫不「傾家蕩產」的輪番請客，「大塊的肉，大碗的酒」休息一番。

據統計，在1986年，台灣省（不含台北市、高雄市兩個「院轄市」）的就業人口六百三十一萬中，從事農業、林業、漁業、牧業及狩獵業者為一百二十七萬七千人，其中「專業農家」祇有八萬多戶。今日台灣農家多屬小家庭，平均每戶四點多人，農戶中，真正耕作者平均每戶一至二名，估計「專業農民」如今祇有十多二十萬人。

在農地、農人都逐漸減少的趨勢下，今日台灣却連連出現「穀賤傷農」的現象，給台灣政府帶來「頭痛問題」——國民黨政府以「保障價」收購農作物後再降價售出。

最近十五年來國民黨核心 「中常委」的「本土化」趨勢表

全會屆次	召開時間	中常委 人 數	台 籍 人 數	台 籍 比 例
十屆四中全會	1973. 13	21	3	14%
十一屆一中全會	1976. 11	22	4	18%
十一屆四中全會	1979. 12	27	9	33%
十二屆一中全會	1981. 4	27	9	33%
十二屆二中全會	1984. 2	31	12	39%
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6. 3	31	14	45%

博士論文獲選全美優等獎

就個人的基本性格言，李登輝是一個實事求是、不露鋒芒而默默耕耘的人。1968年7月以前，他在台灣政界，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直到他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台灣個案研究》被列為優等之後，台島內的報紙上才首次出現了李登輝博士的名字，那是1968年7月13日的事。翌年，1969年8月20日，美國農業經濟協會宣佈，台灣農復會農業經濟專家李登輝，成為該會1968年全美論文之得獎人。

康乃爾大學經濟系主任史丹登在致李登輝的一封信中表示，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研究的數年中，不僅其個人增進了對經濟學的瞭解，且能以其對經濟學文獻所作之努力與貢獻，而使其他經濟學者受益良多。

李登輝獲獎的論文厚達四百頁，題目全文是《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這篇論文研究台灣自1895年至1960年農業的轉型及互動。論文的結論是：台灣農業在不久的將來，勞動力、土地、資源、生產等都將臻於極限，農業促進工業已至「功成身退」的地步，相反地，已到了「工業回饋農業」的時代。

走在農業實務與學術界之間

李登輝在1969年暑夏之後，開始成為島內學人，他花了十年心血凝鑄的論文，成為他成功的里程碑，國民黨政府上層開始注意到他，促成他從政的第一步。

民國12年（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是台灣台北縣三芝鄉人，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肄業，擔任過台灣大學助教、兼任講師、副教授及教授，曾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研究，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後，返台灣任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技士及股長，台灣省合作金庫研究員、輔導員、農復會技正、農業經濟組長及顧問，在經過近30年學術工作之後，李登輝終於邁入國民黨的政壇。

李登輝的人生歷程有兩條軌跡可循，早期主線在農林廳、農復會，當他於1972年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後，才算在國民黨高層政壇正式起步，起步後，步伐大了。軌跡副線在台大校園，由助教而至教授，並在國外獲得學位。這兩條軌跡相輔相成，奠定他的地位。

李登輝個人的形象，適於從事學術研究，而在台灣重鄉土、輕官僚氣息的政界，意外的又適於從政。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沒有官架子，更沒有學者的士大夫迂腐架子；生活上，他酷愛音樂，可以表演小提琴，並可即席率眾引吭高歌。

協助徐慶鐘推動農政

在仕途上，他一直避免大露鋒芒，他是當年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同時為台灣農經專家的徐慶鐘的得意門生。但是，李登輝沒有攀緣致仕，反而用了卅年的時光，在台灣大學任教，成為受歡迎的教師。

倒是，當年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出自「崔台青」政策和鞏固統治的打算，在李登輝事前一無所知的情形下，將這位容易控制，沒有基礎的人物援引至內閣，這才使他步入仕途。

他是1948年自台大農業經濟學系畢業，這是光復後台大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服務當助教及講師，1952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經濟學一年，翌年回台。

1953年，當李登輝由美回台之後，台島內有兩個工作等着他，一是月薪二百美金的農復會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幣五百元的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當時，美金與台幣是四十比一的兌率，二百美元與五百台幣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可是李登輝却選擇了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因為他的老師，台大農經學教授徐慶鐘，當時任農林廳長，他聽老師的召喚，捨去名利，毅然從事。

獲蔣經國提拔進入內閣

從1953年到1957年的股長生涯，生活不算好，據說，他連太太的結婚戒指都變成了生活補助款，這是李家難忘的日子。

1972年蔣經國組閣接班，李登輝意外的受到拔擢，出任蔣內閣的政務委員，李登輝此次入閣，有其內在原因。

做為一個農業經濟學人，李登輝對台灣農業問題之研究心得與成就，幾乎不作第二人想。在他出任內閣閣員參與農業決策之前，他一方面為台灣農業的將來動向提出了發展藍圖，另一方面在刊物及學術研究上，針對農政缺失，痛加針砭；他有批評，有建議，言之有物，為蔣經國所賞識，才由蔣經國延攬為內閣閣員。

李登輝在1972年6月2日返台灣就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新職，當台北政府發佈延聘他入閣的消息時，他

正在新西蘭參加一項會議，事先對自己的新任務毫無所悉。那一年，台灣「行政院」改組後的「政務委員」及各部會部長名單中，年齡四十九歲的李登輝是當時最「年輕」的一位閣員。

李登輝這位農業經濟專家，在擔任國民黨政府「政務委員」之前一、二年，即已不斷發表他對當前農業現代化的理論與看法。他認為，當前台灣的農業現代化，在於由勞力的集約而演變成資本集約，所以資本對農業現代化的促進，為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他就任政務委員之前，「行政院」所核定的農會信用部納入金融機構的正式系統方案，就是李登輝所極力促成的。

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後，他據台灣政府於1969年核定的政策綱要，及國民黨十屆二中全會通過的《現階段農村建設綱領》，而加變通。這些綱領的要點，即是「謀求增進土地利用，提高農民所得」、「保障農民利益，改善農民生活」以促進農業現代化。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台北市長

「政務委員」之後，他再次晉級，擔任台北市長及台灣省府主席，都有其風格與作為。李登輝的學術工夫靠的是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的毅力耐力，他在國民黨政壇上崛起，亦歸功於肯用心、有果斷、講條理。

李登輝的才具，不侷限於農業方面，在他「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後半任內，蔣經國已把專技及職訓小組的任務交給他，由於他處事講條理、合邏輯，使小組的協調與決策工作頗順利。

1978年6月1日，「行政院」內定通過李登輝出任台北市長，這是蔣經國初次就任「總統」數天之後的第一

宗重要人事派任案。

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之後，成為執掌台北實際行政工作的地方頭頭。隨後，他繼林洋港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他要求台灣省政建設是一整體的建設，各單位相互協調，絕不能各單位單向進行，一定要有團隊精神。他所要求的省政施為，基於對省民服務的基本立場，超越人事運作的可能障礙。

痛喪獨子

雖然李登輝個人深知宦途風險，力求避免自我標榜，但是，自從踏上政界之後，他就身不由己了。他個人表現，不論是他的家庭及他對公務的處理，都有不少時候被公開披露。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彈得一手好鋼琴，李登輝酷愛小提琴，子女耳濡目染受薰陶，也都有這方面才氣。

李登輝在公開場合，永遠是笑口常開，但是在內心底處，也有創痛的一面。李登輝的獨子李憲文，不幸於1983年，在他讀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時，罹絕症去世，使李登輝內心受到無比的創痛。

以往李憲文在報章上發表過不少文章，從其筆觸所述，不難看出他們家庭的情況。

李登輝早年未當高官前，其夫人曾開班教授花道，那時候，李太太當講師，先生則在公餘之暇為太座抄刻鋼板講義，他的長子李憲文，當年是一個小朋友，也不閒着，就在學員當中，忙着替他母親發講義，這克勤克儉努力奮發的天倫圖，可一去不復返了。

與李登輝感情最好的獨子李憲文，自小就與父親無話不談，兩人還是棒球的球友，李憲文曾說過，他

「一直要成爲父親最好的球伴及朋友」。到了1982年底，李憲文病篤，李登輝爲了祈求愛子病體早癒，又爲了要撫養孫女長大成人，私自立下心願，將多年的煙癮一夕戒掉，愛心深重，莫此爲甚。

後來，李憲文終於逝世了，思念愛子，令李登輝傷痛欲絕。

李登輝的從政入格

李登輝的謙謹聽話的人格，與及沒有實力基礎，是蔣經國賞識的主因。在他就任台北市長之初，就要求市府所有員工把「誠」、「公」、「廉」、「能」四個字作爲工作的基本態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加速市政發展。李登輝特別以身作則，力求廉潔。

在他就任台北市長之初，辭去了一切合法的兼職，他辭去了農復會的高薪兼職以及教席，以求專心致志。到了他任職台北市長整三年後，他辭謝了薪水以外的一切合法給付，如研究費、車馬費等。

在施政上，李登輝是一個苦幹用心的務實主義者，當年在他就任台北市長之初，台北市中山北路白晝間上下班之際，交通形成阻塞的瓶頸，一般車輛視爲畏途。李登輝爲了解決此一交通問題，乃在家中用筷子擺方陣，類似中山北路街道陣勢，用心思索，終於想出了「中山北路禁止左轉」的方法，使交通狀況稍有改觀。

幾年前，台北市外雙溪水廠，突如其來地放水，造成在溪中遊玩的女學生多人淹死。他事後便說：「那種危險的地方，最好不去玩。」不料，他這句「因噎廢食」的話句，卻引起很多人誤解。



▲李登輝任台北市市長時的
全家合照。

◀ 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時攝。



也有清新可愛的一面

在台灣省主席任內，他有一次要求台灣省府官員，要以開百貨公司的心態，經辦公務。他說，如果你的百貨公司服務不週，大家都不會上門。不意，這句話又使得有些人對他責難，引來不少怨聲。

1984年2月15日，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他為台灣「副總統」候選人，3月23日成為「副總統」，在兩次會議閉幕的餐會上，李登輝都坐在蔣經國之側，只見他神情緊張，似乎連手應該放在何處都不知所措，照說他久經政場，應該應付裕如，由此可見他將來未必能應付複雜的風雲變幻。

「總統」辦公室

三個階段

李登輝從在學院以至從政，其間的歷程主要可分成三階段：

- ①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
- ②以學者身份從政及擔任國民黨高官。
- ③出任副總統。

這三個階段性質迥然不同，工作也各異其趣，對他來說，自然是都有其不同的經驗與做法，也各有其不同的感受了。在擔任教學研究工作期間，他想做的是提高個人學術地位，幫助農民改善技術，增加收入；一方面深研方法論，並從事農村一般經濟問題的實證分析，另一方面探討國家經濟建設的策略，研究建立其模型，李登輝說：「在這期間，我從未有過從政的念頭。」

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曾擔任過臺北縣「議員」，

他對政治的感受，就是吵吵鬧鬧的；而且，從大學畢業後，他雖是國民黨人，但對政治興趣不大，加以李夫人也很反對他從政，當時，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做好學術研究工作，成爲一個一流學者。

步入政界，是極爲偶然的。1972年，蔣經國延攬李登輝出任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這是李登輝人生的一大轉變，也是他轉而從政的關鍵，他所面臨的，是一個涵蓋層面更爲廣泛的工作。因此，他要求自己完全投入、真正獻身，希望做一個很好的協助者。及至出任臺北市市長、臺灣省政府主席，他更必須面對許多現實問題，要在現實與理想間，尋求達成創造與增進民衆福祉的最佳途徑。李登輝認爲，在這階段中，他所受的專業科學訓練，給了他相當大的幫助。

「副總統」辦公室像個大教授的辦公室

擔任了六年「政務委員」及六年台灣地方行政首長後，李登輝任內的施政績效及特質，爲國民黨當局所認同與肯定。進入國民黨政治高層後，他更對島內外政經情勢有深入的鑽研，對台灣當前整體施政的取向，也有獨到見解。在他就任「副總統」後，他曾說過：「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學習與瞭解重於工作的發揮。」「我對自己的角色期許是，必須切實體認當前國家的內外處境，同時應當體會元首的辛勞，時時以如何盡忠輔弼爲念。」

任何人初踏入李登輝的「副總統」辦公室時，都會以爲置身一位大牌教授的研究室。在他辦公桌旁的兩面牆壁，分別是高過一個人身高的大書櫥，裏面滿滿都是中外文書籍、期刊、資料。

李登輝認爲，他對國之大政還是新手，因此學習

與瞭解重於工作的發揮，尤其要善盡協助蔣經國的重責大任，不能不研究大政方針；從台灣省主席晉升為「副總統」，他自稱不能不將視野拉得更遠、提得更高；而要堅定信仰，確立更深刻的人生觀，不能不潛修性靈、澄清思慮。因此，李登輝要關切現時政務、當前社會發展、最近經濟情勢，並且也要廣泛涉獵哲學理論。

卷宗和圖表

每當與他晤談，談到特定的問題時，李登輝都會拿出卷宗和圖表，卷宗內的英日文資料滿是自己的紅筆圈點與眉批。譬如談到「經革會」的成立與彰濱工業區的問題時，他會站起身來隨手往書架拿起來一疊厚厚的資料與剪報，都畫滿了紅筆，寫滿了文字。談到投資意願、中共經濟改革、對日關係、教育問題時，都各有各的資料，訪客從他起身往書架一拿的那種熟悉的動作，那種毫未加思索即知道資料在那裏的熟練表現，令人不得不相信他是如何地用功，如何地專注研究問題了！

李登輝和蔣經國之間

據了解，自李登輝就任台灣「副總統」以來，蔣經國健康情況許可時，每週要與他談話多次，對於若干政策性問題，也經常邀請李登輝到「總統辦公室」面商。有時，蔣經國也指示李登輝對若干政策與施政，作必要的研究與協調。研商中，李登輝會將他的研究與心得向蔣經國做報告與建言，這些報告與建言，常被蔣經國所採納。

李登輝聲稱：「蔣『總統』從『行政院長』時代，即對我非常的愛護，他對我的知己重用，我實在非常感激，我早已決定竭盡我所能，為國家、為元首，作無限的奉獻與協助。」

李登輝說：「我從來沒有從政的念頭，我只專心一致地專在學術研究工作，心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旁騖，我特別重視方法論與理論的建立，最大的希望是使自己成爲國內，乃至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者。」

李登輝做學問，絕非象牙塔式的，他經常對農村及一般經濟問題進行實證分析，一方面也對經濟建設的模型與策略進行探討。他的著重方法論與理論訓練，主要是用來進一步的切實認識問題、歸納問題，形成有價值的學術原則。

沒有「專家政治」這回事

他這種做學問的專注態度，也用於施政上，但行政工作與學術研究不盡相同，特別是行政長官與學院生活更大有差別。李登輝說：「行政工作很實際、瑣碎，但也很高深、很微妙，主要是要講究協調，不能一個人高高在上，要面對問題，一切要從實際出發，要盡量爲民衆的福祉著想。」在行政體系運作上，他強調說服、溝通與協調這些政治運作上的基本特質，他將這些體驗歸功於其在臺北市長及臺灣省主席任內的施政經驗。

對於時下流行的「專家政治」，李登輝肯定的說：「沒有專家政治！」擁有康乃爾大學博士的李登輝，以學人從政典型，現身說法表示，沒有所謂「專家政治」。他解釋：「政治就是要溝通協調、要面對衆人、要面對很實際的問題，不像學術工作，只要嚴格自我要求

即可。」

對於現在海峽兩岸經常討論到的政府與民衆的溝通對話及認同問題，李登輝強調，一個受人尊敬與愛戴的政府，應該是一個能在旺盛政治力中維持和諧的政府。他認為，要維持和諧，要政策切實可行，要達成施政目標，政府官員要學習老百姓，也要領導老百姓；這樣，政府才能誘導旺盛的政治力，才能疏導旺盛的政治力，也才能主導旺盛的政治力。他特別提示，政府官員要極有耐心，要不憚其煩，這就是民主政治。

李登輝的前半生

李登輝的童年

李登輝生於台灣省台北縣淡水的小鎮三芝，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代，三芝雖然稱鄉，只不過是一個僻隅聚落而已。當地居民從事農耕和漁業，生活多半清苦，李登輝的家庭當然也是這樣。李登輝家中以農為業，父親在日據時代做過時間不長的日本刑警，其後以農為生。

孩提時代的李登輝，是學校的好學生和三芝鄉的好孩子，這個「經常拖着鼻涕」，臉型削長、沉默寡言的小孩，除了偶而參與農作外，最大的興趣便是翻書本。在農村，有這麼一位不必大人操心的孩子，李登輝的父母，頗引以自豪，也樂得省心。

從師大到帝大

中國俗話有言：「寒門出孝子」，家境狀況並不甚佳的李登輝，當年勤學是自發性的，他並不知道將來的前景如何，只覺得讀書終究是件好事；十八歲那年，李登輝考入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的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1945年台灣光復後，轉回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深造。在台灣大學求學期間，功課一直名列前茅。他在大學讀書期間，二次大戰戰火紛飛，中國大陸也飽受日本侵略軍蹂躪，台灣因被日本佔領，位處前線，也捲入戰爭邊緣。

李登輝的大學生涯，家中貼補不多，一直半工半讀，經常爲了多買兩本好書，必須樽節生活開銷，而以饅頭和白開水來果腹，這種日子延續了四年之久。

娶富紳之女曾文惠

1948年大學畢業後，李登輝留在台灣大學校內擔任助教，繼續他校園的生活。不久，李登輝娶了出身同鄉富紳地主之家的曾文惠爲妻。1952年考上公費留學，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仍主修農業經濟。1953年返回台灣，先在台灣農林廳任技佐，並在台大當講師。

李登輝的專長是農業和農政，他出身農家，對農林生活體驗深刻，對農業問題也洞悉入微。

他雖是一個最基層農業推動者，但學院的生活無法阻隔他求知、求好的心。他有心再深造，家中妻子也鼓勵他，甚至以陪嫁過來的積蓄貼補家用，爲的是讓他能不致被生活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在家中子女

漸多之後，妻子以教插花賺些外快，李登輝幫着寫講義，孩子則在母親教課時幫忙發講義，這一幅勤勞奮勉的家庭和樂圖，使李登輝的工作和教職上頗有進展。1957年他任台灣合作金庫研究員，稍後進入「農復會」擔任技正，在學校也由講師、副教授，而升到教授之職，不過台灣教書的收入較諸美國和香港，是相差甚遠。

在台大執教期間，李登輝對勤奮的後進學生，愛護有加，據說他不但傾所知相授，有時還將所領薪津傾囊資助；當時在台大校園，不識者頗不易察知，這個沉默木訥、國民黨籍的教授是一個眼冷心熱的未來政壇明星。

1965年，李登輝四十二歲時，作了一個重大決定，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這時他深感所學不足，爲了充實自己，考取美國洛克斐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隻身遠渡重洋，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農業博士學位。

在康乃爾大學教室裏，他與比他年輕許多的同學一同聽課、記筆記、寫作業、參加考試；這種生活上截然的改變，實非常人所易適應，但沈靜研究，等待時機，這是李登輝性格的特徵。每當假期，其他同學成羣結伴離校旅遊時，這個「老學生」爲賺取生活費和學費，經常孤獨地在校園內打工，整理校園。他必須將學業弄好，也要生活不虞匱乏，此時他無法照顧台灣的家人子女，至少，也不能要妻子和稚齡子女來負擔他求學的生活費用。

李登輝當年願望是當牧師

李登輝最爲蔣經國所放心的是，他看起來好像沒

有太大的政治野心，當局對他的顧慮較少，這和李登輝個人的人生哲學有關。他曾說，他一生最大的願望是當個牧師，政治並非他所好。他與人交談，表面語氣誠摯，好像不善外交辭令，任何人都會感覺他的穩實可靠、沒有陰謀和野心。1983年，他的獨子李憲文不幸英年早逝，給李登輝的打擊很大，他對名利似乎變得更加淡泊，信主更爲虔敬，這點表象，頗爲當局所信任，益增其政治資本。

沒有派系或實力

甚者，李登輝在背景上並沒強大靠山，在島內沒有黨政班子勢力，不拉幫結黨，不搞小圈圈，不屬任何地方政治勢力。可以想見，未來幾年，也暫時難於建立其個人派系。

台籍政客三大派系

在台灣，台籍政治人物素有三大派系：

一是「鹽水幫」，以已故台灣省「議長」黃朝琴爲首腦（黃朝琴的家鄉在台南鹽水），靠姻親關係，結成台灣政壇上一大勢力，此幫派的主要成員有張豐緒、戴炎輝、陳奇祿、高育仁等人。

二是「二水幫」（或稱「彰化幫」），以謝東閔爲領導人，靠地緣關係，造成國民黨政壇上的一股力量，主要成員有陳時英、趙守博、謝生富等人，現時除趙守博外，其它頗有沒落之感。

三是獨立的技術官僚型政客，沒有明顯派系，以財力和專業技術爲當局所信任，早期如徐慶鐘、李連

春、林金生，現在如邱創煥、吳伯雄等人皆是，李登輝亦可屬這一類型。

對李登輝來說，他的另一項有利因素是，他在政壇上沒有太明顯的敵人，位高而不大爲人忌，許多國民黨黨國元老和黨政要員，對李登輝都頗有好感，不似李煥、郝柏村、林洋港般，「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無論從國際形象、省籍考量和在台灣當權核心的處應，在權力的天平上考量，如欲政通人和，避免派系勢力爭伐，或建立穩健的政治環境，已故的蔣經國選擇李登輝，都有其當然與應然的條件，這是李登輝能脫穎而出的主因。

從台北市長到台灣省府

瞭解問題就要「跳下水」

1978年6月，台灣新內閣組成，由工程師出身的孫運璿出任「行政院長」，同時，台灣省新的省市行政首長人事命令亦公開發佈，李登輝繼林洋港之後，接任台北市市長，這是他政治生命轉入新階段的契機，也是他展現政治性格，踏進國民黨核心的開端。

李登輝在就任之初，謙稱自己是張「白紙」，這是他潛藏不露的長處，但謙虛的本性卻使他頗獲一些人的好感。

他當時曾說，蔣經國告訴他，要瞭解問題就要「跳下水」，他此時正以「跳下水」的心情和市民共同辦市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宣佈他的主持市政原則：要用科學方法、講效率，他鼓勵所屬「小處着手，大處着眼」。為延續蔣經國內閣時期的革新措施，在上任時他要求台北市市府人員建立「誠、公、

台北市歷屆（任）市長

省轄市時期

- 第一屆 吳三連（1951年2月1日至1954年6月1日）
第二屆 高玉樹（1954年6月2日至1957年6月1日）
第三屆 黃啓瑞（1957年6月2日至1960年6月1日）
第四屆 黃啓瑞（1960年6月2日至1961年8月停職）
（代理）周百鍊（1961年8月22日至1963年12月4日）
（復職）黃啓瑞（1963年12月5日至1964年6月1日）
第五屆 高玉樹（1964年6月2日至1967年6月30日）

「院轄市」時期

- 第一任 高玉樹（1967年7月1日至1972年6月10日）
第二任 張豐緒（1972年6月11日至1976年6月10日）
第三任 林洋港（1976年6月11日至1978年12月3日）
第四任 李登輝（1978年6月9日至1981年12月3日）
第五任 邵恩新（1981年12月4日至1982年4月18日）
第六任 楊金櫟（1982年4月19日至1985年5月29日）
第七任 許水德（1985年5月30日迄今）

廉、能」的政治情操。

建立「李登輝風格」

就任第一年，李登輝還在摸索，第二年後，「李登輝風格」開始建立；他將實用主義重實踐的個性用在關切台北市政上。1979年8月22日，台北由於颱風帶來豪雨，水源區青潭堰攔水堤有崩塌之虞，當晚他與守堰搶修部隊夜宿青潭堰。為解決台北市中山北路交通不暢形成車輛畏途的問題，他在餐間用筷子排陣研究，終於想出白日禁止左轉的辦法，解決了多年無法解決的問題。雖然台北市交通之麻煩及混亂，至今依然改善不大，仍也總算有點改進。

推動台北音樂季

為了推動台北音樂季，他與台灣藝術界人士共同研商台北市的藝術活動，期使台北確實成為有內涵的都市。為帶頭其事，他與聲樂家吳文修商討節目，答應將為歌德作品《浮士德》提供中譯，隨後劍及履及，閒暇時即埋首案頭，至1981年12月11日，在台北上演的《浮士德》劇，在多年未有中譯後，這次終於有了中譯，而這就是李登輝譯的。

雖然作了台北市市長，心態上仍然平穩，上任甫一年時，他曾回答記者問時說，將來台北市市長卸任後，希望能當里長。

公子小姐的婚事不為人知

1979年5月，他的公子李憲文與張月雲結婚。

1980年3月，李登輝長女李安娜與「榮總」外科醫師黃循武結婚，除了少數近親外，兩次婚事都是在秘密下完成的，市府幾乎無人知曉，這在特權盛行，貪污成風的台灣是罕見的。

當時他和市民一樣排隊捐血，座車違規，照樣從私人荷包中拿錢繳納。

1980年1月19日，有記者問他說，曾在交通裁決所看到十多張市長的座車罰單，拿去的人希望免罰，這揭露曾使他當場惱怒，「是誰拿去的？李登輝是有人格的，絕不可能做這種事！請提出證明來，否則對不起，我絕不承認！」他公開這樣說。

他上任台北市市長不久，即辭掉「農發會」職務和台灣大學教席，並定下時間表，三年內辭領一切支給。1981年5月21日走馬上任三年後，依諾而行，當天寫手諭交「市長室」參事，言明不再領研究費、車馬費等一切支給。就國民黨一般官員來說，通常不會拘泥這種小事，也不會將這類事放在心中，對他而言，他卻是有所待。

在台北市長任上，李登輝凡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對於一些當尊重之特權人士，他小心翼翼，恭謹謙順，未曾稍有放肆之處，在為政上，他力求政績平坦持穩。他非政場老手，就任市長三年絲毫未染政圈的權術，這種謙謹的個性適合蔣經國所願，終於使他更上一層。1981年10月，台灣政府首長職位「大搬風」，李登輝獲圈選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他的再次獲得蔣經國擢升，當時引起台灣政壇再次震撼；在他即將出任台灣省主席前，在參加台北市政府的惜別會中，他引用浮士德的話說：「用無比愛心和最堅韌的努力，為別人做更多的事。」1981年12月初，他在就任台灣省主席以後，曾經以「和尚削肉餵鷹」的故事，

向省府國民黨官僚強調犧牲奉獻的精神，話中顯然是有所針對。

言談多次惹風波

就任台灣省主席後，李登輝的政治生命轉入另一階段，他就任之初，爲了言談之誤，曾引起一度風波；1981年12月15日，他與台灣九個縣市長舉行座談會中曾這樣告訴縣市長，用餐不必浪費，二十元台幣的便當即可，當時曾引來「不解民生疾苦」之譏，可能因李登輝有特權，飲宴成風，吃飯不用付錢，故不知飯盒之貴。但這場風波很快就過去。

引用蔣經國慣常的譬喻

當年年底，李登輝提出第一個響亮的口號「八行書時代已過了！」隨後他對全省公務員的一段講話，曾引述兩個小學生爲桃園機場搬石頭的故事，再度強調犧牲的精神。這種故事，投其所好，是蔣經國在行政院長任內所喜歡的譬喻方式。

李登輝從政並無手腕，但是他的政績一直坦蕩。他曾經一再的強調，希望將來公務員退休以後去鄉下的地方當牧師，或在山地傳教。他同時對台大學生專題演講中宣稱，他不怕事，不怕累、不怕丟官，只希望將事情做好。他並曾在台灣省府提出一個口號，「要出自己的醜」；他表示要將全省最髒的地方由省府拍成紀錄片，在全省放映，將省府自己沒做好的事揭露出來。

外表隨和溫文的李登輝，和孫運璿維持良好的關

係，而國民黨黨政元老如嚴家淦、黃少谷、谷正綱等人，對這位國民黨農經學者也頗讚佩。在各種條件的配合及各方的氣氛烘托之下，1984年2月，李登輝以黑馬姿態一躍而獲國民黨蔣經國提名做台灣「副總統」候選人，成為蔣經國的新一任的「副總統」。

1984年3月21日，蔣經國以一千零一十二票，99.2%的得票比例，當選第七任「總統」。隔天，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李登輝以八百七十三票，87.3%的比例當選副總統；於是，1984年「總統」選舉體制轉換的過程於茲完成。

在當時「蔣李體制」之下，人們從台灣的政治面貌，從人事遞嬗的軌跡追索，不難看出蔣經國微妙的政策下對當時局勢的估計。在當時人事變動中，「國防部長」宋長志（現任台灣駐巴拿馬「大使」）維持原職，「參謀總長」郝柏村亦續掌軍令，顯示國民黨軍方系統在現階段不因內閣人事更迭而有所轉移，朱撫松的「外交部長」之職，在盱衡全局之後也未遷動，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長期主持外交決策的沈昌煥，認為朱撫松沉穩可靠，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最高當局並無意藉由俞國華組閣的時機，大幅調整對外政策。財經、軍事、外交這三大系統的人事底定之後，整個政治結構不因這次內閣改組而產生實質的改變，一切是以「不變應萬變」。而突破性的安排，只是迫於形勢，延至三年後的1987年間才突然急急進行。



表一：國民黨在台灣歷屆中央委員及中常委增加表

屆 別	召開時間	中央委員數目	中常委數目
七屆一中全會	1952. 10	32	10
八屆一中全會	1957. 10	50	15
九屆一中全會	1963. 11	74	15
九屆二中全會	1964. 11	74	17
九屆五中全會	1967. 11	74	21
十屆一中全會	1969. 4	99	21
十一屆一中全會	1976. 11	130	22
十一屆四中全會	1979. 12	130	27
十二屆一中全會	1981. 4	150	27
十二屆二中全會	1984. 2	150	31
十二屆三中全會	1986. 3	150	31

蔣經國聲明與 李登輝地位

蔣經國對權力繼承的聲明

1985年，在「十信案」、「江南案」之後，台灣充滿政經危機，在國外傳言蔣氏家族將繼續接掌政權之時，蔣經國於1985年8月16日，在台北「總統府」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香港分社主任杜拉·波頓的專訪，談到台灣未來權力接班問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蔣經國公開表示，「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此言一出，內外聳動，政界人士普遍認為這是蔣經國主控台灣政局以來，最敏感也最明確的一次政治性宣告，甚至是有關權力繼承問題一次戲劇性的聲明。

蔣經國發表這項聲明，充分暴露出他早已知悉海內外關心台灣政情的人士，對於權力接班問題大多感到好奇和焦慮。再者，他對於民間之恐懼、疑慮和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應有所回應。因此他苦苦思量、

權衡輕重後，直接針對傳言揣測作出迴響，表明了不以自己家屬為台灣政權遞補的對象的底牌。這種公開討論自己繼承問題的坦率態度，給國內外及國際政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過去長期以來，有關國民黨最高當局權力接班的討論，是長期被視為禁忌的。

然而，蔣經國在聲明中，重申「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憲法」之有關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將來「國家元首」，亦當如此，「所以總統職位之繼承，並無任何問題存在。」只是向外國記者闡釋了台灣「元首」產生的程序，而並沒有觸及政治實權的遞嬗問題，更沒有暗示誰將是繼他之後，領導未來台灣政局的合適人物。而眾所週知，在像當前台灣這樣微妙而複雜的政治結構中，政治上的「名位」與「實權」之間，並不完全疊合一致。事實上，擁有「名位」的枱面人物，未必能夠握持「實權」，而掌握「實權」的政治人物，想要進一步取得「名位」却並不困難。

掌握權力的形式和實質

不少人皆在猜測，究竟蔣經國心中，屬意何人承接他的政治志業與政治實權？當然，幾乎每一個稍具政治常識的人都能理解，在時機尚未成熟之前，蔣經國不可能輕易透露這一謎底。然而，政治實權領袖的產生，既需要相當長期的歷練時間，又需要權力核心中人的共識默契。以蔣經國本人而言，他培植經營台灣第一強人的實力和聲望，歷時二十多年早在蔣介石去世之前十年左右，即1965年，由於另一具有接班條件的政治強人陳誠早逝，他即已經成為不作第二人想的當然接班人選。蔣介石細心而審慎地轉移權力予

他，他也穩固而自然地與國民黨黨、政、軍高層權力結構圈，建立不容搖撼的統御與效忠關係，終於使台灣整個政治圈內，均早已明白體會到權力接班的大勢所趨。證諸蔣介石逝世之時，上下安堵，以承襲「名位」的嚴家淦為形式領袖，以擁有「實權」的蔣經國為權力中心一事，即可知完成一次順利的政權轉移過程的曲折艱辛。

由這一歷史經驗來看，在政治環鏡盤根錯節的今日台灣，政治實權人物的產生，至少需要三個條件：

其一，原先政治強人（首先是蔣經國）的屬意與授權；

其二，接班者本身的聲望、能力、與歷練；

其三，高層權力結構中人的默契與輸誠。

而當前的台灣，顯然尚未出現符合以上條件的唯一強人，更不消說三個條件全部符合的人物了，此所以蔣經國在三年前（1985年）答覆有關權力繼承的問題時，只談形式與理論的一面，而保留實質與具體的一面。

突出李登輝的地位

但蔣經國當時的宣示仍有不可忽視的政治意義，那就是確定了李登輝在現階段台灣政治結構中的突出地位。

蔣經國本人既然不另外明確示意授予政治實權的對象，事實上即等於無言地指述了兩項判斷：

一、蔣經國當時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足以勝任煩劇，因此尚沒有專門安排政治實權接班的必要。在答覆記者詢問後不久，他即安排進入「榮總」接受眼科

手術，並且在一週內即出院，復行視事，可見蔣經國對自己健康判斷，十分具有把握。雖然他在1987年秋健康逐步惡化，要坐輪椅公開見客，卻仍苦苦支撐。

二、依據「憲法」規定，「總統」一旦因故缺位，「副總統」為當然接替人選，蔣經國於此時強調「憲政」秩序，無異暗示他對李登輝就任「副總統」以來的各種表現，相當滿意，認為在現行的多元權威結構支撐下，李登輝未始沒有承襲政治「名位」的可能。

李登輝在蔣經國體制中角色突出，亦不無原因：

①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可賦予國民黨政府「台灣人治台灣」的形象，有助於台灣人民對國民黨領導中樞的支持與向心。

②他的政治資歷不完整，政治實力不雄厚，對最高當局的實權無損，對蔣家利益不反叛，對現有權力核心的秩序與運行無擾，且可使未來權力移轉過程在暗處順利進行，而不致被從中阻梗。

③他在台灣「憲法」職位上的接班，可以緩合權力核心人士對最高法定職權的爭奪，使得政治接班引起的權力鬥爭不致表面化。

④他的形象與社會聲望，有助於未來領導班子建立地位與權威，順利取得「合法性」與妥當性。

⑤他無野心，可以維繫領導中心的平衡與和諧，必要時尚可發揮調和鼎鼐的作用。

排除家族和軍人干政的可能

蔣經國為了堅持其家人不會繼承權力的諾言和緩解「暗殺江南案」後的壓力，減輕反對派的影響，在1986年中將自己的兒子蔣孝武調派到新加坡，擔任駐

新加坡「副代表」，同時為掃除軍人干政的疑慮，又先後於1986年、1987年將汪道淵和鄭為元調派擔任「國防部長」，以圖加強對軍方影響力。在台灣政府體制中，「參謀總長」握有兵權，而「國防部長」是體制上軍事的主控者；一般皆知，「參謀總長」郝柏村在過去幾年來，權威極盛，郝家班將領滿佈台灣軍中，使外間認為軍人難以駕馭，一旦面臨變局，極有可能站到台前。蔣經國調派軍方元老鄭為元擔任國防部長，並逐步逐步地將軍方高層人員大調動，又以蔣緯國任「國安會」秘書長，章孝嚴掌外交，一則重新整合監察軍方的權力，再則釐清民間對軍人干政的猜疑，三則加強外交工作，做好國際「熱線」聯繫，以備萬一。

很顯然的，蔣經國的政治理念，傾向於台灣未來走向是民主開放、穩保蔣家歷史「聲譽」，而由文人主導的政體形態。在面對中國大陸的「一國兩制」壓力中，則力求多一點談判本錢，並期待海峽兩岸政局有新轉變。

開放體制來臨

解除人事因素和軍人對政權的干擾後，有關台灣未來幾年發展，台灣當局認為，最重要的是，應付中共「三通」壓力，島內經濟問題和政治體制演進，和島內政治抗爭之發展。蔣經國於1986年中，責成國民黨中央權力階層組成專案小組，研究基本政策性政綱變更的法則，對於戒嚴體制經審慎研究後，逐步開放，以是黨禁、戒嚴、報禁，在1987年、1988年間逐步解除。對中國現代史而言，蔣經國此一歷史性的政策性宣告，無疑標向台灣將朝融合統一體制發展。當中如



▲ 蔣經國會放心把權力交給李登輝嗎？

開放探親之舉，在蔣晚年措施中，無疑是一件值得推許之事。

蔣經國身邊接班人

李登輝在台灣權力結構中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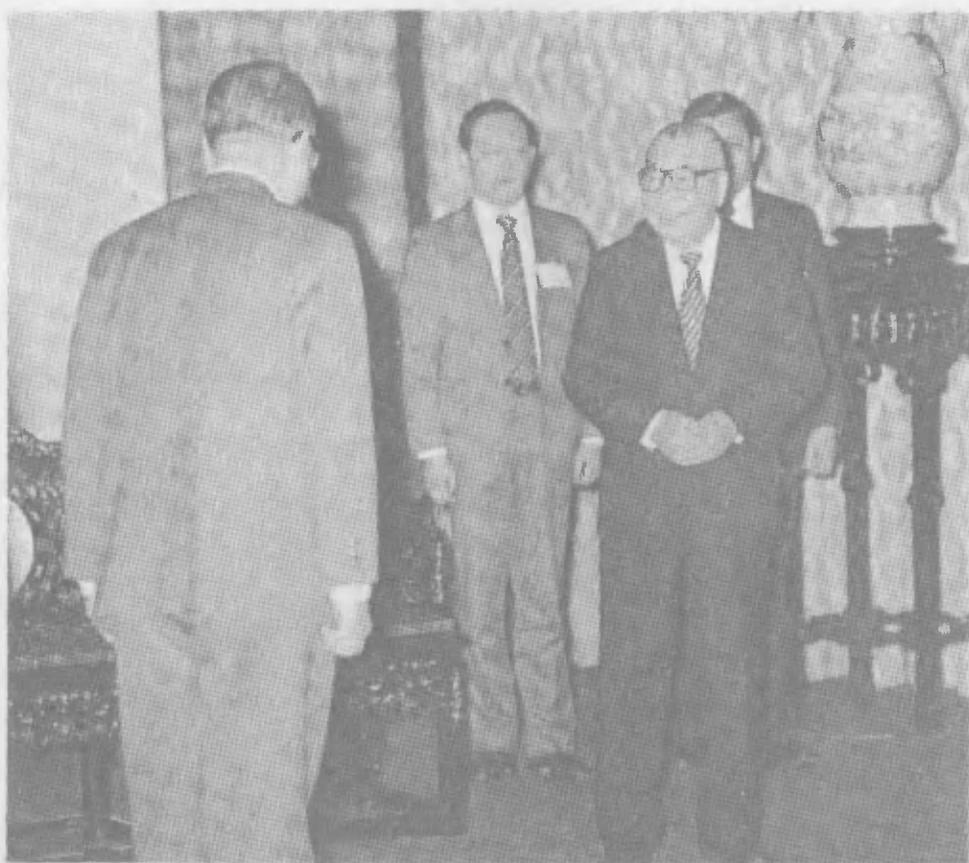
當蔣經國1987年10月10日坐著輪椅出現在「雙十典禮」時，大家不僅關心他本人的一舉一動，聲音動作，而且注意到圍繞在他身邊的人。

當他參加新竹軍事演習時，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站在他後面向他解釋的畫面，很引人注目。陪他前往的李登輝、沈昌煥、俞國華、李煥、宋楚瑜等台灣大員，也受人重視，因為這些都是他的核心人馬。

由於蔣經國當時身體已經明顯衰弱，大家對於他身邊的人馬，就特別有興趣，在台灣大轉折時刻，有關蔣經國接班和繼承的問題，海內外各界都在議論紛紛。

各式各樣的議論，大約可分為三類典型：

一、危機說：認為接班危機勢必難以渡過，因為一切太晚了，制度沒有建立，大家擺不平，各走極端，問題嚴重。



▲蔣經國選擇李登輝出任副總統，內中大有奧妙。



▲蔣經國「一身繫天下安危、置老病於不顧。」

二、派系說：認為各派都在暗中集結勾引，明爭暗鬥。官邸派、留美派、本土派、官僚派、黨務派，每天都在進行權力鬥爭，互搶地盤。

三、國民黨官方說法：認為台灣高層團結和諧，將來一切依「憲法」，水到渠成，萬事OK，接班危機乃是杞人憂天云。

蔣經國排除黨務系統

蔣經國病重之後，指定李登輝推動新的大陸政策，對李登輝的聲望很有幫助。

身為「副總統」的李登輝，本來就有很多機會主持政黨會議。他在國民黨內的資格算是很淺，所以，在這個擁有近百年傳統的國民黨而言，如果仍要講究黨的資歷才能做事的話，「副總統」的地位就不會那麼重要。但是，在這次大陸政策的決策過程中，蔣經國顯然有意要以行政系統為主，不要黨務系統介入太深。

蔣經國指定李登輝成立「五人小組」，在作業上，軍方和黨部均很少參與。除「安全局」之外，均由台灣政府的部會首長為主。這種安排，使李登輝能以「副總統」之尊，來作決策工作。

李登輝執行大陸政策

李登輝一輩子沒有去過大陸，他這個台灣省籍人士當上「副總統」時，據說中共那邊對他不太放心，擔心台灣與大陸會走得越來越遠。李登輝就任以來，也就刻意地避開他的省籍意識，而強調他的國際知識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體認。

1986年，《華盛頓郵報》女老板去台灣訪問蔣經國之後，也去訪問李登輝，特別要他以一位台灣人的立場來談中國統一的問題，這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題目。

據悉，李登輝在執行這項敏感政策和決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識、能力，在國民黨高層頗受好評，雖然這項政策公布之後，社會上大失所望，但在內部會議上，他們對這些批評，事先均計算在內，李登輝所採用政策效益評估，正是一個現代決策者的作風。

這幾年來，像林義雄、呂秀蓮、高俊明、張俊宏等人的假釋，都由李登輝事先通知當事人家屬，一些海外黑名單人士能夠回台，也由李氏出面協助。長老會和新約教會的問題，也由他出面協調。

蔣經國把本土政策，交給李煥執行，把大陸政策交給台灣省籍的李登輝執行，這種安排具有多重意義，一方面是李登輝的出身，使這種政策不會走太遠，而會保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大陸政策上。一方面是「副總統」之職位，使大陸政策至少在形式上變成整個國民黨政府的決策，而不屬於黨內事務。而言之，這安排對李登輝不論在台灣政府內、在國民黨內、在中國大陸方面、在民間社會或在大陸籍同胞等各方面的建立地位，都有幫助。

他是一個階段論者，知道什麼階段做什麼事情，雖然現在他十分受到注目，但在這個階段，他顯然認為這是他最適當的作法。

沈昌煥贊成改革

在蔣經國旁邊除了李登輝之外，另一位最被社會

誤解的人是「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

沈昌煥出身蔣家官邸，長期在幕後和幕前主持外交，他在外交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的主張，國民黨「外交部」一些新生代官員對他頗表不滿。他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在外交上又無力挽救台灣節節敗退和孤立。被台獨分子視為保守派，後來他當上總統府「秘書長」，位高權大，政界人士把他當作保守派領袖，似乎也是順理成章。

但是，保守與開明不是整批交易的。有人在政治上保守，在社會政策上則很前進，有人在經濟上屬於自由派，在政治上則是保守派。有人態度開明而思想保守，個性爽朗而立場僵化，留洋派也常比本土派還保守；在台灣黨外陣營方面，這種保守與激進的矛盾更大，不少黨外人士在對抗國民黨的行動方面似乎很激進，但在社會、經濟和人生道德方面，不僅十分保守，甚至是封建落伍。

像谷正綱在政治上保守，在勞工政策方面開明，黃少谷在態度上似乎很開明，但他反對解嚴和開放黨禁甚嚴，蔣彥士的作風親切，但却比馬樹禮保守。

沈昌煥在外交上保守，但在改革方面，却相當開明，所以才能在蔣經國身邊那麼受信任。如果他反對改革的話，一位積極推動改革的老板如何容忍得下他？

沈昌煥很少在外面露面，長年深居內府，與外界沒有接觸，沒有派系地盤的問題，加上操守清正，頭腦清晰。他不常發言，謀定而動，只對有研究的問題才講話，是最好的幕僚長，他對蔣經國這一段期間所推行的改革政策輔佐甚力。

黃少谷反對解嚴

有國民黨政壇長青樹之稱的黃少谷，因為出身新聞記者，知道如何塑造開明形象，但實際上却是保守派的真正領袖；他在國民黨內公開反對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等事，使蔣經國極為不快。1987年元旦「中樞」團拜時，他發表一篇有關法治與民主的演講，意在言外，以強調法治來反對民主改革，次日台灣各報均全文刊載。這篇文章，也註定了他下台的命運。以後嚴家淦因病住院，他並未如政界所預料的接替嚴氏主持六大議題的研究，那時他已經在蔣的心中失去信任了。

從黃少谷身上，可知保守和開明之分際，難以辨別；也可知不能配合蔣經國思想的人，便無法受蔣經國信任。國民黨式的權力運用，就是如此微妙。

軍方不敢介入政治

在軍方系統方面，「總參謀長」郝柏村的角色最受人議論，因為在1987年時他已經超過任期太久了，而且作風強悍，軍方對他批評很多，政界也覺得他在軍中的勢力太大，有成為軍事強人之可能。

軍方透過種種管道，向美方表示，他們絕對不介入政治，而且他們支持政治改革。雖然如此，我們看到總政戰部所控制的大眾傳播媒體，對許多改革政策和自由派學者多所攻擊，1987年底許歷農失去「總政戰部」主任職，改由言百謙取代。

許歷農上將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主要的興趣在「反制」民進黨和自由派學者。87年《台灣日報》被打，

暴行該被遣責，但連政戰系統的人也覺得《台灣日報》本身的報導也太過分了。而這個問題，許上將確要負不少責任。

郝柏村頗有特長

郝柏村現在積極致力於國防科技和裁編部隊，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受到蔣經國的欣賞。他對成本效益和經理參謀方面，頗有專長，與他外表的粗壯不大對稱。他也很會表現自己。「華視」對他的報導，超過歷任「參謀總長」的總和。1987年10月他在湖口演習上，站在蔣經國後面指著前方那個鏡頭，敏感的人，看到一個軍事強人的影子，但對他的同僚而言，他只是很會作「秀」，也會製造自己形象而已。

郝柏村在三軍大學設立一個特別的戰術研究班，由這個班畢業的都分發到好位置，軍方稱之為「郝家班」。郝氏愛將現已分據各重要職位，他是軍系中權勢最大的。1987年他的兩位愛將，金防司令趙萬富和情報局長盧光義，都因案下台。

台灣軍方高層大調動

台灣軍方近期出現了一系列涉及高層的人事調動。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被調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許歷農是四年前接替被「外放」的王昇出任「總政戰部主任」的。

許氏遺缺由台灣「國防部」副部長言百謙上將接任，第一位台灣省籍海軍要員郭宗清上將已接任「國

防部」副部長。「陸軍總司令」**蔣仲苓**上將調任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現任三軍大學校長**羅本立**上將將調任「陸軍總司令」，原「退輔會」主委**張國英**調任「總政府戰略顧問」。

據報導，1988年7月之前，「軍令系統」會有第二次人事調整。

李兪之間的平衡術

在李煥和兪國華兩大系統之間，現在已形成動態的平衡。兪國華本來是弱勢內閣，因為國民黨全力「保兪」，兪氏本身也「莊敬自強」，慢慢地兪院長氣勢日盛，甚至在有意無意之間，對李煥的一些政策表示不敢苟同之意。

而李煥一上台時，四方響應，氣勢如虹，因為做得太急，受到不少阻力和挫折，蔣經國也要他緩下來；如今也蹲下馬步，準備穩紮穩打。

李與兪之間的關係，可看作個性之爭，也可看作權力之爭，但也可作為一個制度上的平衡術，這是大邏輯中的小矛盾。在蔣經國眼中，這種制衡關係，可能是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的。

「司法院長」**林洋港**，到「司法院」上任之後，即碰到一大堆政治性很高的司法案件，大部分都仍未解決，這些案件將來如何解決，不論對**林洋港**本人的前途，或對台灣政治的前途，都很有關係。因為它一定會對台灣政治造成很大的衝擊。

司法系統是目前台灣政局發展的側線，但也是伏線，林洋港本身喜歡挑戰性的工作，現在正是他在司法的荒野中「自立」的時候了。

李登輝高處不勝寒

從台灣整個局面來看，李登輝居於「副元首」之地位，對外和李煥及俞國華兩人保持等距離的超然中立，對內和沈昌煥維持密切關係，如能得到蔣緯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支持，對軍方及安全系統保持適度的、職權上的關係，加上各方面條件的配合，將使他成爲未來台灣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這種接班危機和政治轉型期之中，李登輝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鏡。他的人生觀和政治信念，可能是他在那不勝寒的高處，唯一能夠支持他的力量。



►黃少谷

李慶珠也高升

李煥的女兒李慶珠返台灣後出任青輔會處長之職，已有一段時間了，但人事命令一直未見發佈。

李慶珠的新職之所以不願曝光，主要是因為李慶華被迫辭掉「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之職後，李煥刻意採取低姿態，不希望自己兒女的參政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

李煥上台之後，不但本人聲勢高漲，四個子女也連帶沾光，李慶中出任「環保署」副署長，李慶華擔任「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李慶珠出任「青輔會」處長，李慶安也在「北美事務協調會」任職，四兄妹俱都擔任國民黨政府要職，令人為之側目。

沒想到紅極一時的李氏兄弟，卻遭到其他政治派系的抵制，李慶華出言不慎，被迫辭職，李慶珠也受到牽累，出任處長之聲，不敢向外公開，以避免李煥的困擾。

李煥在遭貶謫及其後的復出，均刻意表現淡泊名利的氣度，予人從容穩重的感覺。可惜子女的養氣功夫，不如老爸遠甚，為官之心，過於急切，尤其在李煥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之後，更為活躍，無形中為李煥樹了不少敵人，李慶華被迫下台時，台灣當局黨政階層無人聲援，這時李煥無疑是一項嚴厲的警訊。

有鑑於此，李煥在李慶華事件之後，立刻要求在台灣的李慶中、李慶珠收斂一點，不要再惹出麻煩。李煥示意當時的「青輔會」主委關中（現任國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暫不發佈李慶珠的人事命令，關中對於政局變化的敏感度也很高，自然照辦。

關中從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被打到「青輔會」，再轉「組工會」當即聲勢大振。潘振球及前省黨部主委劉兆田，都不是開創局面的戰將，1989年的台灣「中央」與地方大選，國民黨極可能還是要借重關中，關中以拉攏李慶珠向李煥示好，用意相當明顯。而李慶珠的任職，正巧碰上李慶華的黯然下台，只好暫時委曲一下，當個沒有正式公佈的地下處長了。

李煥子女，分據要津

李家四兄妹分別出任要職，或許不是李煥的刻意安排，但國民黨政壇中有意巴結李煥的，所在多有，如簡又新的網羅李慶中，關中的任用李慶珠，以及錢復的培植李慶安，均是看在李煥的面上，李煥即使沒有主動示意，但也沒有堅持拒絕，這是李煥所為人詬病的地方。

李登輝自從喪子之後，進一步受到蔣經國的賞識與培植，主要就在於李登輝給人「無私」的感覺。而李煥卻大搞「家族政治」，難免落人口實，子女的政治地位不但無法鞏固老爸的權勢，反而可能成為李煥在台灣政壇發展的一大阻力。



▲李登輝可會得到軍方的支持嗎？

表一：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現任成員

主席：總統（李登輝）

成員：副總統（待補）、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參軍長（汪敬煦）；行政院院長（俞國華）、行政院副院長（連戰）、台灣國防部部長（鄭為元）、外交部部長（丁懋時）、財政部部長（錢純）、經濟部部長（李達海）、參謀總長（郝柏村）。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國家安全會議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大猷）。

蔣經國指定之其他人員。

表二：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特別會議之成員

主席：總統（李登輝）

成員：一、前述國家安全會議之人員。

二、總統指定的台灣立法院長（倪文亞）、司法院長（林洋港）、考試院長（孔德成）、監察院長（黃尊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谷正綱）、「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薛岳）、「國民大會」秘書長（何宜武）、行政院有關部會首長、及其他有關人員（如審計長張導民）等。

李登輝的政治實權

自從1981年4月國民黨十二全大會後，台籍政客開始大量進入台灣國民黨最高權力核心中常會，1984年2月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改選中常委的結果，「四下八上」，當時新增加的八位國民黨中常委中，連戰、高育仁、許水德、張建邦和黃尊秋五人為台灣省籍政客，使得國民黨三十一名中常委的成員背景，台籍比例大為增加，佔十二位之多。到1986年3月的國民黨三中全會，又增加了施啟揚與吳伯雄。而台籍政客的問政範圍，已由七十年代局限在議會和地方行政事務，提昇到中央政務，而且影響力和分量與日俱增。

省籍政治人物宦途日順

在中壯代台籍政要中，在九〇年代台灣政局有巨大潛力者，應該是政治閱歷完整的李登輝、林洋港、邱創煥三人。

李登輝脫穎而出

不管如何，李登輝爬升的速度，確是出乎意外的快速，顯示當局有意提拔這位學者型的技術官僚，成爲未來的台灣領袖人選之一，從學者到閣員，從閣員到台北市長，從台北市長到台灣省主席，由省主席到「副總統」，李登輝僅花了十二年的時間，這在國民黨政壇上殊屬少見。

除了台灣人的背景之外，李登輝的快速崛起，另一主因是他沒有實力基礎和他的技術官僚特質。歐美一些政治學者認爲，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代領袖與第二代經理型領袖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第二代經理型領袖上台之後，政治民主化程度將會加速。培養李登輝這類技術官僚，對台灣未來政治發展應是有積極的變革作用的。

技術官僚是以專業的知識技能爲甄拔重用標準，比用血緣、姻親、地域、省籍等天生主觀的尺度來得公平。技術官僚本質上是現實主義者，沒有黨政官僚的意識型態束縛，不會天天高唱充滿玄想的教條口號，耗費資源於無益的目標上。

政壇的微妙演變

李登輝從較他資深的林金生、邱創煥和林洋港等台籍政客羣中脫穎而出，他沒有民選精英和派系問題，沒有可以威懾蔣家的實力和基礎。李登輝在政壇上經營只十多年，從早期由徐慶鍾的提携，參與省府的農政工作，到六十年初期，受引薦而獲蔣經國賞識，及後他在「農復會」（「農發會」的前身），以

蔣彥士馬首是瞻，這漫長的階段，李登輝的表現一直是「好部屬」的角色。他很類似嚴家淦和孫運璿，最少表面看來，對權力地位表現得非常淡泊。沒有自己的班底，原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缺點，但在蔣家眼中，却正是他的長處；因之，李登輝被提拔昇為「副總統」，蔣經國健康惡化後可能的接班人之一。

李登輝的政治人格何以是他成為第二位台籍「副總統」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是與九〇年代的新接班態勢相配合。

1988年，台灣領導階層的主流面臨大換班之際，政治權威也將由一元絕對權威變為多元相對權威。這種「多元領導，權力平衡」的接班佈局，是將當前集於一身的大權，分散配屬給黨政軍各個系統，國民黨元老被迫交班。蔣緯國、李煥、李登輝、俞國華等黨政軍實力派人物分別掌握黨、政、軍和各項要職，在各自的體系中發展，以求取在蔣經國死後維持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沒有單一強人之多元領導的接班佈局中，由沒有高度權力慾望也沒有政治班底的李登輝，在將來擔任虛位的元首，應是適當的安排。因為，一個沒實力的人物出任「領袖」，較容易為各方勢力所接受，而可防止過度期劇烈的權力鬭爭。

不是「嚴家淦第二」

李登輝已既是台灣憲法規定的「國家元首」繼承人，他將是象徵性的棋子呢？還是擁有實權的國家領袖呢？根據上述的說法，李登輝在九〇年代新領導羣的角色，單只是「嚴家淦第二」。李登輝今天扮演著「總統」的角色，顯然已不是「謝東閔第二」，明目的戲碼，也將不只是「嚴家淦第二」。不過，一般認為



▲李登輝在蔣經國死後，將擔負一個名譽性的「首長」角色。

李登輝也不可能成爲真正的領袖。

當局刻意培養李登輝的政治聲望，讓他扮演更積極活躍的角色。李登輝1984年9月率團參加南非波塔總統的就職典禮，1985年2月率特使團赴烏拉圭慶賀桑吉內提總統就任新職，順道訪問巴拉圭，途中在美國境內停留六天，回程路過日本，也與日本政要有所接觸，礙於沒有正式邦交，不能多加報導，但是，此行被外交界人士稱讚爲「成功的外交出擊」。1985年7月哥斯達黎加總統孟赫訪台，由李登輝代表「總統」蔣經國接待。凡此種種，皆顯示當局栽培的用心，也可看出李登輝未來在「元首級」外交上的分量將更爲吃重，尤其美國方面對李登輝的歡迎程度是九十年代台灣企圖繼續獲得美方支持的考慮之一。

也不是「謝東閔第二」

1985年底地方大選的黨內提名，李登輝是國民黨中央六人小組之一，對提名作業有舉足輕重的決定權。他頻頻召見連任的國民黨籍縣市長和台灣省議員，而台中市張子源能取代尋求連任的林柏榕，就是李登輝堅持的結果。依往例，「副總統」必是國民黨中央提名小組的成員之一，所以，李登輝對台灣地方政治人物的甄拔和地方事務的發言權，獲得相當程度的授權，並不足爲奇，而且，也將是他在九十年代可能擁有的實質影響力。只是，他必須小心謹慎行事，除非當局明顯而充分的授權，否則他不會急躁冒進。

與軍政強權仍有距離

李登輝的政治資源仍然有限，他與地方實力派淵



▲ 蔣經國暮年時要坐輪椅公開亮相。老病的他，對蔣緯國只能又擔心又依重。

源不深，缺乏國民黨中央部會的行政閱歷，和台灣國民黨軍事系統更乏特殊關係，雖然四年來最高當局曾派他前往金門、馬祖訪問，也參加過多次軍事的演習活動，但却沒有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之明顯安排，有人認為晚年的蔣經國有意在軍事事務上，賦予蔣緯國更重要的角色。而李登輝與軍事系統建立「人際關係」，則是方便李登輝在未來新領導羣的協調溝通角色。不管如何，李登輝加深與軍方領袖的人際關係往來，也並不表示擁有掌握軍隊的實權；而台灣的軍方人事昇遷也已制度化，所以李登輝也不可能在未來成爲台灣唯一強權領袖。

汪敬煦的接棒人選

汪敬煦於1985年11月接任台灣「參軍長」，任期已兩年多，且年高七十，於近期內「報退奉准」。汪敬煦的任期只能幹到1988年7月。

依據台灣參謀本部組織法規定，參謀本部置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各一人，若「參謀總長」是陸軍出身，則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按例由海、空軍出身的將領擔任；藉此平衡國民黨三軍將領在參謀本部的比率。這個現象從表一可明白看出，蔣仲苓根本不可能屈就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甚至參謀總長由其他將領擔任，蔣仲苓也不可能到參謀本部任職。按國民黨當局慣例，倘若總長的資歷不如副總長，這不僅違反官場傳統，也違悖軍中倫理，使其日後難於運作。因此，蔣仲苓出任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的機會不大。

表一：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歷任「總統府」參軍長簡表

任別	姓名	任期	出職前經歷	出身軍種	階級	卸職後經歷	現職
1	劉士毅	1950年3月至 1952年3月	參謀次長	陸軍	二級上將	戰略顧問	已故
2	桂永清	1952年3月至 1954年6月	海軍總司令	海軍	二級上將	參謀總長	已故
3	孫立人	1954年6月至 1955年8月	陸軍總司令	陸軍	二級上將	無	無
4	黃鎮球	1955年8月至 1957年6月	國防部副部長	陸軍	二級上將	台北衛戍司令	已故
5	黃杰	1957年6月至 1958年8月	陸軍總司令	陸軍	二級上將	警備總司令	戰略顧問
6	黃鎮球	1958年8月至 1962年11月	警備總司令	陸軍	二級上將	戰略顧問	已故
7	周至柔	1962年11月至 1965年4月	台灣省主席	空軍	一級上將	國防會議 秘書長	已故
8	彭孟緝	1965年4月至 1966年9月	參謀總長	陸軍	一級上將	駐泰大使	戰略顧問
9	余伯泉	1966年9月至 1967年6月	副參謀總長	陸軍	二級上將	三軍聯大校長	已故
10	黎玉璽	1967年6月至 1970年6月	參謀總長	海軍	一級上將	駐泰大使	戰略顧問
11	高魁元	1970年6月至 1973年6月	參謀總長	陸軍	一級上將	國防部長	國民黨中 常委
12	黎玉璽	1973年6月至 1978年6月	駐土耳其大使	海軍	一級上將	戰略顧問	戰略顧問
13	馮啓聰	1978年6月至 1981年12月	國防部副部長	海軍	二級上將	戰略顧問	戰略顧問
14	馬安瀾	1981年12月至 1981年12月	副參謀總長	陸軍	二級上將	戰略顧問	戰略顧問
15	汪敬煦	1985年12月 至今	國家安全局局長	陸軍	二級上將	—	參軍長

1978年底，曾有消息外傳郭汝霖將外放出任「國防部」副部長，結果在參謀本部官員與蔣經國慎重考慮下，郭汝霖依然在位。究其實，一旦郭汝霖外放，放眼當令將領能夠接任者，僅有劉和謙一人而已。此因，其他資深將領都是陸軍出身，無法出任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故此消息根本是訛傳，而「國防部」副部長其後亦由台籍將領郭宗清出任。

出任參軍長的條件

基本上，台灣總統府參軍長，在軍令系統中，並無實權，只是襄贊「總統」處理軍務而已，是「總統」的軍務幕僚長。可是，「總統府」參軍長在「戡亂體制」上，與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都是「國安會」重要成員。在平時，參軍長並無多大作為，然而，在「戡亂時期」，他的影響力似頗可觀。在台灣，由於蔣氏父子都是憑藉其特有軍政資歷縱橫政壇，所以他們都有能力直接指揮部隊，無需藉人之手傳達軍令。但是，如果蔣經國在不久後去世，而未來「總統」不曉「軍事」，則參軍長可代表「總統」參贊軍務，其影響力必更可觀。故其未來地位重要，已不言而喻。

由歷任參軍長出路觀之，從黃鎮球到汪敬煦，鮮有特別突出者。歷任十五位參軍長，都具有「總司令」或「參謀總長」的輝煌資歷，只是在此職位等「退休」而已。但如果李登輝能順利接任「總統」，則未來的「參軍長」是誰，便值得注意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近年召開很不正常，反映其地位已不重要和黨心的渙散，「政治明星」都各自為政，陽奉陰違。



◀台灣內政部長吳伯雄，是新任的國民黨中常委要員，和蔣家關係密切。

李登輝的政治觀點

轉變社會的調適問題

臺灣目前正處於歷史的關鍵時刻，面臨開放探親，三通突破的社會轉型期，民衆的要求日益提高，而在這急遽變遷的過程中，已經發生和繼續發生着不少失調的現象。李登輝曾在演講中指出：「我們要領導社會變遷，至少應順應社會變遷，抗拒變遷會形成對立與衝突。」他進一步闡釋，三十多年來，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今天臺灣已發展成爲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人民的生活程度、教育水準、經濟能力都提高了，加以大眾傳播的發達，使人民對國外的發展情形都很清楚，因此，人民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各方面求改進，並希望提高服務品質，毋寧是很自然的現象。對於這些，不應抱持排拒的心理，應該加以順應、導引。

不過，多元化社會中，多層面的發展很難恰當地、均衡地進行，其間不免出現多重摩擦，李登輝強調，我們要領導社會變遷，絕不能停滯不前或反其道而行。

他認為，在變遷中的社會，各種觀念和制度必須隨時充實更新，必須從各個領域配合發展。他同時認為，多層面的發展很難恰當地、均衡地平行進行，隨時可能發生失調現象。

要克服這種障礙，李登輝的想法是，政府除了在施政目標、施政作為上，要有前瞻性與整體性外，也要實事求是；面對問題，以最大的耐力、最高的誠意，與民衆進行教育性的說服、溝通工作，使民衆瞭解各種問題的根本癥結，進而誘發民衆的信心與參與意願。另一方面，也要以民主素養相期於廣大民衆。「不能片面地對政府提出過度的要求！」因為國家社會在每一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民衆超越特定條件的過度要求，事實上政府當局很難如其所願地滿足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如顧及實際條件的不足而無法辦到，便會損及政府與民衆的情感。

他認為從政官員要「敬重自己的職分」、「保持大公無私的情操」。他認為不要像現在台灣大多數官員般，只求權利、金錢、女人，只求撈一把。權力與責任是相對的，有權力而不善盡責任，只會產生流弊。

再者，從政的心態及出發點應該是基於為民服務。因此，擔任民意代表也好，擔任行政部門公職也好，都應去除私心，秉持公理、正義，如此才能成為受人尊敬的從政者。

李登輝負責「探親」 小組

李登輝主持「探親專案小組」決策

1987年5月下旬，蔣經國就交待李登輝主持專案小組，探討大陸探親問題；此期間，從大陸去台的旅美學人和美、日友人，幾次聲稱想扮演兩岸傳話人的角色；台灣不願讓美國誤會台灣對大陸政策已有改變，由於有這些考慮，所以，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中，對探親只做三點原則建議。也因此，探親必須要在形式上有親等的「假限制」，這一些都顯示了國民黨小心謹慎地在測試水溫放放收收，如果水溫過燙，國民黨還有縮手的機會。

國民黨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寬鬆了海峽兩岸間四十年的緊張關係，在國際上甚受注意，在台灣內部更引起日漸昇高的期待，在此其間，國民黨內部分人士，卻萬分謹慎地測試這淌「惡水」（trouble water）的水溫，密切觀察來自北京的反應，其內心的憂慮和

緊張，却不容易從外面看出來。

中共反應是國民黨主要考慮

當台灣輿論界普遍要求國民黨把探親提高為調整兩岸關係時，成立處理大陸事務的部會、制訂新的大陸政策，各種主張和呼籲，也大量出現在新聞媒體之上，台灣國民黨中央也在評估中共對此問題的反應。中共反應是國民黨制定大陸政策的主要考慮，國共兩黨在這件事上，產生微妙的互動關係。而國民黨保守派的阻擾，則使台灣頗有進退失據和混亂之感。

當探親三原則宣佈後，特別是1987年11月不准梁實秋長女梁文茜赴台奔喪後，國民黨的做法在台灣引起普遍的不滿和批評。

台灣的開放，事實上非常曲折。據了解，1987年2月，蔣經國即指示「總統府」內的有關人士通盤研究大陸探親問題。開始時，只是收集輿論界的意見和建議。當時，因為「民進黨」發動「返鄉運動」，和老兵「想家運動」，許多學者專家在報紙上表示支持，蔚成輿論。所以台灣「總統府」的人，即負責收集海內外的有關言論。1987年4月中旬，台灣「總統府」內部設立專案小組，開會研究輿論反應，並由沈昌煥作成結論，向蔣經國報告。

沈昌煥和李登輝的活動

沈昌煥在外交上一向主張一個中國，對開放探親政策相當支持。他向蔣經國報告後，蔣即將此事交給李登輝接辦，當時是1987年5月下旬。

李登輝很重視專家的意見，尤其是這樣重大而敏感的政策，需要事先有周密的效益評估，包括中共的可能反應、對島內政治的副作用，以及國民黨應付出的代價等等。

據悉，李登輝當時委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專家們，評估中共對此事的可能反應，其他問題，也請專家學者評估。

在這段期間，社會上因各種改革政策的推展而顯得興奮而混亂，一方面民進黨常常有羣衆運動，一方面社會自力救濟事件層出不窮，台灣政府的公權力和公信力，頗受傷害，北京方面亦正密切注意台灣局勢的變化發展。

據說，北京方面透過一些旅美學人及去台訪問的美日友人，了解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掌握台灣局勢的能力。同時向美國加強壓力，要求台灣當局早日開放「三通」，進而促進了解、謀求統一。

國民黨在各種內外壓力下，改變大陸政策，開放探親，已成既定方針，但是開放幅度如何，其內部主流均主張不論如何，必須小心謹慎，儘量縮小範圍。

國民黨的六種考慮

當時在國民黨高層內部開會的時候，下面幾點意見，曾被提出來討論：

一、安全考慮。大批大陸漁船突然羣集台灣的東北海岸，在金門附近的漁船也增加了。當年中共在渡江前，以及攻打海南島之前，都有大批漁船出現，對國軍故意騷擾。這些歷史經驗，使台灣「國防部」提高警覺，在中共未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力之前，軍事國防絕對不能放鬆。

二、避免摩擦而使關係惡化。探親觀光必然造成很多意料不到的問題。有人指出，像《自立晚報》兩位記者到大陸採訪，表面上為新聞自由，記者有勇氣，但萬一在大陸上發生任何意外，國民黨不管行嗎？到最後，所有問題，都非跑到國民黨頭上不可，因此非儘量限制範圍不可。

三、中共仍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台灣的故宮博物無法到海外展覽，怕被中共追訴討回，台灣的七百多億美元外匯存底，中共是否會對它打主意，也不能不防備。

四、軍事教育、反共宣傳、教科書、新聞報導，都要慢慢調整，以適合新的尺度，但不能太快，否則民心士氣均受影響。

五、在國際上要有所交待，不要讓美日等國產生誤解，甚至影響到美國對台的軍售，損害到國際上微妙平衡關係，所以，只能一步步慢慢來。

六、避免刺激島內的反對團體，尤其是激進的獨派和統派，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盲動，必須有效加以規範和節制，以免形成惡性的激化。

紅十字會雀屏中選

據悉，蔣經國指示五人小組，關於探親政策的內容，力求簡單，不要瑣細，只作原則性的宣示，不要用命令式或限制性的語言，務求保留將來迴旋的空間，先實行幾個月之後，再評估其結果。

依照五人小組的建議，國民黨「中國人權協會」的政治性太強，公信力不足，「紅十字會」則專屬國際性組織，中國大陸上也有，將來發生問題，接洽交涉均比較方便。

香港紅十字會可作中介，在將來，大陸和台灣的紅十字會，也可以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援用「華航事件」的模式，解決問題。

李登輝的退卻

1987年12月21日，台灣「副總統」李登輝提出警告，希望台灣人了解其所謂中共長久以來即處心積慮，意圖攫取台灣，在必要時，更將以武力佔領台灣的企圖。

李登輝說，當前沒有任何事情比保障台灣安全更重要，違反這一目標，什麼個人利益，或某些行業的眼前利益，都將落空。

他說，中共對台灣統戰可以說從未停歇。不過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使中共統戰叫囂成了一廂情願的政治囁語，不得不把吞併台灣的限期，由本世紀末推延到更遙遠的未來。

由於台灣政府宣佈解嚴後，更基於人道立場，允許台灣省人到大陸探親；也基於言論自由，允許大陸的文藝作品及其他學術出版品的引入。有些敏感的人們以為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改變了，於是要求到大陸投資、觀光的呼聲也出現了；而引入的出版品，也難免夾帶若干「共產毒素」的作品進來；這些無疑會給中共的「統戰陰謀」帶來可乘之機。

李登輝特別引述蔣經國1987年11月在國民黨中央常會重申決不與中共談判的立場，聲稱國民黨大陸政策並無任何改變，更警告民間人士不要對中共有幻想。

李登輝同時提出「正確地認識敵人，有助於對敵

人的防禦」觀點。他說，最近中共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由趙紫陽、李鵬等人取代老邁的第一代共黨元老，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李登輝擔心，這難免給世人一個假象：中共在改變自己的共產主義道路，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也會持續不變，因此寄予若干幻想。

何謂「三親等」？

台北國民黨中常委會通過的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方案規定，探親對象以三親等內的血親及姻親為範圍。何為「三親等內的血親和姻親」呢？所謂血親，即指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血親又分直系血親（如父母子女等）和旁系血親（如兄弟姐妹等）。所謂姻親，即指由婚姻關係而形成的親屬，如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妻家的姻親，妻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夫家的姻親。

根據中國傳統計算親屬遠近的方法是：直系血親從己身上數或下數，以一代為一親。如父母和子女為一親等，祖父母和孫子女為二親等，曾祖父母和曾孫子女為三親等。旁系血親從父親數至自己的兄弟亦為一親等，兄弟之間為二親等，叔侄之間則為三親等。

此外，姻親關係的親屬，其親等計算，從其配偶之親系及親等。

[附] 台灣當局一項秘密 調查

開放前台灣當局悄悄地進行了關於海峽兩岸往來的研究，其中有一個關於台灣海峽兩岸體育交流的民意調查在較早前被洩露了出來。

此項民意調查是國民黨組工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辦理，由政大教授雷飛龍主持，在1986年下半年間進行，總共發出2610份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有1652份。

民衆贊成交流 當局秘而不宣

據指出，由於此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民衆贊成台海兩岸體育交流，有悖台灣當局堅拒三通四流的政策，因此，調查結果就被列入「機密」等級，秘而不宣，以免造成台灣政府的難堪。

教育程度愈高的台灣民衆 愈傾向與大陸接觸交流

據調查報告顯示，有百分之56的台灣民衆贊成讓中國大陸隊參加台灣主辦的國際比賽，而反對者則只有10%左右；對於派隊赴中國大陸比賽也有約43%的人贊成，反對者則有19%左右。

調查中並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愈傾向與大陸體育交流，高中或高職以上的民衆贊成讓大陸隊來台參加比賽者，高達百分之73，反對者只有一成，贊成赴大陸比賽的也有55%左右。反對者則有21%左右。

年紀愈輕，愈贊成兩岸體育交流

就年齡而言，年紀愈輕者，越贊成台海兩岸體育交流，20歲至40歲的民衆有65%左右贊成讓大陸隊來台比賽，反對者只有一成，50%贊成派隊赴中國大陸，18.5%反對。

台灣學生最主張與大陸交流

由職業上分析，學生主張與大陸體育交流的比例最高，讚成讓大陸隊來的，有81.5%。最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學生中，完全沒有反對讓大陸隊來台比賽的。贊成派隊赴大陸參加國際比賽的佔66.7%，反對者則只有7.4%。

專業人士多贊成交流 軍警官員暫持反對態度

此外，調查中並指出：專門性及技術性人員比較贊成台海兩岸體育交流，反對者則以軍警及國民黨行政人員的比例最高。

李登輝的健康問題

李登輝健康出問題？

最近在李登輝身邊的一位「御醫」透露，這一位身材高大，滿臉紅光的台灣政壇名人，在86年11月間曾因過度忙碌於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調度，而突告昏倒在地。數日後，經醫生診斷的結果係患上了高血壓——足以引發腦中風的可怕疾病。

在蔣經國的心目中，李登輝在呈報有關考核台灣本省籍政治人物的消息與提供參考建議事項方面最受倚重，同時蔣氏還曾考慮過由李氏身兼行政院長，以挽救俞國華內閣一旦垮台所可能觸發的危機。可是，李登輝於今個人威信尚未建立之際，目前却又在健康方面和蔣經國遭遇同樣的困擾。倘若傳言屬實，那麼蔣氏的接班計劃恐又一波三折了。

有關李登輝總統目下呈「養病」狀態的訊息，一經曝光，日後必定成爲島內、外新聞、外交界明察暗

訪的大事之一。除非李登輝及其幕僚能夠使出別出心裁的高招來消弭人們的好奇心，否則他的健康問題從此將如夢魘一般不時纏繞着他。

1984年間，幾乎篤定成爲蔣經國接班人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不幸突因罹患腦中風而喪失傾重一時的權位，連帶打亂了國民黨內部的整個權力架構，迫使蔣經國作出壯士斷臂之舉，把當時趁勢總攬軍、政大權的保守派首腦王昇將軍削權外放，藉此穩住台灣開明、保守兩派在政治上的均衡力量，適時化解軍人干政、主政的嚴重危機。

87年二月中旬，李登輝副總統受命出任中正大學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雖說委員之中網羅了李煥、邱創煥、閻振興、陳奇祿、魏文曜等強有力的人士，但這也可能構成李登輝的一樁隱憂，倘若他的健康真箇出現問題，「層峯」或許就此順水推舟，由他去幹中正大學的首任校長來頤養天年。

李登輝一度昏倒！

台灣「總統」李登輝昏倒了！

經證實，李登輝在選舉前一度昏倒在地，差一點就步上孫運璿、嚴家淦同一條「不歸路」。

台灣的命運，和風燭殘年的老人牽在一起！

每一次若遇着國民黨的核心人員罹病，總會引起各界的一陣驚駭。似乎，此時此刻，無關他們的聰明才智，品德操行，在國民黨長期強霸的人治環境之下，

台灣的命運竟僅僅是和這批風燭殘年的老人牽連在一起，就是這種現實之下的結論？

據透露，在1986年年底選舉前，爲了要佈置自己的人馬，加上不斷有人前來攀纏，李登輝沉迷於人捧人高的氣氛之中，一時起居飲食失控，一天，突然頭昏目暗昏倒了，弄得侍從驚嚇不已，但只聽得李登輝自己直說：「歇會就好，歇會就好！」

爲着不驚動外界，包括蔣經國這個頂頭上司，李登輝堅持在原地休息，不願立刻上醫院檢查個究竟。據透露，遲至事隔二、三天，李登輝才在家人和親近者力勸之下，到榮民總醫院看病。

情況發展，對李登輝宦途不利

據李登輝的「御醫」事後透露，李登輝患有高血壓——足以引發「腦中風」這種「健康殺手」的可怕疾病。

1984年2月，呼聲最高的「蔣經國的接班人」孫運璿；1986年9月，蔣經國倚爲「調和鼎鼐」的國民黨內第二號人物嚴家淦，都是腦血管爆裂，雖然後來都能挽回性命，却也被迫提早結束了他們的政治生命。

李登輝罹患了高血壓，又有昏倒的紀錄，在醫生看來，他已是一個需要遵照醫囑「多多休息」的病人。就是一般稍具醫藥常識的人，也都明白中風的可怕，在於它的來無影去無踪，說病發就病發的潛在高度危險性。這種病情，對一位可能接班的人，當然極爲不利。

然而李登輝的外表，看起來蠻健康的，他真的有「事」嗎？

李登輝現年「只有」64歲

他現年「只有」六十四歲，比起黃少谷的八十七歲，袁守謙的八十五歲，馬樹禮的七十九歲，俞國華的七十三歲和李煥的七十一歲，他只是個「小弟弟」。這些國民黨權力核心人物和他比起來，無論怎樣說，他都屬於國民黨決策圈裏的「中壯派」。

「李表哥」爲什麼有「痛」

他高大而魁梧，半頭銀髮，滿面紅光，到處去應邀演講，笑口常開。無論怎樣看，他都算是很健康的老人。

有人認爲，李登輝是被「氣」出「病」的！台灣行政院人事「大搬風」之說由來已久，而其中更盛傳李登輝可能在副總統職位外，要身兼行政院長，李登輝自己也逐漸相信其來有自的說法，難免躍躍欲試。不料，國民黨元老大員黃少谷在快要退下「司法院」的同時，以李登輝不得兼任「行政院長」作爲和蔣經國「談判」的條件。此事傳到李登輝耳中，氣得他狀似紅臉關公。於是，沒多久，就聽聞「李表哥假寐了」！

最近，經過醫囑，李登輝已減少他出外送往迎來的約會，他公開「曝光」的場合已越來越少，呈現一種「養病」狀態。

底子尚稱良好

根據御醫的觀察，平日人高馬大，滿面紅光的李

登輝有心臟血管不良的跡象，初步的檢查顯示，李登輝的身體底子尚稱良好，突發性的昏倒姑且當是一種警告訊號，御醫倒不致悲觀地預測李登輝不足以行事了。

消息來源透露，精神上的壓力常導致身體病變，自從孫運璿病倒之後，國民黨內部核心成員在這方面的現象越來越顯著，李登輝不一定是特別的一個例子，可能的話，當是其他人沒有昏倒在外罷了。

春節前，李登輝曾與行政院首長年度健康檢查一次，再到醫院做類似例行性檢查的檢查。醫生囑咐他不宜操勞過度，要定時測量血壓、體溫、脈搏，以免引發腦血管病變，當然，最忌諱的是怒急攻心啊。

四周圍高築的石牆，偌大的官邸足夠李登輝在裏頭好好的運動運動一番，這段時間，醫師出入的頻率高，主要是李登輝不願動輒上醫院，他要求御醫往診。

據消息來源透露，這段時間，即便醫師發現他有些老人病症如攝護腺腫大，肥胖等，他亦不擬在此時住院留醫，以防他人藉機滲入影響宦途。

李登輝昏倒的消息傳開來之後，適逢國民黨趁新舊年交替之際，即亦乘勢安排其行政系統各部會首長到榮民總醫院接受全年身體健康檢查，若干人深感如觸霉頭般地不樂意，也有部份少壯派以為體檢也是「成績單」，豈可「拒考」？更有不少人敏感地懷疑是否關係大搬風，於是，就有人希望御醫真能兩、三下就檢查出身體出毛病之處，好及早預防或治療，但同時也希望榮民總醫院適度代為「保密」或「美言」幾句。

在檢查之後，沒有一位高官願意承認健康上有什麼缺陷，他們一個個參加國民黨「中常會」、行政院

會，都一副精神飽滿，強充「健康寶寶」苦養面色。

台大醫院空置一個床位等待着

1986年中秋節前夕，嚴家淦中風時，因急送三軍總醫院竟苦無病床，急救之餘被迫轉往遠在石牌的榮民總醫院。

彼時，國民黨才深深體會到「遠水救不了近火」的痛苦滋味，沒多久，即由總統府下函給台北市各大型醫院，必須隨時保留一張床位，以供不時之需。規模僅次於榮民總醫院，且一向是台灣人子弟地盤的台大醫院，也特別賣給總統府面子，將其原本十七床的身體檢查部門，留下一張床不用，以便必要時安置那些大官僚。

而馬偕、長庚等性質的醫院即便準備個上等床，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場，除非是意外急救，如前國民黨要員費驊被市公車撞死之類的事件，才輪得到私立醫院上場客串。

台灣坊間常說一句話：「破病人怕過節」，自舊曆過年、元宵節、清明節，有人說久病在身的人若能捱過這些年節大關，則再度一歲應不成問題。國民黨是一個十分迷信的團體，蔣介石是國曆四月四日晚上十一時五十分過世，經國民黨「核定」的則是四月五日清明節，則上述坊間所談或許不虛。

1984年，一場重度的腦中風奪去了孫運璿的行政院長位子，粉碎了他可能晉升的希望。1985年，一場血癌侵襲幾乎把蔣緯國自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位子給「將軍」了，接着，一場緊急的腦中風動搖了嚴家淦深入決策穩定國民黨元老核心的地位，而更精彩的

是，白內障手術、截肢手術、裝置人工心律調節器等一連串就醫動作，幾乎迫使蔣經國無招架之力，就地投降。

李登輝未來角色

國民黨「十三大」前瞻

環繞今天台灣政局的重心，不離人事，更重要的乃是時機。儘管台灣輿論早已不斷提出人才斷層、變革人才的羅致措施，與及接班等問題……。但不能忽略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諸如中國大陸「十三大」後的開放措施，和加快年輕化步伐，國際間的美蘇兩強競賽變數，還有島內經貿困擾和社會混亂的局面等，諸如此類的大小變數，均與台灣的生存發展關係至密。換言之，台灣政經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提昇，固是一種自力發展，然此仍與整個大環境環節的變化密切相關。

自從蔣經國先生1985年底在「行憲紀念大會」明白宣稱，蔣家子弟與軍方都「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任「總統」後，今年七十九歲、要坐輪椅、健康日趨惡化的「總統」，任期也將在1990年三月屆滿，這促使「接班問題」成爲公開討論的熱門話題。從1987年的大

規模的人事不斷調整以來，人們看到台灣也已做了整合性的準備，未來的接班問題，更加惹人注目。

1988年夏秋間召開的國民黨十三大，將是一次重的人事「整合」，也就是老、中、青的大搬位、大換班。

基於此一重要認知，不妨先回顧目前的權力核心結構情形。如將台灣現行政治官僚粗分為七十歲以上的元老，與二次大戰後五十五歲至七十歲具從軍流亡經驗的中生代，以及在台灣接受教育成長的五十五歲以下之青年代。則此三代中，老一輩多在決策層次，中生代則在內閣居多。倘以權力核心「本土化」觀察，國民黨中常委中，老一輩本省籍約佔一成七左右，如與中生代與青年代本省籍合併計算，約為45%，此一趨勢在未來將更發展，在1988年下半年以後將會急劇轉變，在中共「十三大」和時代潮流衝擊下，台灣國民黨老一輩的外省籍大老，將全部有被中生代與青年代接替的趨勢。

在1986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中常委三十一人中，已有李煥，及中青年代的吳伯雄、施啓揚及陳履安等四人接替元老之職。按照國民黨的黨章規定，中常委的名額，可依據黨員人數的增加，而由黨主席權衡決定酌增若干人。譬如國民黨十二次全代會召開時，當時中常委名額為廿七人，後增為三十一人，即是一例。

國民黨「十三大」前，黨國大老級的谷正綱、袁守謙、高魁元、洪壽南等動向，頗引人注意，谷正綱因子女皆已有安排（如谷家華出任「監委」，谷家恆為「中山大學」教務長，谷家泰為一家大電子公司負責人），可以安排去位，高魁元有健康因素，而洪壽南已轉任「總統府」資政，隱退已成定局。嚴家淦中風病倒，

謝東閔亦不會久留。宋楚瑜、馬英九等相信將會進入國民黨中常委。而關中、郭南宏、郭宗清、言百謙等相信亦將乘機而上。

這樣，李登輝、李煥和蔣緯國的地位就將更為突出。

照國民黨安排，1988年夏秋，國民黨召開「十三大」，高層邁向年輕化，此刻正是國民黨四十年來一次較大規模調整各派系、各機關人事的關鍵時刻。愈來愈多的跡象顯示，俞國華這個國民黨大員退隱幕後幾乎已成定局。李登輝會冒出頭嗎？而他冒出頭就必然代表台灣本土傾向更受國民黨政權的重視嗎？西方觀察家老是喜歡以台籍政客出任要職，作為判斷蔣經國重視台灣籍的人士的地位的標誌，可是實際上，這只是蔣氏暮年調整中國大陸政策、推行本土化政策的權術運用。不過，李登輝太早冒出頭，對他而言也未必是件好事。畢竟，木板上太突出的釘子過分扎眼，遲早都會被打下去的。

李登輝可以兼任「行政院長」嗎？

在蔣經國健康轉壞，俞國華聲望不佳之際，李登輝會否兼任「行政院長」，從而壯大力量，以成為蔣經國一旦去世後最有實力之接班人呢？

台灣政界人士作出猜測，可能由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兼任「行政院長」的理由，是基於：

第一、李登輝沒有派系，沒有班底，這是在蔣家手下能夠出任閣揆的不二條件。嚴家淦如此，孫運璿如此，俞國華亦如此。

第二、李登輝表現出「無欲」的態勢，又沒有兒子



▲新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說：台灣「目前存在諸多複雜問題」，未來工作「並不好做」。

繼承，他擔任「副總統」四年來，對蔣經國溫順與忠心的表態，已獲蔣經國之信任。

第三、蔣經國在孫運璿中風後，爲了一時找不到適合的「行政院長」人選，頗爲徬徨，後來匆促召回正在亞銀開會的俞國華，是因爲擺不平內部派系紛爭，故而起用內臣，以杜黨內各派系的競逐。如今讓俞國華功成身退，在自己身體健康惡化之際，選擇一個可爲各派折衷接納，憑其實力不足以影響黨內權力分配的人，實最適當。

第四、李登輝從來不是實力人物，亦無經過民選的羣衆基礎，他的聲望來自蔣經國給他的「副總統」職位，抽離了名位，他的權力、聲望……馬上變成真空。他是虛浮而不踏實的，而這點正好是國民黨領導階層最能放心的地方。

第五、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誰都知道嚴家淦立刻成了空頭「總統」；蔣經國當了「總統」，誰也都知道國民黨「憲法」上設計的內閣制權力制衡馬上變回「總統制」。李登輝縱然兼了「行政院長」，大權也絕不會旁落到「行政院」的，蔣經國的健康驟然惡化，加強李登輝地位，對權力轉移到集體領導，以至加強蔣緯國、章孝嚴等人影響力都有好處。

第六、李登輝造型不錯，學歷不錯，能力方面雖然不怎麼樣，却適合當國民黨枱面上的人物，應對四

▼軍方並不看好俞國華。



方。

第七、可使美國和海外認為，蔣經國如果起用李登輝兼任「行政院長」，是爲了培養李登輝的政治聲望，俾便他順利接班。今後蔣經國要走「改革」路線，所以起用一個願意執行革新政策的人。

台灣權力核心成員表

70歲以上				70歲以下			
委員	年齡	籍貫	比例	委員	年齡	籍貫	比例
蔣經國	已故	浙江	83 %	郝柏村	69	江蘇	15 %
嚴家淦	84	江蘇		陳履安	52	浙江	
谷正綱	86	貴州		李登輝	65	台灣	85 %
俞國華	75	浙江		林洋港	61	台灣	
袁守謙	81	湖南		黃尊秋	65	台灣	
黃少谷	88	湖南		邱創煥	63	台灣	
倪文亞	84	浙江		吳伯雄	49	台灣	
高魁元	80	山東		連戰	52	台灣	
沈昌煥	75	江蘇		施啟揚	53	台灣	
王惕吾	76	浙江		林挺生	70	台灣	
余紀忠	79	江蘇		許水德	58	台灣	
李國鼎	78	江蘇		高育仁	54	台灣	
宋長志	72	遼寧		張建邦	59	台灣	
李煥	71	湖北					
曹聖芬	74	湖南					
何宜武	75	福建					
謝東閔	82	台灣	17 %				
洪壽南	76	台灣					
辜振甫	71	台灣					

從表中可見：
 (1)台灣省籍核心成員日趨衆多。
 (2)年齡較輕的國民黨中常委多是台灣省籍人士。

李登輝父親李金龍

八十九歲老人

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現年89歲，是一位個性開朗豪放的人。到1987年初還是精神奕奕，頗為健康。有人問他養生之道，他的答案很簡單：「喝酒」。

他說，適度的喝酒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可以協助保持心情的愉快，他的身體到現在還能那麼健朗，他相信與喝酒有很大的關係。

當過日本刑警

年輕時候的李金龍，曾經當過日本刑警，爲了職業上的需要，他下工夫學習柔道與中國武術，鍛鍊出一副結實的體格，打下厚實的健康基礎。後來他雖然不當日本刑警了，但是偶而還練練武術，並沒有完全把它荒廢掉。

喝酒、練武功

早年時，李金龍經常向朋友展示他的右手。他的右手中間三個手指頭特別粗短，那是練過鐵砂掌一類武功的特徵。他說：不要看他年紀一大把，要對付歹徒，他不一定輸給年輕人呢！

至於喝酒，他是在1963年不當國民台北縣議員之後才開始酌上兩杯的。他在1958年至1963年間，當了兩屆的台北縣「議員」。當了「議員」之後，因為應酬比較多，所以那一段時間他喝酒很少節制。不當「議員」之後，一方面因為上了年紀，一方面因為應酬少了，他才自我控制酒量，適可而止。

李金龍年紀老邁，但長相仍然很逗人，天生的酒糟鼻，終年紅紅的。他愛說笑話，說起話來聲音不小。今天地位與往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依然不改其本性。

這幾年來，李金龍除了偶而到板橋等地找過去的一些老友聊天，順便喝兩杯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重慶北路帝一餐廳獨酌。那是一家大眾化的餐廳，他說，他在那裏喝酒，除了經濟實惠外，最重要的是讓他感到他的身分和大家一樣，他不希望因他是李登輝的父親，被人另眼相待。

李金龍喜歡喝黃酒，平常一天兩餐大約喝一瓶左右。有時候碰到老朋友，一次也可以喝一瓶半。但他的酒量好，喝了一瓶半的黃酒後還是面不改色，晚上喝到十二點，早上照常起床，這兩年來年歲大了，才將酒量酌減。以八十九歲的老人來說，像這種良好的身體健康狀況是很難得的。

談到他的兒子當「大官」的事，李金龍的興趣反而沒那麼濃厚。他說，「登輝仔」的書念那麼多了，



▲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左）

事情也做那麼久了，應該知道怎樣做好應該做的事，他插不上手，也管不了那麼多。

或許李金龍能這麼放得開，他才能夠經常保持心情愉快，身體健康。

曾文惠寫真

「一個地主的女兒嫁給佃農的兒子，只覺得佃農的兒子很用功，又常流鼻涕很可愛！」十年前，甫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唯一的兒子，已逝世的李憲文，在報端這樣寫道；這個「愛流鼻涕」、「很用功」的青年是李登輝，地主的女兒便是今天的台灣「副總統」夫人曾文惠。

六年多前，這一對夫婦痛苦的喪失了他們的獨生子。不久，李登輝受到拔擢當選「副總統」，鎮日劬勞，他的夫人獨自挑起這份哀傷。

她必須在生活的角落中承受喪子的哀痛，又必須在李登輝出外之同時，扮演第二夫人的角色。

幼年生活優裕寫意

曾文惠自生來便嬌生慣養獨獲愛寵，1926年，她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近郊小鎮淡水三芝。外祖父家在當時有富甲一方的財富，使得她的童年乃至少女

時期，都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和當時苦難的老百姓的生活截然不同。每年酷熱的暑日，他會和姐姐、弟弟們到山上的小屋去避暑、鬪牌、唱歌，老奶媽則忙着張羅零食，和佃戶們送來的花生、魚鮮。

十七歲那年，曾文惠從台北第二高女畢業，就讀女子學院，那是日據時代女孩子的最高學府。「那時候，我們女孩子唸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做個好太太，所以讀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帶孩子這些知識。現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唸完書出去做事。」她回憶着。

曾文惠還在唸書的時候，父母就安排她跟淡水三芝的同鄉世交李登輝訂婚。雖說是奉父母之命，其實也是她的意願。那時候，讀到女子學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給醫生才有面子，她的妹妹嫁給醫生，最初父母也是這麼替她打算，可是介紹過幾個醫學院的男孩子她都不同意，唯獨中意「又醜又怪」的李登輝。

訂婚前捧過「金飯碗」

「我們訂婚後，他每次來看我，總是帶一本書給我讀，下次再會面，就要考我心得。當時覺得好討厭。後來這些書對我以後的人生價值判斷與影響很大。訂婚一年中讀的書，感覺比學校唸的還多。」她說。至今，她仍保有讀書的興趣。

訂婚前，她已曾捧過「金飯碗」。日據時代自台北女子高等學校畢業後，在1944年進入台灣銀行工作。四年後訂婚，其後爲了李登輝而辭去工作。

當時銀行工作是人人羨慕的金飯碗，連她母親都覺得可惜，她反倒安慰母親：「既然那個怪人要我辭，辭掉算了，他要養我就讓他養好了。」二月訂婚，三

月她就辭去工作，從此再沒有出來做過一天事，「曾文惠」的名字幾乎被遺忘了，其名字逐步為「李太太」所取代。

她在銀行上班時，每個月發了薪水，沒處花用，就到銀樓去買金戒指，積存下來，可以用手帕包成一大包，後來又跟着她陪嫁到李家，這包金戒指在她婚後一段經濟拮据的日子裏，派過大用場。

1949年，曾文惠二十三歲時披上了嫁衣，李登輝當時在台灣大學當助教。婚後孩子接連出世，李登輝一個月薪水五百元，家裏一個月家用需要一千三百塊，所缺的八百，就是一個個金戒指換來的。「那陣子，沒錢就拿兩個去換，日子過得倒也很自在。」她說。

藝術涵養

曾文惠具有藝術涵養。一首好歌、一幅好畫、一朵美麗的小花都會換得她衷心的讚嘆。憑着這份對「美」的直覺與嚮往，她開闢了另一個有花香、琴聲的世界。爲了補貼家用，她在家中開辦了一個小型的插花班，她本人負責教授花道，丈夫幫着用鋼版寫講義，年紀還小的兒子則穿梭其間做一些發講義、花材的打雜工作。

其後李登輝赴美國讀書，用的也是日常變賣金子的錢。等到李登輝學成返台灣，她的金戒指早換光，錢也用完了，而李登輝又推掉了「農復會」一個月差不多有兩百美金高薪的工作，受徐慶鐘的引介到台灣「農林廳」幹五百元月薪的事，爲了生活，晚上李登輝總是埋頭寫稿，賺稿費補貼家用。

談起李登輝的寫作著書，曾文惠曾經說出他們夫婦間一段往事。多年前她曾半開玩笑地對丈夫說：

「嫁給你談不上什麼享受，不求利也要圖個名呀！」李登輝聽在心裏，果然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論文第一頁上，就寫着「To My Wife」。但她得理不饒人，又說：「光這樣寫，人家怎麼知道你的 Wife 是誰呀？以後再著書該註明『獻給愛妻曾文惠』。」

以後李登輝所著有關《農業經濟》的書籍，在國際間被視爲建設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經典，而「T. H. Lee」也揚名國外，他一直謙稱妻子鼓勵有方，應居首功。

苦學普通話和英語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教育，學普通話一直是多年來鏗而不捨的努力目標，她曾說：「1954年大兒子唸幼稚園時，我還不會說國語，爲了以後小孩的教育，爲在兒子入學前，我趕快從ㄅ、ㄆ、ㄇ等拼音字母唸起。那時，教小孩讀書都是現買現賣。」

後來李登輝因工作的關係，常與一些外國朋友交往，她又開始學習英語。爲了學好英語，她是「美爾頓補習班」，被同學喚稱「大姐」而公推爲班長的「媽媽」學生。經多年苦學，總算有了成果，雖然她的普通話至今仍有「台灣腔」，英語有「日本腔」，但這些都已被她流暢的談吐所取代。

李登輝以後受到國民黨當局賞識，於1972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曾文惠的日子開始豐盛起來。六年之後，即1978年，李登輝當上台北市市長，曾文惠的生活比過去忙得多了，每週除了必需陪市長應酬的場合外，自己也有一套自己的活動範圍。譬如應各社團的邀請及國民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安排的各類

訪問活動。

她在朋友圈子裏，是有名的「萬事通」，她知道在那裏可以買到又便宜又好的東西，很多親友常來請她當採購顧問，陪她們逛街。她還喜歡打高爾夫球，常到青年公園去練球。其餘就是孩子們的事和一些例行的家務，把她每天的時間都佔得滿滿的。

三年之後，李登輝又出任台灣省主席，世事變化之大，令曾文惠不敢想像。她說：「以前，我們的生活圈很單純。他當市長後，才跟國民黨政界高層有接觸，也感到責任重大。我告訴他，只要有愛心，爲人誠懇，做任何事都一樣。」她在作中興新村女主人第一天時，曾這樣告訴來訪的人。

生活和以前一樣平凡

1984年，李登輝被蔣經國推派爲第七任「副總統」。在這之前，他們的獨子去世了。

在他們失去愛子的一段日子裏，曾文惠痛不欲生，獨自挑起所有的哀痛，夫妻二人只有在深夜時，才相擁痛哭；第二天一大早，李登輝又忙於他的台灣省省主席工作。

如今，身爲副總統夫人已有四年，曾文惠雖然感覺到生活上的變化，但她儘量不讓自己變，她仍然愛讀書，仍然愛花，有時也上市場買幾樣青菜；鮮花是每次上市場非買不可的東西；一面買東西，一面還跟小販們閒話家常；碰到因買菜而認識的多年「菜友」，會站到一邊聊兩句，交換做菜的經驗或管教兒孫的方法。

她也像所有的媽媽一樣，爲了女兒請同事吃飯，做母親的總是要特別爲女兒準備安排一番，去菜場採



▲李登輝夫人曾文惠間亦有上街買菜。



▲年輕時的李登輝夫婦與長子李憲文合照。李憲文的病逝，對李登輝有一定的打擊。

▶李登輝與孫女巧巧。



辦了請客需要的材料，回家馬上又忙着插花、佈置房子。有時也照顧一下稚齡的孫女。雖然，他們有的是女傭人。

蔣經國在台北市愛國西路重慶南路口，新建了「副總統」官邸；遷入宏大的新居，曾文惠有更多女傭，但也有更多應酬，除了室內外的裝潢擺設，她還要準備新的奢華生活的排遣。

作為「副總統」夫人，她自謙說：「其實，我只是個『管家婆』，只要做好我分內的事，跟其他的家庭主婦沒什麼兩樣。」如今她一樣的忙碌，整天不停的出入應對，碰到好友來訪，會聊上個把鐘頭，她的談吐親切幽默，雖已六十開外，望之却如五十許人。



▲李登輝與夫人曾文惠。

林洋港不敵「李表哥」？

索價十萬美元？

1985年中，美國政治漫畫家勞瑞在吊足了國民黨將近半年的胃口後，終於在1985年12月12日上午，捧著一幅「李表哥」到台灣「總統府」獻寶。國民黨要求取勞瑞畫這幅「國畫」，究竟花了多少銀子，外界極感興趣。

據稱，有記者曾經「冒昧」地問勞瑞，是不是索價十萬美元以上，勞瑞予以否認，表示是免費贈送。當時的台灣「新聞局」局長張京育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也都聲稱「沒有價碼，純屬服務」。

作為一個諷刺漫畫家，勞瑞從反蔣轉變為捧國民黨的場，其間，宋楚瑜功不可沒。

本身反共，但也討厭蔣介石、蔣經國的勞瑞，一向把蔣介石視為東方的一個獨裁者，對蔣經國，勞瑞畫的「1984年的船長」一幅作品說明他對蔣經國也不會



▲勞爾筆下的李表哥，可是當今台灣「總統」李登輝的化身嗎？

有良好觀感。因此在1985年7月以前，勞瑞與國民黨根本是「互相拒絕往來戶」。

事情到宋楚瑜當上國民黨文工會主任，開始有了轉機。據說宋楚瑜本人也擅長畫漫畫，唸小學時還志願將來當漫畫家，因此深知一幅漫畫的殺傷力有時不比文字來得輕。爲了請求勞瑞手下留情，宋楚瑜不惜多方請託外加重金，禮聘勞瑞去台灣，單單輾轉表達敬邀之意，即花了近半年的時間，殷勤之意不下於對待一國元首。

勞瑞之受到國民黨重視，除了他確實擁有名氣之外，他把日本人的改頭換面，由戴眼鏡、唇蓄短髭，手持武士刀大叫「千巴拉」的形象，改造爲活潑的《桃太郎》竟轟動一時，也使努力想開展「民間外交」的國民黨怦然心動。因此1985年7月間，經宋楚瑜力邀來台的勞瑞，竟然以平民的身分獲得蔣經國的接見。

林表哥變成李表哥

除了住最好的套房，享受最好的招待，官方刻意巴結之外，國民黨「文工會」還發動牛哥等漫畫家對勞瑞展開人情包圍，企圖扭轉勞瑞對台灣當政者的印象，一陣雙管齊下的水磨功夫，終於磨得勞瑞點頭，答應爲台灣重塑形象。

點頭之後，自然談到價碼的問題，可惜這筆「潤筆」之金，屬於國民黨文工會「最高機密」的暗盤，雖然據傳在十萬美元以上，終究無法求證。不過以勞瑞的身價，加上專程來台，太小的手筆一定會傷了賓主之情，國民黨不會笨到因爲小氣而功虧一簣。

1985年7月下旬，勞瑞返美構思作畫。據漫畫界

透露，他原來的構想是畫一個「林表哥」，因為他在台灣接觸到的人大多數都姓林，包括林洋港在內，而「林」又是台灣的大姓，因此順理成章應該取名「林表哥」。

後來有些老外建議他不如以「布魯斯李」，李小龍作模特兒，因為李小龍在歐、美、日本、東南亞甚至非洲，都是最高知名度的中國人。曉得李小龍的人，不一定曉得蔣經國，但是曉得蔣經國的人，卻一定曉得李小龍。而且「李」的發音接近英語、拉丁語系統，不像「林」那般繞口。勞瑞其實對中國所知實在有限，三言二語也就欣然同意了。

把「林表哥」換成「李表哥」，據說還有一層深意。由於勞瑞並不瞭解台灣的政情，乃把現任「副總統」李登輝當成蔣經國的接班人，因此「李表哥」在外形上酷似李登輝，同時取「李」為音影射李登輝，有暗捧李登輝之意。有人說：「林洋港不敵李登輝，林表哥當然鬥不過李表哥了！」

實在是不怎麼樣

1985年12月12日，神秘兮兮的「李表哥」揭開面紗，果然是身穿功夫裝，腳搭弓箭步的李小龍式人物。慕名興匆匆趕去的民衆有許多人大失所望，這幅「絕對機密」的「李表哥」形狀庸俗，下巴「厚道」，眼睛斜視，根本就是一個不起眼的人物，那裏有什麼「中國人的新形象」？

當天在場的中外貴賓，包括宋楚瑜、張京育、許水德以及各國駐台灣官員，有的人虛偽表態，言不由衷，有的人一臉迷惑，暗中呻笨，一些外賓則輕閃著



▲ 林洋港。

笑謔，都有「不過如此」的失望和輕蔑。

有些民衆說：「看起來沒有中國人的含蓄」，有的說：「應該畫得胖一點，誠懇一點」，有的乾脆批評：「很失望！」。

李登輝和教會之間

李登輝斡旋新約教會問題

1986年秋，台灣省高雄縣三民鄉雙連堀的山地管制禁令，終於開放了。國民黨和新約教會關係日益惡化的問題，因此稍見緩和，而在幕後推動這項開放政策的，就是李登輝。

雙連堀被新約教會教徒視為「錫安聖山」，開墾居住，但因生活制度特殊，遭到國民黨情治單位疑忌，而予以強力壓制，並將錫安山列為山地管制區，引起新約教會教徒的反抗，並走上街頭，與國民黨當局產生正面衝突，情況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於新約教會問題所引發的政治與社會不安狀況，極表關切，因此在幕後極力溝通新約教會與國民黨情治單位的觀念，企圖化解彼此的仇視心理。但因雙方立場都很強硬，李登輝的努力，並沒有太大的進展。不過，新約教會問題的

處理權責，由「警備總司令部」移至「內政部」「綠野專案小組」，已為新約教會問題的緩和乃至解決，埋下了伏筆，而這也是「警總」權力演變的一個象徵。

李登輝在近兩年來，權力與發言份量，有增無已，尤其是在台灣黨外宣佈組黨，國民黨積極加速政治革新政策之際，李登輝取代了嚴家淦的位置，出任國民黨中常委十二人小組總召集人，對於革新方案的快速順利通過，和對大陸探親問題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蔣經國對他的依偎日深，信任有加。

隨着李登輝權勢的增漲，新約教會問題的解決，也逐漸出現轉機。

1986年秋，黨外舉行的數次演講與街頭活動，都可以看到新約教徒高舉「暴政必亡」、「打倒蔣家政權」的標語，在羣衆之間示威抗議、頗令人側目，保守派人士因此目之爲「邪派」，發動各種傳播媒體予以圍剿。

新於新約教會問題，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強力取締，不容其過分囂張，不容其打擊國民黨政府威信，製造社會不安。以李登輝爲首的溫和派，則認爲強力取締的方法，對這些教徒根本不具嚇阻作用，反而會激起更大的衝突，不但影響國際視聽，也不利於政治社會的和諧安定，尤其是在當時86年底選舉將屆，問題若不早日解決，可能會更爲惡化，對國民黨更不利。

李登輝權力上升的象徵

李登輝一派的想法，透過「綠野專案小組」的運

作，逐漸影響了決策階層的動向，而李登輝權力的急速擴張，更使此一問題的解決，加速了脚步。終於，在兩大政治革新方案定案，而1986年12月選舉尚未展開正式活動之前，宣佈了開放雙連堀山地管制區的政策，其後新約教會問題初步解凍，這是國民黨處理新約教會政策的重大改變，也是李登輝的一大勝利。

當時這項開放政策的宣佈，還有一段插曲，原來國民黨「文工會」通知「內政部」於1986年10月21日宣佈雙連堀開放山地管制的消息，但隨後又立即收回此項通知，表示內容還未定案，暫時不要發佈，使得主管山地管制業務的「內政部」十分尷尬，也可見這項政策在保守派與溫和派之間，爭論是相當激烈，在定案之後，又差一點被翻案。相形之下，主管的「內政部」反而沒有插嘴的餘地。

拖延經年的錫安山山地管制問題，在李登輝大力斡旋下有了轉機，這一方面顯示了李登輝權力的上漲，一方面也反映了保守勢力的進一步挫折。1988年，在戒嚴令解除、台灣開放探親、通商往來不斷發展後，在李登輝等溫和派的聯手制衡下，預料未來數年間，國民黨保守勢力會逐漸縮減，若干情治特務，黨工單位的職權會遭到進一步被削減。

1987年底，一百多位教會牧師率領的一支示威隊伍，在台北市快車道上與鎮暴警察衝撞、追逐，一場嚴重的衝突眼看着就要發生了，但警察的封鎖却突然撤除……

長老教會的牧師與教徒爲了聲援因主張台灣應該獨立而被收押的蔡有全、許曹德，發動了一場台北街頭少見的示威。這一場示威使沈寂多年的長老教會再度變成了輿論焦點。也使李登輝感到尷尬和被動。

但是，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台灣長老教會又在1987年底再度成爲輿論的焦點；四百多位長老教會的牧師和教徒，爲了聲援因爲「台灣應該獨立」而被收押的蔡有全、許曹德，發動了一場少見的牧師上街頭示威行動，與鎮暴警察發生了嚴重衝突。鼓吹台獨的教會行動，使教徒李登輝頗感尷尬和被動。

牧師領銜走上街頭搞台獨

1987年10月19日下午一時四十分左右，長老教會設在台北羅斯福路三段的宣教中心樓下，由一百二十位牧師領頭的示威隊伍整裝待發。他們手上拿著大幅白色布條，上面寫著「立即釋放蔡有全、許曹德」、

「人人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等類的標語，緊跟著一百二十位牧師後面是男男女女的教徒，他們手中舉著貼有蔡有全與許曹德畫像以及書寫著「自決作主人」、「台獨無罪」等的木牌子。

在牧師聲援團整隊的同時，近四百名身穿鎮暴背心、手拿盾牌的古亭分局警員從四面八方湧來，堵住了在宣教中心附近的四個巷口，現場氣氛繃得緊緊的，隱藏著一觸即發的危機。

牧師聲援團在將近二點時，由莊經顯牧師帶領眾人唱聖歌、改編過的「咱們要出頭天」及作祈禱儀式，在閉眼默禱數分鐘後，遊行總領隊林宗正指著警察說，「我們一定要過去！」然後他率領隊伍，開始一步步走向警方的人牆，後面一波波的人羣終於形成壓力，與阻擋的警員發生猛烈的貼身推擠，人羣裏於是有人大喊「一、二、三、衝！」、「一、二、三、衝！」，雙方的接觸彷彿使力使錯方向的拔河比賽，不是向後拉，而是拼命向前推去，巷子內的居民也有人大叫，「不要上去，不要踩爛我的車，拜託，拜託！」但是雙方的人羣依然往前使力，沒有人理會這樣的拜託。

突破防線街頭奔逐

五分鐘後，牧師團已有三、四十人突破警方防線，直奔羅斯福路的快車道，路上許多行駛的車輛被這些突然跑出來的牧師嚇住，一聲聲緊急剎車聲不絕於耳，路上行人則紛紛走避。

而此時，尚有大部份的牧師及教徒留在警方又重新組合的封鎖線內，但在一陣的衝撞之後，警方的人

牆便告徹底潰散，教徒們一個個蜂擁而出，與隨後追趕的警員在快車道上奔逐，此時，平日佈滿各式車輛的台北市羅斯福路，當天卻被混在一起的警察與教徒佔據、狂奔。

奔逐中，教徒賣力地跑，他們說「我們不能被堵住」；警員也賣力地跑，說：「我們要把他們堵起來！」；行人道上旁觀者更賣力跑，想看看：「到底會怎樣？」就在台北古亭國小前，有了第一次的結局，警方再次擋住了教徒，但沒有多久，又開始了另一場競逐，但在師大路與羅斯福路交叉口，牧師聲援團終於被二排手拿警棍的警察徹底地堵起來了，牧師們看看前面、瞧瞧後面，有點茫然。

正當遊行隊伍受阻而不知所措時，台北市議員顏錦福在林宗正牧師介紹下出現在羣衆面前，他透過喊話器要大家靜坐下來，並且表示如果警方不核准遊行的話，他將帶領羣衆在此地絕食抗議。

警察撤走，羣衆內鬨

顏錦福說完話後，牧師邀請民主進步黨籍籍「立法委員」張俊雄出來「說幾句話」，一度坐下的羣衆又再次站起來，帶頭的牧師趕緊又要求羣衆坐下。在張俊雄簡短的談話後，顏錦福接下麥克風表示，國民黨警方已經同意這次的遊行，但他們等警察先撤走之後，再繼續遊行，底下一片掌聲，教徒們又唱起歌來。並高喊「團結爲自由」、「自由萬歲」。當日下午二時三十六分，堵在路口的警察與運輸卡車迅速從師大路方向撤退出去，教徒們一陣歡呼聲響起，重新整隊，高高興興地出發，由顏錦福、羅榮光、李勝雄等



▲民主進步黨的主流派寄望於「台獨」，勢將窒礙其今後發展。民進黨預計將逐步收縮和分裂。

人領導，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江鵬堅（1987年11月後，新主席為姚嘉文，姚嘉文也參加支持「台獨」的遊行）、「國大代表」周清玉（姚嘉文夫人）也隨同隊伍一齊前進，一路上，歌聲以及口號聲不斷，喊話者並且為他們阻礙交通的事向民衆致歉。

然而，一場意料之外的風波卻發生了。當遊行隊伍在三時左右行經和平東西路口時，《中國郵報》攝影記者林秀明與《自由時代週刊》攝影編輯宋隆泉兩人為搶攝影位置，在陸橋上大打出手，正當雙方難解難分之際，與宋隆泉素來熟悉的「文化台灣工作室」攝影記者鄭文堂對林秀明說：「你怎麼可以欺侮我的朋友！」便揮拳上來，三人扭打成一團。衝突中，宋隆泉的眼鏡被打破、斷裂，鄭文堂則因碰到天橋上的小泥柱導

致眼臉處損破，事後縫了七針。

至於林秀明則是項鍊被扯斷、攝影用的大型閃光燈被折斷，旁邊有許多攝影記者忙著勸阻，不少人並因此受到毆打，當三人之間的糾紛逐漸平息時，突然有一名瘦高男子，走下陸橋喊：「抓到國民黨的奸細了！」於是下面就有七、八名壯漢勇猛地衝上路橋將林秀明架下來，其間遊行隊伍的糾察人員雖然一面想阻止衝突發生，但是卻不斷有人以鞋尖和膝蓋踢打林秀明，幾分鐘後，林秀明才在同業協助下，向杭州南路口脫困而去，結束了這一場意外事件。

一切暫告平息後，牧師聲援團開始又以喊話器呼籲大家要理性、團結。開始整隊並且驅逐了侵入隊伍的民衆，接著，教徒又是一面唱一面喊地向前行進。

當日下午三時二十四分左右，遊行隊伍到達台北市愛國西路及南昌路交叉口時，「立法委員」尤清也加入他們的行列，與楊金海及二位長老教會牧師一同拿著上面畫寫「人人有主張台獨的自由」的白色布條前進。當隊伍走到重慶南路口時，從台北師專內跑出幾名穿鎮暴衣的警察排列在前往「總統府」的路口，隊伍裏面有人說「他們是怕我們走到總統府去的啦！」

下午三點四十分左右，示威隊伍抵達門口早已站滿武裝警察的高等法院檢察處前，一百二十名牧師分三排坐在階上，蔡有全與許曹德家屬及教徒則圍成圓圈端坐在前。

李登輝感到麻煩

尤清、顏錦福等人演講完後，蔡有全和許曹德的妻子在顏錦福、李勝雄及羅榮光牧師陪同下，進入「高檢處」遞交抗議書，由主任檢察官葉雪鵬代表接

受，他在接受抗議書後，並且詢問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顏錦福等人要求立刻釋放許、曹兩人，蔡有全的妻子說，「如果這個社會有正義，就該立刻放我先生。」此時在外面的牧師突然決定要向百姓致敬，於是一百二十名牧師一起站了起來向圍觀的民衆鞠躬。下午四點三十三分時，牧師聲援團告訴大家將要結束今天的活動，主持人林宗正拿著麥克風非常鄭重地說：「我們會不斷不斷地到這兒，直到蔡有全弟兄和許曹德被釋放爲止」，教徒們在歡呼聲中紛紛離去，一場驚險萬分的遊行告一段落。

由於李登輝也是長老教會的教徒，又經常斡旋教會和國民黨之間關係，此次事件，當然使他感到被動和尷尬。

少數宗教領袖要建立政治權威

在台灣，有少數的宗教領袖人物，仍然貪戀於政治舞台所扮演的權威角色，左手揮舞着十字架，右手揮舞着利劍，領導着信徒，向現實的政治權力進軍，他們說：這是爲了社會改革，使得「明日會更美好」的一項犧牲奉獻，正如羅馬帝國，將耶穌綁負在十字架上，具有相同的意義；台灣長老教會的總幹事高俊明，便是這類宗教領袖的典型人物。

——台灣長老教會先後發表了三篇政治聲明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使得這個宗教團體跟政治結下了不可分離的關係，高俊明顯然想由宗教領域跨入政治領域中

從以往的表現，我們可以認定台灣長老教會，正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宗教團體，尤其在高俊明的主持之下，充分顯露了一切以向政治的現實權力進軍的目的。其政治主張，也與海外的政治組織遙相呼應，因

此設有重重禁忌關卡的國民黨，也不得不對台灣長老會網開一面了！這中間的原因，大概是真的投鼠忌器，或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高俊明是1970年擔任長老教會總幹事職位，自他上台之後，由於先後以教會名義，發表了三篇政治主張，使長老教會的「宗教其外」更形象化。三次宣言的時機，又揭示了長老教會有跟美國呼應的明顯姿態：

先後發表了三篇政治主張

—1971年12月19日，美國總統尼克遜往訪中國大陸的前夕，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宣稱台灣住民的人權是上帝所賜，台灣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住民，呼籲台灣政府採取「德國模式」，以突破難關，並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以利民主團結與國際尊嚴。

—1975年11月18日，長老教會又選擇美國總統福特訪問中國大陸前夕，發表了第二篇政治主張：《我們的呼籲》，除了再度強調「國是聲明與建議」的內容之外，並促請政府誠意地推行民主政治，以建立平等公義的社會。

—1977年8月16日，正值美國國務卿范錫前往中國大陸，長老教會見前兩次政治言論並無反應，針對美國總統卡特標榜的「人權」運動，發表了一篇《人權宣言》，公然向卡特提出呼籲，希望卡特「本着人權道義的精神」，尊重一千七百萬台灣住民的「人權」，促使「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爲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主張台灣成爲新而中立的國家

儘管高俊明一再表示，這三次政治言論主張，他本人並非唯一主導者，是基於教會大多同仁的看法。但是，長老教會是個歷史悠久的宗教團體，從以往的歷史中，找不出一項與高俊明時代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政治主張，更令人疑惑的，高俊明的政治主張，又與海外政治人士的政治主張不謀而合。

自中世紀以來，宗教對政治權力的影响，分爲三個時期：掌握—干預—關懷。因此傳統的關懷，最能符合宗教的教義，高俊明的關懷是什麼？他說：「假如台灣仍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那麼，中共就隨時使用武力；但是，假如台灣和大陸分離，中共便必須謀取對台灣之事再加考慮，因爲它必須對爆發的國際事端付出代價。」一句話，透露出他的意圖。

台灣最大的一個基督教派

基督教長老教會，是台灣最大的基督教派。從歷史來說，清朝的穆宗（同治）時代便傳入台灣。當時大約是1867年，清同治6年，距今已有120年的歷史，當時台灣尚未割讓給日本。在組織上，採取「民主代議制」，堪稱民主典範，如今信徒達17萬餘人，以大甲溪爲界，分爲南、北兩派，南派以台南爲宣教中心，北派以淡水爲宣教中心。日據時代，南、北兩派曾經合併，光復後又分裂。1951年再次合併，仍以南派的勢力較大，設總會於台南，總會以下分設15個中會，中會以下有各事工委員會，目前全省有962個教會，散佈在台灣各個角落。

高俊明這個人

高俊明於1929年出生於台南，父親是一位醫生，高家是台南望族，家境富裕，但高俊明幼年時身體孱弱，時常鬧病，幸虧父親是醫生，減少他不少痛苦。也許是體弱多病，或經常目覩父親診所的病人痛苦呻吟，使他產生人溺己溺的觀念。因此，一旦完成中學，便進入神學院，並主動要求投身山地，做傳教工作。整整四年，他足跡踏遍屏東、南投等每個山地部落，進而披荆斬棘，在花蓮創辦了一所玉山神學院。往後13年，他每天帶領學生，半工半讀，風雨無阻，在一片蠻荒中，耕種、開路、整地、造屋，忠實地體驗教士的犧牲和奉獻精神。

要以教會關懷促進政治力量

爲了充實傳教學識，高俊明曾經到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研究，西方的民主作風，啓迪了高俊明的政治思想，從人民的實際疾苦生活，他瞭解光憑教會之力，想使人類社會實現改革是不夠的，以教會的關懷，來促進政治的力量，必然發生積極的效果。

長期的傳教，以及更深入的教義研究，使早期的高俊明孕育成一位德育兼備的慈愛教士，人格的教化，更讓他養成待人寬容的美德，在長老教會中，其聲譽日隆，備受推崇。這時，教會的派系紛爭，愈演愈烈，高俊明在衆望所歸之下，輕易地接掌了總會總幹事職位。

高俊明自認對行政沒有興趣，但是，由於他待人謙沖，寬容性強，協調折衝，化解了南、北兩派不少

的衝突。其實，我們從他一連串政治作為上來看，高俊明是有強烈的領袖慾的，一方面他打破了長老會百多年保守政治中立的原則，同時也導致整個教會，由消極的宗教傳道機構，轉為積極的地方政治團體。正如高俊明形容自己的人生「充滿着風雨」，也領導了長老教會，本着特強的台灣鄉土意識，邁向了「充滿着風雨」年代。

一直在地方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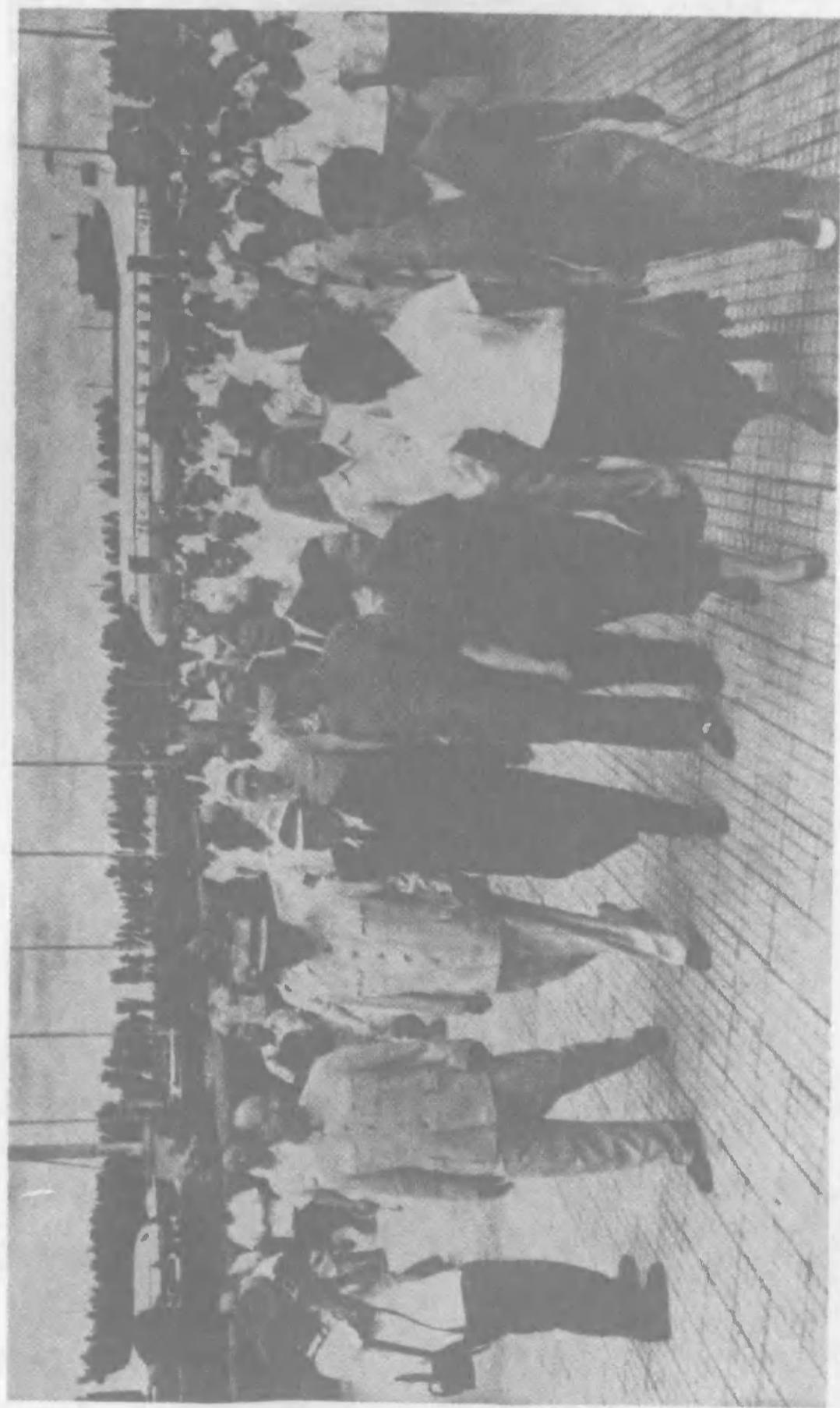
高俊明把他的政治主張，自稱為「高貴的宗政家情操」，加上特強的台灣本土意識，很自然便與地方政治勢力結合，便一直在地方選舉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將長老會人士，與當前黨外運動的支持者相互之間的混合型態，加以分析，究竟是黨外運動透過長老教會的宗教立場，作為掩護？還是長老教會，透過黨外，表達其政治理想和主張？又或者美國給予他們多少影響？殊難斷定。但是，長老教會的組織結構，以及宗教傳教的精神，因高俊明的領導，逐漸轉化為複雜的政治團體，則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長老教會示威，用詞的尖銳，令李登輝頭痛。



◀來自台南神學院的牧師林宗政，在「五一九」示威行動中，登台演講。



▲1965年7月，前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飛返北京，周恩來到機場歡迎。李登輝將來會步李宗仁的後塵嗎？

台灣政要的宗教信仰

台灣重要人物的宗教信仰

宗教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由於宗教也是個「組織」，當它和當政者合作時，當政者就會獲得極大助力。反之，當政者就會遇到相當的煩惱。

宗教與「一國兩制」

國民黨當然了解宗教這個資源的重要性。它很嫻熟地將宗教力量納入自己的體制，國民黨的權貴們由於自己的信仰而加入某些宗教後，也都會很積極的參與政務，使宗教更加的體制化。

中國乃是個沒有國教的國家，因而外來的與固有的宗教類別極多，相互競爭。大體而言，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外來的強勢宗教係以強者的角色進入，高階層人物傾向於信仰外來強勢宗教（如基督教），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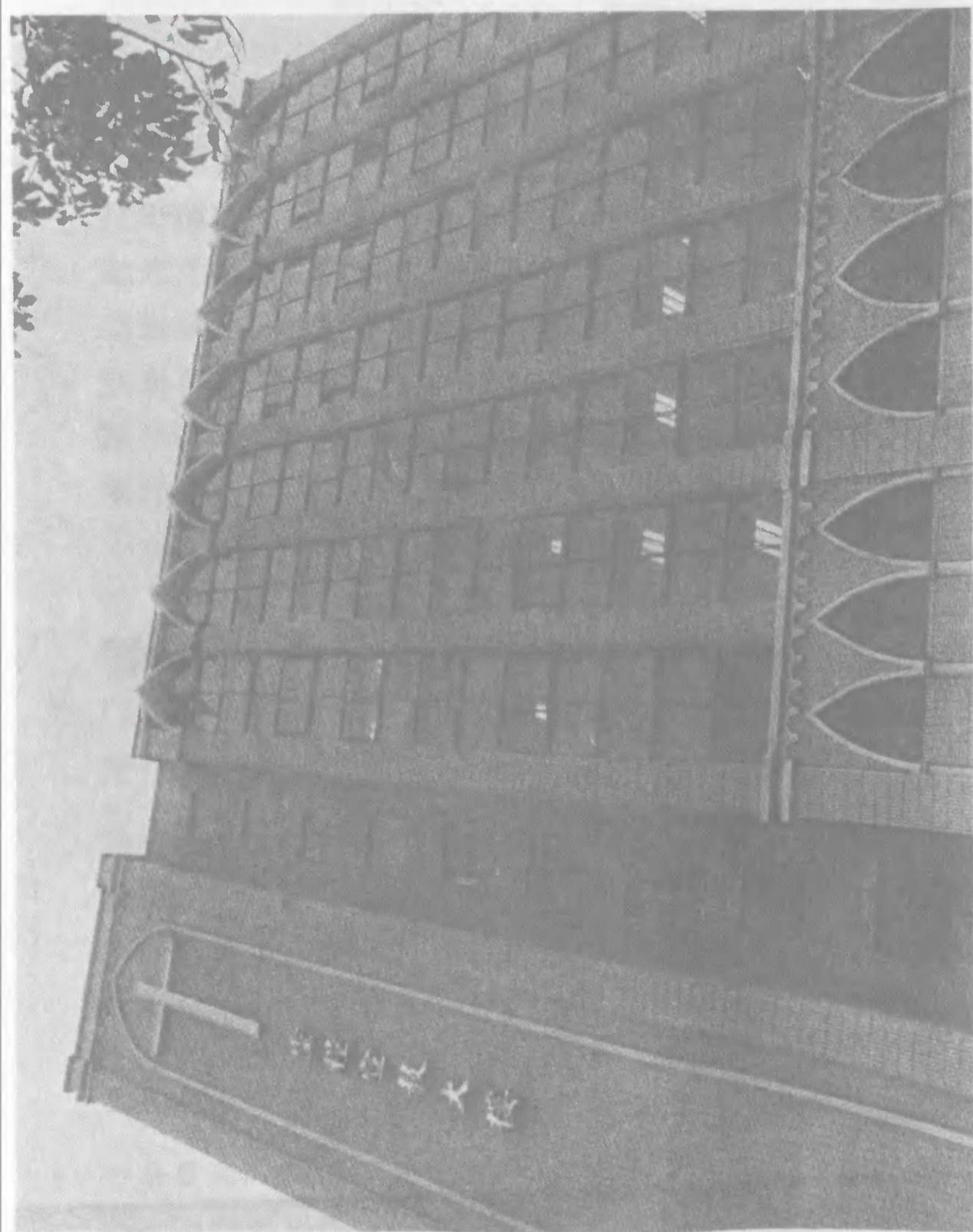
民們則多信奉中國固有的草根性宗教。

中國既然要實行和台灣達成統一，要落實「一國兩制」，不可不深刻體會到台灣的宗教狀況和輿情。在台灣，最強勢的乃是基督新教（即通稱的基督教）。由於宋美齡是美國美以美教會的虔誠信徒，蔣介石也成了基督教徒。在來自上面的示範作用之下，台灣大部份權貴要人們也都基於自由選擇或基於仿倣的心理，而成了基督徒。

台灣權貴信仰基督教的最多

台灣國軍黨，權貴們信仰基督教的最多，計有：張羣（「總統府」資政）、何應欽（「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蔣緯國（台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李登輝（「副總統」）、張繼正（「中央銀行」總裁）、宋時選（前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裕台」董事長）、沈之岳（前「調查局」局長）、廖祖述（前總政戰部執行官）、梅可望（東海大學校長）、阮成章（前「調查局」局長）、張光世（前「經濟部長」）、陶希聖（前國民黨中常委）、阮大年（「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辜振甫、李國鼎、唐振楚（前「總統府」副秘書長、考選部長）、張明哲（前「國科會」主任委員）、陳樹曦（前「交通部」政務次長）、方治（前「救總」副理事長）、張建邦（淡江大學董事長、台北市議會議長）、吳嵩慶（前唐榮公司董事長、「聯勤」副總司令）、嚴家淦、柯丁選（前「行政院」顧問）、黎世榮（前「中廣」總經理）、曹聖芬（前《中央日報》董事長國民黨中常委）、馬星野（前中央通訊社社長）、蔡培火（台灣紅十字會理事長）、張學良、蔣孝武、蔣孝勇……等

台灣政要權貴人物中，
以信仰基督教者最多。
圖為台灣的基督教靈糧
堂。



等。

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領導階層，普遍都信奉強勢的外來宗教。台灣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和美國關係密切，自然更不例外。

台灣國民黨的領導層多信基督教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包括以前的大陸和現在的台灣，近代幾次基督教的奮興運動（指加強海外傳教）都是重點，基督教遂取得較強的優勢。

天主教在台灣影響力不如基督教

至於天主教方面，本來從明代時，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即已到達中國，不過後勢不繼，來台灣的傳教工作也稍嫌緩慢，因此其成效不及基督教。國民黨政經要員中，較著名的天主教徒也少，似乎只有蔣復璁（前「故宮博物院」院長）、董樹藩（已故台灣「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敦華（「民社黨」創黨人張君勱之女，台灣「立法委員」）等比較少的幾個人。

在台灣，國民黨管政治，天主教管思想。

不過，天主教雖然在台灣政經方面的要人信徒較少，但因天主教熱心辦學校，它在學術界思想界卻頗有勢力，這或許與天主教神職人員不得婚配，因而遂能專心擴展有關。據了解，目前台灣主要大學的哲學系差不多都由天主教教友所掌握。因此，學術界有笑話說：「國民黨管政治，天主教管思想。」

至於外來宗教中的伊斯蘭教，在台灣只能算是小型宗教。知名的公眾人物有定中明（國民黨資深外交

家，爲阿拉伯文及阿拉伯問題專家）、石永貴（「台灣電視公司」總經理）等寥寥數人而已。

台籍權貴多信民間宗教

最近在台灣上行情看漲、非常活躍的是摩門教。摩門教乃是唯一由美國人創辦的基督教派，總部設於美國猶他州的鹽湖城，代表了美國的保守力量。因此，前次美國列根總統特地選定鹽湖城爲共和黨大會的召開地點，摩門教因而聲名更噪。近年來，摩門教在台灣宣教甚力，「行政院」青輔會前主任委員姚舜即這個教會的台灣負責人。摩門教的美國教友均有服宣教役的責任，台灣大街小巷常可看到騎腳踏車，衣裳很規矩的兩個外籍青年男子，那就是摩門教的傳教士。

外來宗教雖然在台灣已有可觀的教勢，但比起來，最主要的仍然是儒釋道不分的民間宗教，台灣差不多出身於草根的政要人物都屬於這一類，如邱創煥、林洋港、林金生、吳伯雄、蔡鴻文等都可以說是民間信仰的信徒。民間信仰的信徒除非是「居士」或「道親」，多數都是見寺也拜，見廟也拜。信仰的不清楚也有不清楚的好處，那就是親和性可以增加。據說，曾任台灣省議會議長的蔡鴻文，乃是參與寺廟活動的積極份子。中部的好幾個大寺廟他都是廟董。

目前台灣的各大小教派都愈來愈熱心於傳教活動，小教派由於缺乏要人作教徒，傳起教來都比較困難，甚或有被人誣爲異端之可能。而有要人信奉或稱領導的教派或道場，卻會有信徒不請自來的情事。

宗教也有政治趣味

以台灣「禪宗大師」巴壺天的法壇為例，稍早前他只在台灣佛法界聞名，然而有一次他的禪書被蔣經國所鑑賞，很快的許多有意攀附者即紛紛求請收為門下。

再例如，「政務委員」李國鼎乃是台灣科技界的龍頭，他在士林某教堂做禮拜，因此每到星期天，該教堂即科技界年青新貴雲集，宛若開遊園會，人人均呼李國鼎為「李兄弟」(Brother Lee)，蓋喻大家都是「主內兄弟」之意。

宗教乃是另外一個非政治的政治部門，宗教界裡有著太多政治活動的空間。權貴要人們進入宗教界，即可利用宗教作為自己政治上的動力來源，或者舉辦「護國法會」，或者舉辦「建醮祈福法會」，或者舉辦「護國平安祈禱大會」，於是，宗教的正面功能即可發揮。宗教經常是政治的輔翼，目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政教衝突存在，台灣雖然也有一些小糾紛，例如和「長老會」一些熱心人士的鬥爭，但比起來卻小得多了。

台灣權貴要人們除了他們本身的功能外，他們以閒暇時間積極參加宗教活動，這個附帶功能所產生的作用是很微妙的。

高爾夫球和北京狗

李登輝的高爾夫球

李登輝高爾夫球打得好，是眾所週知的。每例假日，如無要務，李登輝和夫人總是一桿在手，徜徉於藍天綠野之間，在他從前任台北市長及台灣省主席時，因公務繁忙，很少有時間活躍球場，自從出任台灣「副總統」之後，休閒時間較多，無論長庚、淡水、國華或中國信託自用球場等，常可見到李登輝和夫人揮桿的雄姿。李夫人的球技，本來不怎麼樣，但經過李登輝的悉心指點，目前雖然沒有達到職業水準，然而就業餘水準而言，也算是一流高手了。

李登輝的球友，以工商界的富豪居多，多半也是李登輝以往的老朋友。常和李登輝一同揮桿的，以古濂松為最多，李登輝臂力特強，開球又直又遠，連業餘球友所拿捏不準的短桿，他都能處理得恰到好處，不僅時有「博蒂」出現，也曾有過一桿進洞的佳績，在

國民黨軍政要員中，以**宋楚瑜**的球技最好，他和**宋長志**將軍、**汪道淵**、**鄭爲元**上將等都是個中好手，但較諸**李登輝**，則似乎又略遜一籌。

李登輝打球極有耐力，十八個洞非一氣呵成絕不中止，有一次風勁雨急，絕大多數球友皆偃旗息鼓，唯獨**李登輝**撐著雨傘，也要把球打完，由此可見其毅力與沈迷程度，打完球，據說**李登輝**會到櫃台付賬，然後到一般球友更衣的地方去沐浴，毫無架子。

愛好運動的人都知道，打球的時候會忘記年齡與身份，有時球道太擠，球友爲了尊重**李登輝**，自動禮讓他先打，但據說**李登輝**絕不插隊。

1985年秋冬之際，**李登輝**在長庚球場揮桿，一位隨從被某位工商鉅子，一球打到嘴唇上，皮開肉綻，血流如注，送到醫院後，**李登輝**隨後也趕到醫院去探視，好在那位隨從傷的並不很重，只是人中部份，縫了好幾針，前後大夥開玩笑的說，免費美容，真是因禍得福。但隨從因其玩球而受創，也算不幸了！

打敗其他國民黨要員

1987年12月13日，台灣淡水大屯高爾夫球場正式開放十八洞，**李登輝**和「內政部長」**吳伯雄**、「外交部長」**丁懋時**、台北市市長**許水德**等國民黨政界要員曾到場一顯身手。大屯高爾夫球場的新會館落成酒會亦同時舉行，**李登輝**夫人則應邀剪綵。

李登輝是於13日中午十二時卅分，在大屯球場揮出第一桿，至下午四時打完十八洞的成績是八十五桿（**李**的差點數爲八），與**李登輝**同組的各人成績依次爲：前「經濟部長」**徐立德**八十六桿、台北市市長**許水德**九十三桿及「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九十七桿；

另一組的各人成績則依次爲：「內政部長」吳伯雄九十七桿、國民黨中央青工會副主任徐抗宗九十七桿、「中央銀行」副總裁俞政一〇五桿，「外交部長」丁懋時，只打了九個洞，成績爲四十九桿。

李登輝在揮桿前曾打趣說，大屯球場距三芝鄉老家很近，退休後他就可以天天來打球了。

李登輝與北京狗

有關李登輝生活的另一則小故事是，李登輝喜歡北京狗。話說某日下班回來，李登輝心愛的那隻北京狗，搖頭擺尾，直往李登輝身上跳，李登輝也如往常一樣，摸摸「她」的頭，這一摸摸出了毛病，也許是狗正值思春期，情緒煩躁，張口就咬，弄得安全人員好不尷尬。蓋參謀作業中從未將「小犬」列入「安全顧慮」也。

李登輝看台灣農業

李登輝與台灣農業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台灣回歸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台灣回歸中國四十三年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人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變化，在這當中，農業的變化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台灣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本來就較大陸農業為早，遠在1920年時，化學肥料即已開始施用於台灣農田，農會組織的建立也為農業人力資源的運用奠下初步基礎，相對安定的社會秩序，為台灣穩定的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所以台灣農業現代化奠基甚早，基礎亦佳。例如自1930年起，台灣稻穀產量大增，約為1900年時候之三、四倍，全島稻田面積與每公頃產量亦增加一倍，1938年稻穀產量已達日據時期稻穀生產之最高點矣。但日本殖民政府發展台灣經濟，其目的

乃為補充日本經濟之需要，故在台灣努力增產稻米，以應日本國內需要及彌補外匯赤字。所以，台灣農業發展之型態不僅與大陸農業有所不同，其所面臨的問題亦因之有所差異。1945年10月回歸中國以後，五十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帶來了繁榮的農村經濟，也創造了穩定的鄉村社會政治秩序；此後的技術改良則不斷地提昇農業科技與品種水準，使農業部門有足夠的剩餘資源來支援工業部門的發展，造就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工業起飛，「經濟起飛」的局面。

土地改革奠定工業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農業經歷了一段戰後復原重建的時期。1949年，國民黨政府失敗遷台灣後，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先是在1951年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繼於1952年實施「公地放領」政策；又於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這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台灣農村社會產生了影響，它改革了舊有的租佃制度，扶植自耕農，轉移土地投資於工商業，並間接地促進農業產量的提高，為工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1953年開始，台灣農業政策的擬定就以「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為最高指導原則。在這項指導原則之下，自1953年至1972年的近廿年之間，台灣農業政策可說是以「發展的榨取」（Developmental Squeeze）為其特徵。換言之，亦即是從政策上採取措施來促進台灣農業生產的提高，以製造人力及物力的「剩餘」（Surplus），並將此種「剩餘」轉移到非農業部門。李登輝指出，自1895年至1960年間，台灣農業部門一直有大量的資本流入非農



▲李登輝對農產物價十分留意。

業部門，這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工業得以起飛的重要原因之一（參考：李登輝，《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收入：余玉賢主編，《台灣農業發展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年），頁二二九～二五一）。論者嘗指出，台灣農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1910年到1920年為農業發展的初步階段，日本資本與技術的輸入，以及耕地面積的擴充，是這個階段中農業生產擴張的兩個主要因素；從1920年到1939年，台灣農業發展的規模，在以日本資本及技術人員扮演重要角色的殖民地制度下繼續擴大，不過比較著重于作物的單位收穫量的提高。在第一期的前後兩期中，台灣經濟與日本經濟密切聯繫，作為一個殖民地，台灣本島供給日本食糧和原料，並自日本輸入肥料和其他工業品。(二)、從1939年到1945年，整個台灣的經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農業在生產及肥料的使用兩方面，都呈現下降的趨勢。(三)、在1945年10月，台灣重歸中國的版圖後，農業的發展以復原及重建為其特徵。從1946年開始，約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台灣的農業已從戰爭的破壞中，完全恢復至戰前水準。而促成農業恢復的主要因素是：(1)、化學肥料的輸入和使用增加，(2)、水利設施的大量修復和擴充，(3)、改良的及新的農業生產技術的引進，以及(4)、土地改革的推行，給與耕種者以增加生產的誘力。此外，戰後台灣經濟的條件與戰前大不相同，因為日本與台灣間的殖民地經濟關係已不復存在，台灣開始從事其海島性經濟的活動。在輸出農產品與輸入農業生產用品方面，它必須應付至為不同的市場和價格情況。(四)、自1952年以還，台灣的農業已經進入資源與技術開發的第四個發展階段，以滿足人

口漸增的需求，並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見李登輝、謝森中，《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投入產出及生產力之研究》，收入：黃俊傑編，《面對歷史的挑戰》頁一一八～一一九。）

自1895年至1960年間，台灣農業部門一直有大量的資本流入非農業部門，這是台灣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工業得以起飛的原因之一。在這種「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領導之下，台灣農業從1965年「第三期經濟建設計劃」完成以後，危機便逐漸顯露；至到七十年代初期，這種農業及農村的危機更加深刻化。

從1968年開始，台灣農業的危機已很明顯地出現於幾種經濟指標之中。從表一中，可見到台灣農業成長率的急驟下降，從1965年～1968年的5.7%降為1969年～1972年的1.5%；農業生產佔島內生產淨額比率下降，從1965年～1968年的24.9%降為1969年～1972年的16.4%；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率以及農產品佔總出口比率也都顯著下降：

這種變化在其他社會性的指標上也可以得到類似的反映。這種危機的深刻化終於使得國民黨政府在1972年9月27日宣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努力把農業政策的目標從過去的「擠壓」轉化為「平衡」。

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在經濟指標上所看到的農業危機激發了台灣各界人士一致的關懷，大家認為，農業危機的形成，基本上是由於台灣農業與工業部門的不均衡所導致的。誠如李登輝所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基本上是非農業部門的相對擴張，而是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故經濟發展愈迅速，經濟結構的轉變愈大，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間更易容易發生產品供需脫

表一 臺灣農業經濟重要統計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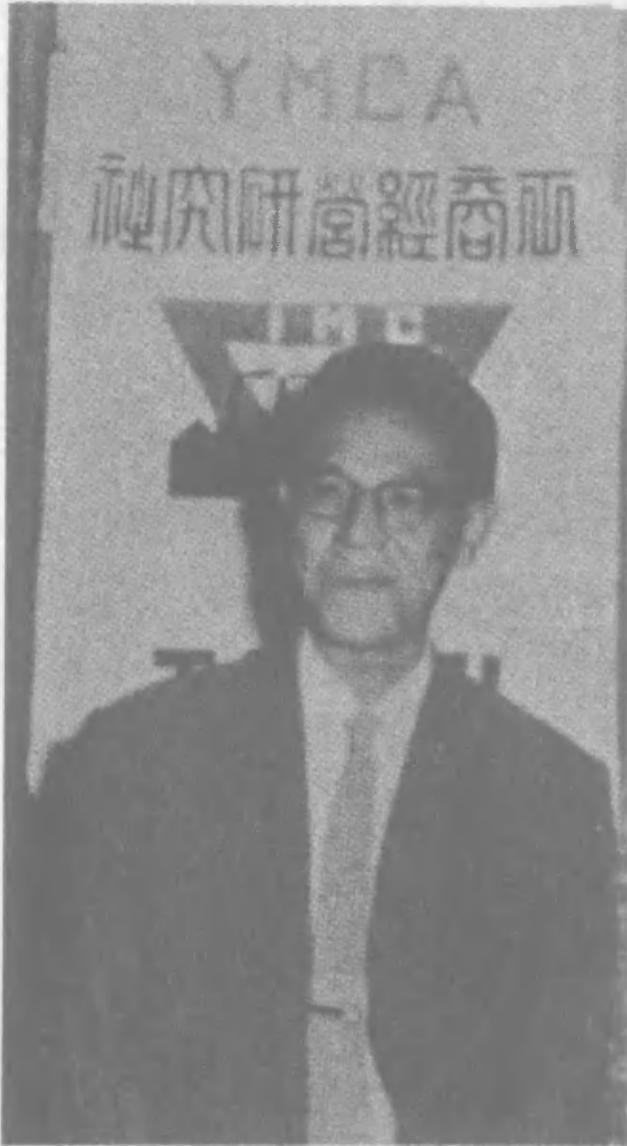
	(年份)										
	五三至五七	五七至六一	六一至六五	六五至六八	六八至七二	七二至七六	七六至八〇	七八年	七九年	八〇年	五三至八〇年
經濟成長率	八·一	七·〇	九·一	九·九	一一·六	七·八	九·六	一三·九	八·一	六·七	九·〇
農業成長率	四·九	四·二	五·八	五·七	一·五	三·三	一·六	一二·二	五·三	一一·〇	三·八
農作物	四·〇	三·一	四·八	四·五	〇	二·七	一〇·五	一四·八	三·五	一一·八	二·六
林產	一·七	一五·二	九·五	〇·三	一〇·九	一六·三	一九·八	一三·二	一〇·二	一六·四	一·一
漁產	一一·一	五·八	八·八	一三·六	六·一	五·七	五·九	三·二	八·九	二·六	八·一
畜產	八·七	四·七	六·九	八·九	六·八	七·一	七·一	四·三	一〇·九	〇·一	七·二
農業生產佔台灣生產淨額比率	三三·六	三一·五	二八·九	二四·九	一六·四	一四·二	一〇·八	一一·三	一〇·四	九·一	
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比率	五四·三	五一·〇	四九·六	四三·八	三五·九	三〇·一	二三·二	二四·九	二一·五	一九·五	
農產品出口佔總出口比率	九一·八	八二·九	五九·五	四五·〇	二二·五	一三·二	一一·〇	一一·三	一〇·〇	九·五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統計要覽》（台北：農發會，一九八一），頁一—二。

節、資源利用相競爭現象。特別是在現代化企業的工商經濟與以家庭農場為主體的農業並存之雙重性經濟結構下，上述兩部門互相依存的關係更顯得複雜，使農工不平衡趨於嚴重。（見李登輝，《農工不平衡發展的癥結與其解決途徑——兼論農業結構改善問題——》，收入：《台灣農業發展問題》（台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1971年4月），頁二六。）

由於農業危機的形成基本上乃肇因於經濟結構上農工的不平衡，所以農產品價格偏低以及農民生活的不能改善……等現象就不容易有立即的改善對策。呈現在七十年代台灣農村社會的是農村勞力的欠缺、勞力的老化與婦女化、肥料價格居高不下、糧價低落不敷成本、運銷制度不合理、農民遭受商人剝削……等現象，這種種現象共同烘托出一幅農村社會經濟衰落的景象。台灣許多省級民意代表對這些情況也感同身受，在省議會發言時，指出農村的崩潰與農民收益的偏低是由於農業部門與工商部門的不均衡所致。早在1969年4月，一位台灣省議員便說：

農民生活不安定，是整個農業政策推行的失敗，而農業政策推行失敗，農民生活發生困難，其最大的原因，就是農產品的利潤分配情形不太平衡，以致影響農村經濟很大，普通自由國家的物價，是以供求而確定物價，但近年來發生很多怪現象，舉一個例，有一個農民告訴我說，某一菜市場，頭一天曾有十輛貨運汽車香瓜運到，其每斤價格為一元五角，次日僅有二輛貨運汽車香瓜運到，其價格却跌為八角。這不是怪現象嗎？這不過舉一個例，而其他的農作物亦都如此。再以黃豆來說，每屆黃豆收成時，商人又大批黃豆進口，以致影響黃豆的價格。本日上午局長說予以



◀ 台灣「農復會」時代的李登輝。

▼ 五十年代時，李登輝全家合照。



禁止，我感到這個辦法很好，不過還應請局長注意到商人囤積的問題，如果禁止進口辦法一公佈，奸商即投機取巧，即行設法囤積，俟黃豆即將收成時出售，這也是使農民太大的吃虧，所以目前農村經濟不能穩定，農民生活不能提高，其最大原因為利潤的分配相差太大，因此我認為工商業者固然要賺錢，但對利潤一定要分配妥善。

由於農工不均衡，農業收益太低，不足以維持生活，所以台灣農民紛紛轉而尋求農業外的收入。1971年1月，吳豐山（現任台灣《自立晚報》社長）巡迴全省農村訪問，就對這種農村經濟的衰落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寫。他以當時彰化縣秀水鄉為例說：

稻作之外的雜作收入，現在反而比稻作要好。但是不管是紅麻也好，豆子也好，油菜也好，收入究竟還是有限。這一來純粹要靠田地吃飯，自然就得別作打算了。秀水鄉的農民怎樣一個打算法呢？最先，他們是不種水稻，改種柑桔，稍後又找到了葡萄。最近更「變本加利」，乾脆挖池養魚了。假如我們說稻作在此碰到絕路，一點也不過份。種柑桔、葡萄以及養魚，到底收益如何？據秀水鄉農會推廣組林良坤說，柑桔平均是稻作的六倍收益，最好的時候，曾經高到第一期稻作的十倍收益。種葡萄比柑桔還要好一點，大約可以收到第一期稻作同單位面積收益的十二倍。挖池養魚收益較差，但也有三至四倍的收益。而且有一個好處，即管理方便，作工較少。

從1954年台灣回歸中國後至1972年，台灣從第一階段的「擠壓」走向第二階段的「平衡」為目標的發展，至1983年3月，由李登輝當省主席的台灣省政府公布實施了「八萬農業建設大軍之遴選及組織要點」，是為

對症入藥的措施。而當時聲稱具體落實這項工作要點的政策構想有三：

一、建立八萬農業生力軍。

二、重建農民信心。

三、開創農村新面貌。

爲了實現以上的政策構想，李登輝當省主席的台灣省政府，當時曾擬訂了下列的相關措施：

一、輔導八萬農建大軍相關措施——第二階段農地改革：

(1)農地重劃——便於八萬農建大軍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及農業機械化之推行。

(2)推行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以八萬農建大軍爲核心，推行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

(3)提供擴大農場經營規模購地貸款——八萬農建大軍成員，願意購買農地以擴大經營規模者，給予資金方面之協助。

(4)加強推行農業機械化——輔導八萬農建大軍以農業機械實施農業經營。（見《八萬農業建設大軍之遴選及其組織要點》，南投：台灣省政府農林廳，1983年3月，頁1～2）

二、重建農民信心的相關措施：

(1)建立完整產銷體系，提高農民收益。

(2)加強農業科技推廣教育，改進農業生產。

(3)健全農民組織，促進農業專業企業化。

(4)增進農業機關與農民團體之聯繫、協調，提高農業行政效率。

(5)農業與貿易單位配合，以適度保護農業。

三、開創農村新面貌之相關措施：

(1)開闢產業道路、農路及改善水利設施。

- (2)農村公共設施之興建、整修與維護。
- (3)推動農民住宅整建、新建工作。
- (4)加強農村之醫療設施及籌劃農民健康保險。
- (5)加強推行農村家庭計劃。
- (6)辦理四健會教育及康樂活動。

從政策及相關措施的內容來看，台灣「農民」及「農村」問題似乎獲得了更大的重視。可惜的是，其後並未進一步執行，而1984年李登輝當上「副總統」後，這項政策更是有所廢弛了。

那麼，台灣農業今後應怎麼辦呢？筆者試下面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農工不平衡發展形成農業危機

近年來，農業在台灣經濟結構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農民收益偏低，所以農民逐漸對農業產生疏離感。台灣回歸中國初期，捨農業以外，台灣工業、商業尚未發達，在農業為主宰的社會裏，沒有其他產業有能力和農業競用資源，加上國民黨政府失敗遷台灣後，台灣一時間增加了二、三百萬人，糧食需求殷切。在這種環境裏，農業即使不積極謀求創新，依樣可以主宰產業社會。但自從七十年代台灣工業急速發展以來，工商業界急起直追，向農業競用人力、資本、土地等資源，以高生產力和高效率提供各種產出，不但後來居上，總產值遙遙領先，且使農業望塵莫及。例如1982年，農業佔台灣全省NDP僅有9.2%，但農業就業人口，尚佔全省就業人口19.8%，農業生產力及效益之低，可謂情形相當嚴重。

造成農業低生產力之主要原因，乃在小規模農業

經營不易全面機械化，勞力及其他投入資源費用昂貴，農產品又以內銷為主，產品價格低。反之，工業商業經營規模繼續擴大，生產和經營成本低，產品又以外銷為主，故產品價格較易提高。易言之，在雙元經濟體制下，工業以大齒輪行動，而農業則以小齒輪行動，兩者雖然一樣在前進或進步，但兩者的前進速度差距，不但不易彌補，反而有加大之現象，是為台灣農業發展之主要困境。

當前台灣農業建設所面臨的問題雖複雜萬端，但可凝結為一個大問題，這就是：如何面對主觀及客觀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謀求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的整合發展？換言之，台灣今日所面臨的嚴肅課題在於：如何在農業成長、鄉村發展與農民福利三者獲得整合而均衡的發展？

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之學說有農業發展、鄉村發展、農業推廣教育等三大門別。農業發展的重心在農業生產、農村發展強調環境社會之改進、農業推廣教育則以開發農民的人力資源。農業發展及農業推廣教育之對象大都限於農民，而農村發展則包括所有鄉村居民，舉凡交通、治安、政治、教育、衛生、經濟等等建設都和鄉村發展有關，牽涉範圍異常廣泛。

展望未來，在農業人力資源發展途徑方面，可粗分為正式學校教育及推廣教育兩種方式，後者乃指農業推廣機構之農民教育工作，欲使農民教育落實，在教育內容上，應配合農作物有利發展趨勢，加強企業化的管理教育。例如種植蔬菜果實比傳統的糧食作物有利，而果實當中，每千公斤生產值及效率優劣，依序為葡萄、梨、芒果、柑桔、香蕉。台灣的農業推廣

教育應灌輸農民象這樣的市場消息。

和提高人力資源素質及有效企業經營有關的是農民組織之企業化問題。台灣的農民組織主要有青果合作社和農會。尤其是農會遍及全省，規模龐大，為一多種目標的複合組織，而其運作上缺乏企業管理所要求的各種條件。首先它的經營目標太複雜，有所謂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經濟等目標。欲配合農家農場企業經營，應將農會改為專業性經濟性合作組織，或容許作物別農民組織之產生。如此一來，農民、農民組織、市場間之連鎖關係才能密切，而增進農業企業管理效率。農民組織企業化後，對專家人才之需求才會提高，一樣的道理組成農民組織的農民本身才會覺得需要提高本身的知識和能力。如此，農民人力質素才能全面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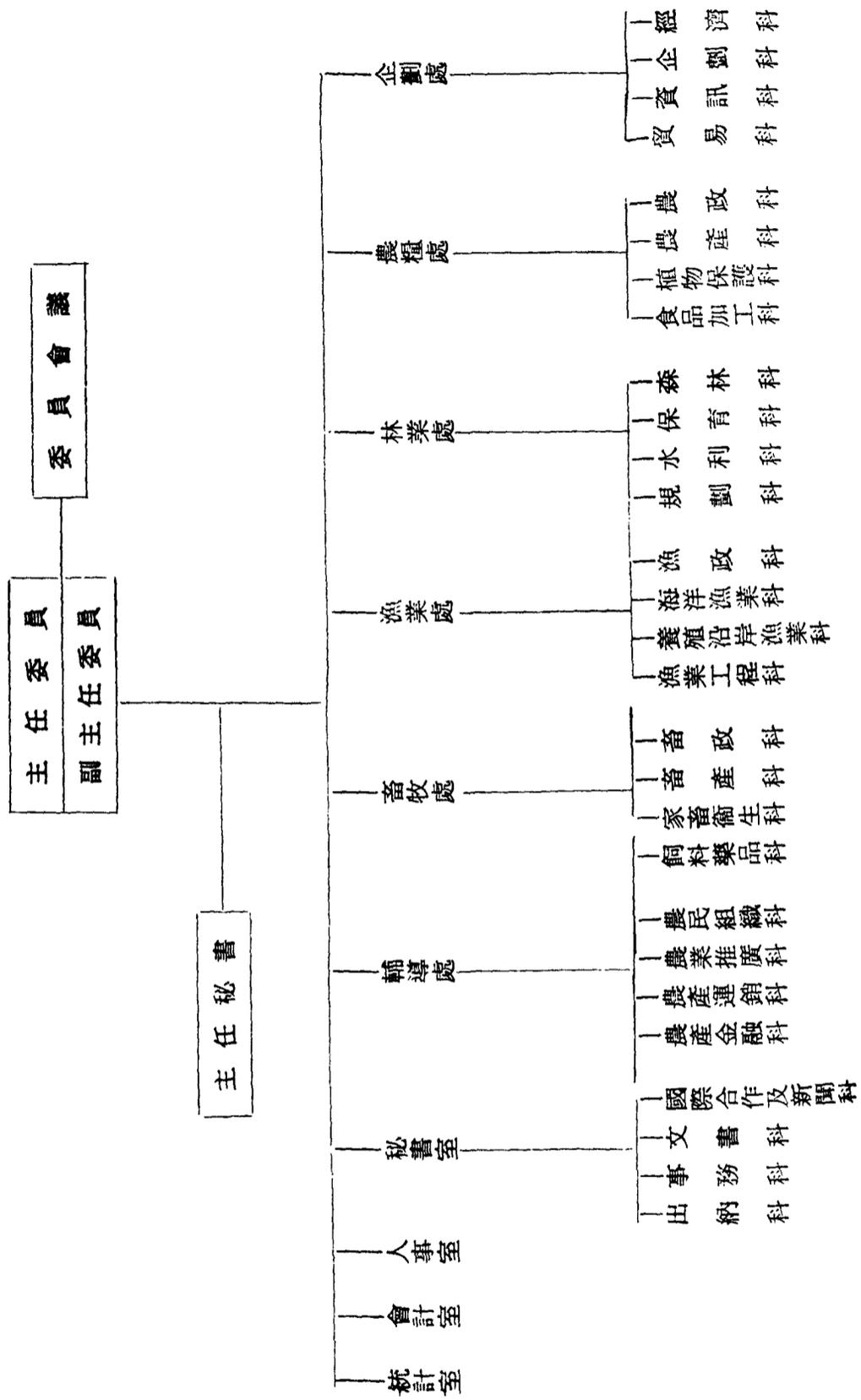
除了農民組織制度之外，有關土地制度之改革，目前台灣國民黨官方多所避諱，大都以推行共同經營、委託經營來代替第二階段農地改革。對於如何擴大經營規模，仍然堅持着家庭農場制，而根本否定公司農場制之可行性。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裏，工業發展講究大規模公司制，而農業卻仍然要維持家庭農場制，在這種狀況下，欲使台灣農工平衡發展，豈不是緣木求魚、強人所難？當然公司農場制有兼併土地之弊病，但若將公司農場限於不需土地太多之家禽、毛豬、蔬菜、果實，將可避免土地兼併的嚴重性。其次在農民身份或資格加以限制，防止非農民投機者介入操縱。再其次，利用農業區域之劃定，限制台灣本島農業區域內農地，不准變更用途，則投機者將知難而退，不敢假借公司農場名義做土地投機生意。台灣目前土地制度太保守，不符合世界潮流，似此應該有



▲1988年1月5日上午，李登輝（前右一）在臺灣省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參加「亞太地區農業發展方向與策略會議」揭幕式，聽取農業專家報告。

彈性的作法進行變更。同時還應向北望，與中國大陸方面合作，互通有無。在上述方案下，讓農民做選擇，容許家庭農場、合作農場，及公司農場三種同時存在，購買中國良種，互相合作，或局部實施三通交流，經過一段時間後，檢討成效後再做結論。如此，農業企業經營之目標才可逐步實現，農業生產力才可逐步提高，才有希望平衡農工發展，而使台灣農村有更大改進。

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田園之樂——

李登輝的農政理想

李登輝

臺灣的農業，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過吃重的角色，也有先天上的困境。李登輝當台灣省政府主席時，曾規劃出農業的前景，提出農業八萬大軍的口號，一度震鑠農村，惜因他的卸任而中廢。雖則如此，從這篇他於1983年8月在「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講座上發表的《田園之樂》，可以看出他對農村的感情，以及對臺灣農業、農村問題的看法，雖然限於環境和身份，對臺灣當權者不得不說了些「救星」之類的諛媚之詞。

「田園之樂」究竟是什麼景象呢？西諺說：「神創造農村，人製造都市」，可以知道在美麗的土地上發展成許多愈來愈大的部落，和愈來愈繁榮的都會，於是人們慢慢的離開了廣大的農村和美麗的土地，不再享受「田園之樂」。

田園之樂的失落

古今中外，有許多讚美、歌頌「田園之樂」的偉大音樂、詩篇與文學作品，如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是一首田園生活回憶的曲子，第一樂章是初睹田園景色時的愉快情緒，第二樂章是溪畔景色，第三樂章是村人快樂的集會，第四樂章是雷電與暴風雨來襲，第五樂章是牧歌，暴風雨後的欣喜與謝天之歌。

我國古代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歸田園居》中「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庭戶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質樸的詩句，勾勒出一幅多麼真切的田園圖畫，而田園生活的樂趣，濃縮在這幾行詩裏。

美國文學家梭羅也跟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潛一樣不慕名利，熱愛自然。在《湖濱散記》這本書中，把他在華爾騰湖邊築屋獨居兩年之久的寶貴經驗，寫得淋漓盡致，把田園生活所獨有的詩情畫意作了最生動深刻的描繪，那種積極追求獨立自由，不斷充實性靈生活的人生哲學，也只有和田園的美好環境中才能有獲得實現的機會。

田園之樂是說不完、寫不盡的，在農業社會裏，大多數人都可以深深體會這高妙而真實的樂趣。

現代都市，車多人多、房子多，加上空氣污濁，眼睛看到的盡是一片擁擠雜亂，耳朵聽到的盡是人聲車聲，鼻子呼吸的盡是油煙灰塵，置身其間，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壓迫感與窒息感。

太多的活動，太多的競爭，每天過得那麼緊張，與田園生活的恬適樸質，構成鮮明的對比。

臺灣農業史上的黃金年代

在東西方偉大音樂家、詩人、文學家的描述中，已經表明了「田園之樂」不單是田園景觀、自然調和，還有村落、村民的快樂。

中國的倫理思想上，田園之樂即是有安定的農村，有文化水準的農民，有繁榮的農業配合，這表示「田園之樂」是一種多元性的融合結果，在層次上有深遠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配合農村自然景觀的農業社會樂趣，這也是農村建設所追求的目標。

「田園之樂」在農業發展史上，有不同的顯現機會，與農業的黃金時代有密接的關係，並以農村安定、農業生產來觀察其演變過程。

臺灣農業史上有兩個黃金時代，亦即西元一千六百年到一千九百八十年的三百八十年間出現兩次高潮。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間，是臺灣在戰前農業生產的最高峯。這時的農業技術進步，農民的經濟誘導，糖、米的生產大幅增加，並對日本大量出口，因此，地租與地價急遽上升，肥了地主，而耕作者的利益却没有得到保障，「田園之樂」對耕作者而言，是沒有緣份的。

一九五二年到六〇年期間，土地資源不足及人口過剩的不利條件下，農業仍有蓬勃的發展，不外以下幾個因素：

一、耕者有其田政策——過去嚴苛的地權制度下，農村就業是一項困難的問題，實施耕者有其田後，出

現了轉機。

二、農產品價格維持在一般物價的百分之七十，保障農民的收益。

三、四年經濟計劃的實施。

四、農藥、肥料的配給與新品種的改良。

另一方面是政府實施地方自治與農會改組，農民所得相等於非農民所得，使真實的「田園之樂」顯現臺灣農村的第二黃金時代。

臺灣農業的發展，二十世紀初期到現在，每年均有百分之二點五的成長率，但是農業的迅速發展，促進了農產品消費的增加，出口外匯的收入，資本供應於工業，而工業的發展也吸引了農村的勞動力。

農村勞力的移出，由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三，使農村發生了：①農工部門間的差距，②農村與都市的差距，③大家庭的沒落，④青年人的離村，造成農村的老龄化等問題。

農工不平衡的發展

工業發展的結果，農業的基本條件不足，形成了①家庭農場的小農制度，②落後的肥料換穀制度，③農產品價格偏低，④資金不足，運銷制度落伍，⑤教育、文化、醫療、環境、道路、自來水的公共投資欠缺等五大問題。

仰賴農業起飛，依靠農村來提供勞力、物力和市場的工業，在多項鼓勵、保護和積極輔導下快速的發展，肥料換穀制度是這時期典型的代表制度，不僅反映出「田園之樂」的失落，也刻劃出農工不平衡的時代代表象。

農村和都市生活差距愈來愈大，空間發展的不平衡達到不得不正視和解決的嚴重地步。農工不平衡的情況，由以下五點可以看出：

一、農民所得失去等值，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八左右。

二、勞動生產力低落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三、資本流出過量，無法再投資，如四十年代即達十六億元之多。

四、技術進步緩慢，生物學的技術發展勢必被機械技術取代。

五、文化設施、環境維護、醫療設備均落後。

農村建設面面觀

在農工不平衡發展，「田園之樂」失落年代的煎熬中，臺灣農村出現了一位救星——蔣經國先生，在1973年，毅然決然的廢止肥料換穀制度，並宣佈加速農村建設措施，取消田賦附征教育捐，放寬農貸條件，改革農產運銷制度，加強農村公共投資，加速推廣水稻綜合技術栽培，創設農業生產農業區，加強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工作，鼓勵農村地區設立工廠。

政府在失去「田園之樂」的農村，重新注入愛心和關懷，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所得，改變生產結構，促進技術革新，經過十餘年的努力，農村和都市的差距，農業所得和非農業所得的差距，都逐年在縮短，這是一個很好的轉機。

檢討農工不平衡發展，「田園之樂」失落的因素在於：⊖政策的配合不夠，特別是農產品進口措施的不

妥，引起農民對政策缺乏信賴感。⊖農村勞力的移出，尤其年輕、有能力者大量移出，心理上，失去了對農業的信心。⊖農村公共投資，以生產基礎為主，未注意生活環境的改善。

建立農村新面貌，回復「田園之樂」

在臺北市長任內，有一次到木柵區指南里視察，發現當地居民生活貧窮，種茶為業，住的是泥土與木頭房子，經詢問才知道是都市建築管理限制修改房子，因此，年輕的一代都跑掉了。

促銷「鐵觀音」茶

在了解指南里的情況後，直覺得農村可以改善，乃一方面協助促銷「鐵觀音」茶，一面要求市府有關單位特准改建房子，兩年之間，泥土與木頭房子換成鋼筋水泥，「鐵觀音」的名氣打開，茶客源源而來，收入增加，每年均有五、六十萬元的盈餘，年輕人也樂意留下來了，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雲林縣麥寮鄉海風村也是沿海的一個村落，矮窄的屋舍中，人豬鷄鴨一起住，夏天沒有水，蚊蠅叢生，生活環境非常困苦。

在獲悉此等情況後，即協助居民改建豬舍，改善生活問題，現在也均已獲得解決。

指南里與海風村的成功故事，是加速農村建設的經驗，也顯示在開創農村新面貌的過程中，必須權宜變更，並依據事實狀況予以改善。

臺灣農民的智慧，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農村文化

也不再是過去的廟宇文化，要開創農村的新面貌，在人的因素上，要建立農民的信心，建立八萬大軍；在農業問題上，要改善生產結構，擴大經營規模，如農地重劃、農業機械化、土地改良、育苗中心專業區、購地貸款等，還須有促銷活動、農產品的配合、農業工作者的訓練、核心農家的培育、整建農宅、示範村與社區的發展、農村醫療、農民福利的實施、農民組織的加強。

八萬農業大軍的規劃

建立八萬戶農業大軍的輔導工作重點是：

- 一、加強辦理農業建設人員訓練與培育工作。
- 二、經營規模是管理技術的改革。
- 三、積極培育青年農民經營能力。
- 四、改善居住環境。
- 五、加強辦理農村文化福利工作。
- 六、強化農業金融資金融通。
- 七、健全農民組織，加強心理建設。
- 八、輔導兼業農戶的轉業或成爲新的專業農戶。

在八十年代，要恢復農民信心， 回復田園之樂

八十年代是要恢復農民信心，建立農村新面貌，回復「田園之樂」的年代，基於這項使命，省政府提出了「建立八萬農業建設大軍計劃」希望透過這項輔導措施，徹底改善農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

八萬農業大軍的投入農村，勢必使農村呈現新的

契機，今後，示範實驗成功的「指南里模式」與「海風村故事」，將在臺灣省的每一個農村實現，屆時，農民熱愛農村，農村有文化層次，農村有現代化技術，美麗清新的農村自然景觀再度重現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陶淵明的《歸田園居》的境界，每個農民在農耕之餘，真正的享受「田園之樂」。

我國未來贏的策略

李登輝

三十多年來，由於全國上下同心戮力，締造舉世未有的經濟奇蹟，蔚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楷模。現在努力加緊腳步，期望在本世紀之前，邁向「已開發」國家之林。但就現階段情勢而言，台灣經濟正處於「轉型」期，也就是正處於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因此，如何積極開創，使中華民國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正是當前第一要務。在此以《中華民國未來贏的策略》為題，談談我國未來發展藍圖、迎向未來可能面臨的新挑戰，以及如何開創未來贏的策略等觀念和做法。

台灣未來發展藍圖

根據「經建會」所編二十一世紀《臺灣經濟長期展望》，以及未來發展趨勢觀察，可勾劃出以下五大社會藍圖：

⊖經濟「國際化」的社會。如以目前對外貿易與GNP之比例來推測，到西元二千年的中華民國對外

貿易將接近三千億美元，不但進入貿易前十國之林，也由於對外投資的增加，將積極主動參與國際經濟事務。

㊦現代化「服務業」的社會。我國現階段雖然仍處於以製造業爲主流的經濟結構，但隨着農業機械化、工業自動化，服務業將吸收更多的就業人口，而成爲促進經濟成長的主力。估計在西元二千年，我國服務業在 G N P 中所佔的比重，將由目前的百分之四十三，提高爲百分之五十一，工業則由百分之五十一降爲百分之四十六。現代化服務的社會將是我國未來的主要特徵。

㊧資訊化的社會。兩次能源危機以後，電子與資訊已取代石油，成爲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科技源流。隨着電訊與電腦（C & C）的結合，改變了人們溝通的時間與空間觀念；電腦、傳真機、電話及電視將利用同一電訊網路傳送訊息，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不再嚴格劃分。我國顯然即將面對這樣的資訊社會。

㊨高生活素質的社會。由於經濟的持續發展，加上公共投資的加強推動，基本設施將漸臻完善。交通運輸、環境污染及醫療保健等問題，將獲得適當的解決。休閒旅遊活動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將更受重視，教育文化事業將更爲蓬勃發展，這些都將提昇國人的生活素質。

㊩多元化的社會。隨着都市化的發展、所得的提高、教育的普及與對外貿易的擴大，中華民國已形成以「中等資產」爲主流的社會型態，社會風氣與價值觀逐漸開放和活潑化，社會的價值觀由「單一」進入「多元」選擇的境界，儘管是多元化，但社會的韌性、彈性與活力却因之大爲加強。

迎向未來新的試煉

過去，我們憑着「信心」開創了今天的經濟奇蹟；迎向未來我們仍然充滿着「希望」。然而，針對上述發展藍圖，我們仍要克服下列種種挑戰，方能早日邁入先進國之林。

首先，我們面臨着「變革」的挑戰。過去，我們成功地從「無」到「有」，今後我們要再進一步發展為「均富」的社會，顯然要有更多的興革措施，才能有更大的成就。況且在邁向自由化、國際化及制度化的目標下，我們的「中小」企業要蛻變為「國際化」企業，出口導向策略要轉變為「進、出口」並重，各種保護措施逐漸取消，政府扮演的角色也應由「襁褓」轉為「教練」，這一切均說明「變革」是必要的，但這種變革是建立在「漸進」，而非「急進」的基礎上。

其次，「競爭」的挑戰愈加明朗化。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我國就是靠「競爭」實力而升級的。從採取第一次的「進口代替」策略到「出口擴充」策略，再演變為第二次的進口代替到出口擴充，我們都面對各式各樣的競爭。但現今的競爭因情勢的變化，我們不但在國際市場上要與同級的韓國、香港競爭，國內市場亦要與先進的美國、日本等多國籍企業競爭，從傳統性工業到高科技工業，幾乎無一可倖免。性質上也將由數量提昇到價值與品級的競爭。

恪遵競賽規則的挑戰

此外，我們也面臨着遵守「競賽規則」的挑戰。經濟的晉級相對地也帶來責任和要求。我國既已成為世界性的貿易重鎮，就要表現出貿易大國的風範，恪

遵國際間有關貿易、關稅及反仿冒等競賽規則。同樣，國內的生態保護與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隨着經濟發展而日益嚴重，因而也要有合理的規範，課予企業承擔這些外部成本，履行善良企業「公民」應有的社會責任。對消費者保護、勞資關係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課題，亦應有適當的規範。

再者，我們還有建立觀念「共識」的新挑戰。多元化社會的價值觀本來就相當紛歧，再加上各種利益團體的興起，各自爭取「本位」權益，因此，不易產生「合意式」的共識，而共識的建立，則有待當事人的坦誠溝通、忍讓及折衝，才能進而發揮團隊合作的行動「共鳴」。因此，不斷的溝通是建立共識的根基所在。

最後則是面對繼續追求卓越與提高生產力的挑戰。我國經濟可說是從苦幹、實幹，逐漸開拓成長起來的。但現今的社會，却出現一些浮誇與功利的不良色彩，講求以投機的方式獲取暴利，企業家缺乏遠見，有錢不願創新，很多大企業甚至罹患了富貴病，不再繼續表現卓越，以致生產力與競爭力大為降低，這些危機實為當前最大的升級挑戰。

開創未來贏的策略

人類最偉大之處，即是遇到問題會動腦筋、想辦法，以新的方法、新的觀念來解決問題，促進發展。因此，我們應採以下的作為，來迎接未來挑戰。

⊖培養長期的策略性思考

看眼前，只見問題和危機。向遠看，則見到處充滿了希望和機會。短期的狹隘視野，常只會尋找「簡易」而又快速見效的藥方，但這樣做反而會產生嚴重

的後遺症。只有以「策略家」的長期思考方法，我們才能秉持「平常心」，不為表面假象所迷惑，且廣泛地蒐集資料，了解真正的「潛因」，有計劃地做治本的工作。

㊦落實自由化與國際化

自由化與國際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趨勢，也是我經建的長期目標。目前，政府正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活絡市場機能，以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同時也加速國際化的工作，期望大家有國際性的眼光和實際行動。一方面引進國外廠商來華投資，增加國際經貿、文化及科技的交流，一方面鼓勵我企業前往國外投資，發展成為國際性大企業，使資源充分發揮效用，早日邁入工業化國家之林。

㊧厚植競爭的優勢基礎

隨着競爭之演變，以勞力取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後我們唯有培育高素質的技術工程師與知識工人，發展以技術和資訊密集為主的產業結構，加上產品設計能力的提昇，以及自有品牌的創造，才能使我國產品在國際上享有獨特的競爭力。若能配合國際化的推動，建立自己的國際銷售網，相信我國產業，將因「產銷配合」而享有更大的競爭優勢。

㊨重振企業的創業精神

無可否認，企業家披荊斬棘的創業精神，正是我國經濟成長的活力泉源。老企業家與經理人那種冒險犯難，勇於創新的企圖心，不但奠定今日贏的基礎，且使我國擺脫落後經濟的惡性循環，即：所得低—儲蓄少—投資少—成長慢—所得低。今後，唯有寄望企業家與經濟人，「重拾」贏的雄心壯志，以「迎變」的態度接受挑戰，重振我經濟活力。

㊩提昇人力資源的素質

大家都知道，我國未來贏的基礎是在於高質素的人力資源。所謂「石油有限，腦油無限」，更說明經建人才的重要性。目前，我國宜多方培育科技、經貿談判及管理資訊人才，才能擁有贏的真正實力，同時更應進一步做好人力提昇的訓練工作，尤其更應全面展開發展、管理及專業等三種訓練，方能有效提昇人力素質。

⑥邁向「專業化」的管理

專業化管理不但是企業昇級的捷徑，也是我經濟長期發展的必需基礎。今後我廣大企業應以：①塑造健全的經營理念，以替社會創造財富為經營使命，並以廣益的「合作」倫理，取代狹利的「家族」倫理。②建立科學化的管理制度，並加強推行「分層負責，逐級授權」的辦法。③加強培養具有藝術家的理想、組織家的胸襟與實務家的務實態度之專業經理人，唯有如此，方能加速邁向專業化的管理。

台灣歷任「副總統」側寫

國民黨政府自1947年「行憲」後，依「憲法」開始選舉「總統」、「副總統」。自1948年「副總統」寶座爭奪戰開始，至1949年敗退台灣，在大陸曾有一任「總統」，副總統。敗退台灣迄今，前後共選過七任五位「副總統」，在駁雜紛亂中，每次每一位「副總統」的產生，都激烈反映出時代的脈動。國民黨政權五位「副總統」，前兩位是強權軍人（李宗仁和陳誠），後三人是國民黨文人、科技官僚或地方型政治領袖，他們每人各具特質，在每一時期，煥發出個人的特點。

根據國民黨政府「憲法」規定，「副總統」職主輔弼「總統」，在七任「副總統」中，陳誠與嚴家淦各蟬聯一任，嚴家淦於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後，更獲破天荒地繼任「總統」之職。

他們的任期是：第一任李宗仁，自1948年4月至1949年，其後大陸易手。1949年10月，新中國政府建都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繼續兩黨對峙之局。

國民黨政權第二任「副總統」陳誠，任期自1954年2月至1960年2月；第三任仍是陳誠，自1960年3月至1965年3月，1965年陳誠病逝。

第四任嚴家淦，自1966年3月至1972年2月。

第五任嚴家淦，自1972年3月至1975年4月；第六任謝東閔，自1978年3月至1984年5月。

第七任李登輝，自1984年5月迄至88年1月13日。

上述每一位「副總統」當選及任期的時空，都盤錯着複雜的歷史政局變化，也各自留下了明顯的軌跡。

派系傾軋中脫穎而出的李宗仁

李宗仁是中華民國政府「行憲」後的第一任「副總統」，1948年4月從派系傾軋中，經過四次投票脫穎而出，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後，曾代理「總統」職務五個月。他出身「桂系」，在北伐、抗日戰爭等長期戰役中有過顯赫戰功，抗戰時期台兒莊大捷就是他締造的，晚年返回大陸，受到中共高層的歡迎。

李宗仁是廣西桂林人，1891年生，廣西軍事學校畢業即入行伍，曾參與護國、護法之役，以勇敢善鬥聞名。北京政府成立後，正式納入軍事系統，參加北伐，李宗仁曾多次與蔣介石、汪精衛發生衝突，並起爭戰。

抗戰勝利後，李宗仁在1946年7月起任國民政府北平行轅主任，是少數坐擁重兵的實力派人物。1947年獲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支持，決意競選「副總統」。1948年1月正式宣佈參選，隨後在北平發表演說，並設「競選事務委員會」於南京。1948年4月23日與孫科、于右任、莫德惠、程潛、徐傅林共六人角

逐，開票結果，與孫科相持不下，歷經四次投票，始以一四三八票當選。

1948年5月李宗仁與蔣介石同時就任新職，此時在國共戰事中，國民黨節節敗退、大失民心，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戰事失敗後稱病赴港，1949年12月赴美國。台灣國民黨當局於1954年3月10日，投票通過所謂「罷免案」，罷免李宗元職務。1965年7月李宗仁返回中國大陸，1969年病逝於北京。

軍事強人陳誠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第二任「副總統」陳誠出身軍系，從黃埔時期開始追隨蔣介石。1954年、1960年，陳誠兩度當選台灣「副總統」。

1948年12月，蔣介石下野前，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1949年1月陳誠去台就任。當時國民黨節節失敗，局面已全面惡化，陳誠為國民黨當局安定台灣局面，實施戶口清查，改革幣制，發行新台幣，並移植湖北時代的新土地政策，在台灣推行「三七五減租」，籌劃地方自治。1949年底，陳誠專任「東南軍政長官」，掌握台灣一切軍政大權，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陳誠將權柄還予蔣介石。不久，蔣命陳誠組閣，即分區實施地方自治，放領土地，並逐步建立經濟體系。

1954年3月陳誠獲選為「副總統」，就職前兩天，以「行政院長」身份提出內閣總辭。1960年3月再蟬聯一任。1963年底以健康理由辭「行政院長」兼職，1965年3月5日，在罹患肝疾近二十年後，因肝癌在台北病

逝。其子陳履安現任國民黨中常委，也是台灣當局核心要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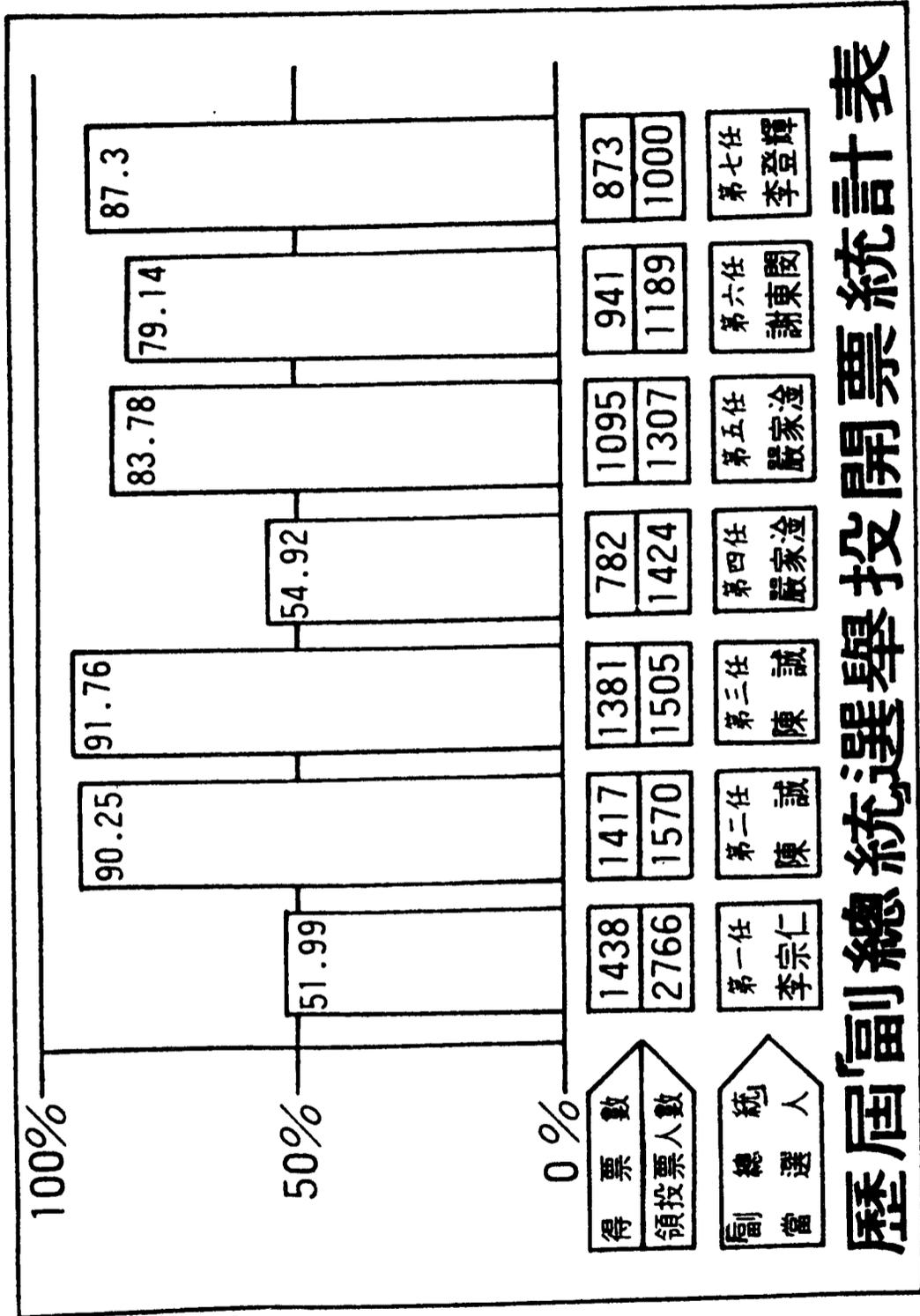
理財專家嚴家淦被選中

第三任「副總統」是嚴家淦。無論從崛起過程和政治表現來說，嚴家淦可說是國民黨政壇的異數；他因缺乏實力，受到拔擢為「副總統」，蔣介石死，還一度繼任總統，在國民黨權力鬥爭史上同樣的例子可謂鮮見。

嚴家淦是江蘇吳縣人，1905年生，是國民黨理財專家。1966年蔣介石提名他為第四任「副總統」候選人，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嚴家淦，在衆多元老爭奪「副總統」中竟然脫穎而出；他的崛起，有人說代表台灣自六十年代以後財經掛帥的運作導向，也有人說是利用他排斥陳誠，以為蔣經國順利接班。1963年他就任「行政院長」後的兩年半內，使台灣政府的預算達到平衡。

嚴家淦在192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在京滬鐵路、福建省建設廳任職。抗戰勝利後在1946年奉國民黨令派去台灣任「交通處長」，其後歷任「財政處長」、「台銀」董事長、「財政廳長」，1950年調升「經濟部長」，後接任「財政部長」，對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的早期局面，對當地社會穩定金融、財政革新頗有貢獻。

從經歷來看，嚴家淦是典型的技術官僚，就早期行政體系型態而言，這類型人才既有助蔣家，亦無威脅性。1963年陳誠因病辭「行政院長」後，蔣介石乃乘機提名嚴家淦繼之，一則以其專業技術促動全面經濟發展，二則善用美援，裨益財政穩定，更重要的是藉



歷屆副總統選舉投票統計表

此安排蔣經國接班，可見嚴之忠心亦為蔣介石所激賞。

1965年3月5日陳誠去世，1966年3月22日嚴家淦以782票當選「副總統」，就比率而言，嚴家淦在1416張選票中，得票率55.2%，不可謂不低，這乃因當時政壇上兩廣派的杯葛，以及嚴家淦未親訪「國大代表」拉票引起倨傲之說有關。但到了1982年3月22日第五任「副總統」選舉時，在1307票中，嚴家淦共得了1095票，當選連任，得票率為83.8%。在「副總統」任內第三年，即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嚴家淦繼任「總統」達三年；三年中，他在決策上唯蔣經國之命是聽，並於任期滿後卸任，由蔣經國接任，知情識趣，以保特權，扶植子侄。近年中風病倒，實際已退出政壇。

台灣元老謝東閔

謝東閔是台籍半山型人物中，早期受國民黨最高當權倚重的代表者，1978年「總統」、「副總統」選舉，蔣經國選謝東閔為搭檔。在此之前，他是台灣省籍政治人物中的大老，在地方政壇備受推崇。一般認為，謝東閔在1978年當選為「副總統」，與政治「台灣化」傾向和最高決策階層的權力分配有關；在此之前，台灣人獲得擔任內閣閣員的機會並不易見。

二水幫：具有半山背景／結緣蔣家受器重

「二水幫」的首腦人物謝東閔也同黃朝琴一樣，具

有半山背景。早在北伐期間，即已進入國民黨當時勢力大本營——廣州中山大學就讀，隨後進入國民黨的黨團組織工作，專責處理對台的工作任務，開始為國民黨收復台灣的目標效力。

原來，「開羅會議」確定了日本佔領下的東三省及台澎列島戰後歸還中國的決議之後，如何收復台灣是國民黨在抗戰勝利之後必須解決的問題。

當時，蔣介石即指示成立國民黨中央台灣黨部，全稱定為「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執行委員會」，址設福建漳州。命翁俊明為主任委員，謝東閔則為執行委員兼宣傳組長。

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復興崗召開，以決定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大政方針，謝東閔是台籍人士唯一出席該次會議的代表。大會進行到第三天，蔣介石宴請七位代表，謝東閔列名其中，當時蔣經國亦在座作陪。

這一次召見，意義頗不尋常，不僅象徵著謝東閔的台灣代表性，已受國民黨最高權威人物蔣介石的正式肯定與承認，確立了謝東閔在國民黨的組織結構中，有其特定的功能與角色；同時，謝東閔也首次與蔣經國結緣，立下了他與蔣經國往後在台灣政治事業中結為夥伴的友誼基礎。

1963年，謝東閔以副議長的地位取代了黃朝琴擔任台灣省議會議長之後，更是氣勢如虹，成為國民黨內台籍人士的主流，為國民黨引用台籍人士的樞紐。許多目前高居黨國要津的台籍政要，都是經他拔擢，而嶄露頭角的。

這些人士，主要以台灣中部的彰化、南投等地緣為主，所以一般稱他們為「二水幫」（謝東閔的舊居）。主要成員有陳時英（前「民政廳長」）、趙守博

（國民黨「社工會」主任）、謝生富（前「立法委員」）、陳陽德（國大代表）等人，林洋港、許水德多年前亦為謝系的大將，現已脫離。

1978年謝東閔就任台灣第六任「副總統」時，二水幫勢力更是如日中天。據聞，當時本已內定林金生接掌台灣省政府，後因當局顧慮林金生難以應付省議會激烈質詢而猶豫不決，謝東閔便以「副總統」之尊，適時力薦他的愛將林洋港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要職，進而享有今日「司法院長」地位。

那時許多政治人物，以與謝東閔一叙為榮，把自己與他的關係說得親近得不得了。曾任「立委」的謝某，籍貫彰化，當時他最親近的朋友每每介紹他時，公開聲稱他是謝東閔的親侄兒，而他不但否認，且經常向人炫耀：「我剛剛去看過『老頭子』了。」當別人追問「老頭子」是誰時，他就說：「是『副總統』嘛！」一般人的觀念中，「老頭子」是對自己父親的暱稱，不知是謝某不懂，還是故意如此炫耀與謝東閔的關係。後來有人去查謝東閔和謝某的關係，只不過是同姓「謝」而已。由此可見，那時謝東閔的聲勢之勁。

讌飲談闊生疑慮

古語有云：「久享尊名，不祥」，又云：「物禁太盛」，不知謝東閔是否不知其中的道理，他就任「副總統」後，竟與他過去的愛將時相往來，而且還定期聚會，主要成員是他在台灣省主席任內的廳處長，每三個月聚會一次，輪流請客，地點不一定在台北，。譬如，輪到許水德（初曾任社會處長、當時任高雄市政府秘書長）作東時，大家便移駕高雄市。這些人聚在一起，開懷暢飲，無所不談，雖不一定涉及政治事

務，但以這些人在台灣政治上的影響力和受注意程度，即使全部都閒話家常，在有心人看來，也難免疑慮叢生。

中國官場上，最忌諱一股個人政治力量的凝聚，謝東閔或許自恃對國民黨的忠誠及「層峯」對他的信任，而不以為意，但其他政治實力人物或許相當在意，由於有人不斷打「小報告」，此後謝東閔的影響力，便每下愈況，節節敗退。

陳時英失敗說明了什麼？

1980年，謝東閔安排他的愛將陳時英競選「監察委員」，以陳時英曾任彰化縣長、台灣省「社會處長」、「民政廳長」、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主任的輝煌經歷，如果只是競選「監委」，根本是不必要的。當時謝東閔作如此安排，目標是要陳時英出任「監察院」副院長，後來雖因陳時英係初任「監委」而未能順利登上副院長寶座，改由另一「監委」黃尊秋（現任台灣「監察院」院長）取代，但熟悉政治行情的人當時就指出，這不過是一次藉口而已。

如果國民黨決策人員當時未作此項承諾，謝東閔是不會安排陳時英競選「監委」的；既作承諾之後，便不會因陳時英只是初任「監委」而改變意圖，因為陳時英的黨政經歷遠較黃尊秋完整。最後之所以找一藉口，必然是有人指責謝東閔據張政治勢力，居然已遠及「監察院」，不能不加提防有以致之。

從陳時英未能順利登上台灣「監察院」副院長寶座一事看來，謝東閔在擴張政治勢力的路途上，當時已亮起了「紅燈」。惜謝東閔未能及時警覺，在地方公職及中央公職黨內提名作業時，仍多意見，更引人注

目。

接着是1982年，謝東閔的弟弟謝敏初，由於經營花蓮輪失敗，連續退票一億餘元台幣，在當時票據法未解除刑責的情況下，法院不但不加懲處，反以無罪開脫，當然這未必與謝東閔有何關係，但一般民衆卻不做如是的想法，甚至若干國民黨黨政要員亦持相同的觀點。「立委」徐中齊爲此曾有如下的質詢：

謝敏初事件的影響

謝「副總統」之弟謝敏初，因經營花蓮輪失敗，支票連續退票一億多元，依現行票據法規定，退票就要判刑，不論理由。檢察官因其退票額巨，提起公訴；謝「副總統」聞之大怒，諭令法院設法判處無罪，起碼也要緩刑，以示補救；承辦推事果然判處無罪。

謝敏初雖得以免除牢獄之災，謝東閔的形象卻大受損害。而老「立委」敢在「副總統」頭上動刀，這在國民黨以黨領政，強調集中制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顯然是受到有關方面的默許的。

1984年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舉行，當李登輝被提名爲「副總統」後，記者圍繞著謝東閔問問題，他談及自己平生最大的志趣是辦教育，目前最大的心願是將親自創辦的「實踐家專」升格爲學院，言下對「實踐家專」多年來未能獲准升格頗多不滿，當時的國民黨新聞局長宋楚瑜（現任國民黨中央首席副秘書長），怕他有情緒性的言論，趨前有意拉開新聞記者，謝東閔竟有些發怒地說：「不平則鳴嘛！」十足反映他的心境。

國民黨提名第七任「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後，謝東閔被國民黨最高當局確定不連任時，「教育部」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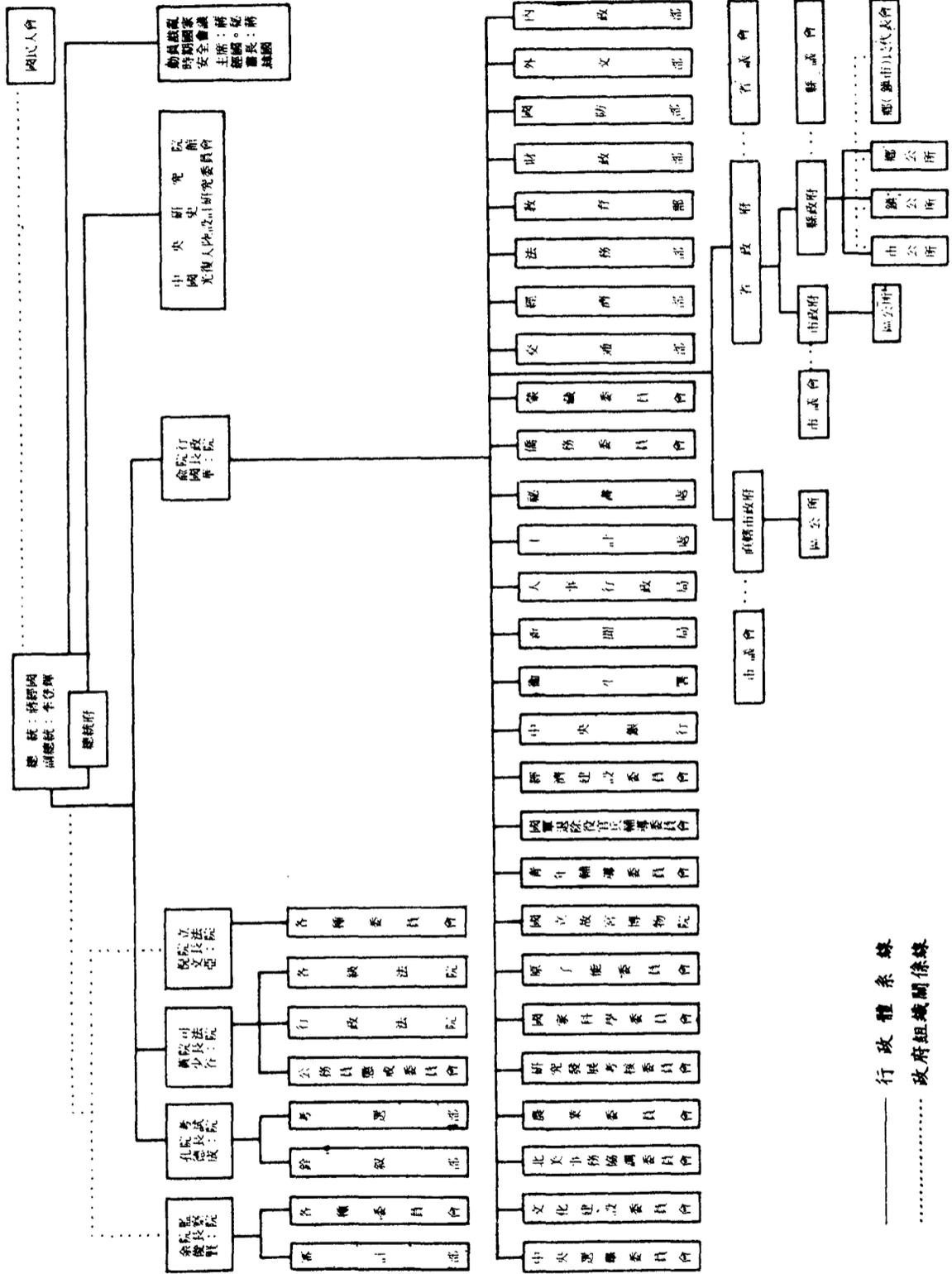
將實踐、銘傳、世新等三所專校升格改制學院的公文，呈請「行政院」核示。當時，許多人認為，謝東閔既不連任副總統，這樁「實踐家專」升格的心願，總該完成了，而這也可以顯示有關當局尊重卸任「副總統」的人情味，何況「實踐家專」一向辦學成績尚佳，比起台灣文化大學、逢甲大學創校之初要强得多。

不料，「行政院」竟將「實踐家專」申請升格的公文退回，說什麼要等新任「教育部長」重新考慮。這項理由實在不通，因為當時連關係全島人民生活至深且鉅的交通運費提高，「行政院」也立即批准，從未考慮等新「內閣」組成後再議，而遠不及交通運費重要的「實踐家專」升格案，竟以此理由駁回，怎不叫謝東閔生氣，怎不叫人相信「二水幫」是沒落了！

爾後，謝系的大將一個個都遭受了空前的政治危機，當時林洋港調任為「行政院」副院長的閒差，陳陽德之參加黨內縣長的提名，謝生富之競選「監察委員」皆不可得，許水德則趕緊劃清界限，以求政治生命的再生。

凡此種種，皆說明了「二水幫」勢力已到了「日薄西山」的時刻，是否有反撲的機會？從國民黨取用台籍人士的策略而言，近來重用的多是些科技官僚，年青親信，柔順為重，而儘量壓抑具有政治企圖一心坐地為大的民選政要，因此以後派系的「地方自制」顯然已不那麼急進，二水幫再度予以重用的契機自是相當有限，而我們可從謝東閔的長子謝孟雄欲接掌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長，儘管許水德一再堅持，但最後仍被封殺一事得到進一步印證。

台灣政府組織系統一覽表



—— 行政體系線
 政府組織關係線

「本土化」政策

台籍人士在國民黨體系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可以七十年代為分水嶺，劃分為兩個階段；在兩個階段政治發展過程中，無論領導中心的權力統攝方式、台灣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乃至精英的特質，都呈截然不同的類型。前一個階段，台籍人士在國民黨政府核心層沒分量，所佔的發言地位，比較發揮作用的層面，僅止於議會和地方行政事務。但是自從七十年代以後，在台灣最高決策階層，無論對中央事務或地方事務，台籍人士都具相當的發言權和決策權，而且這種趨勢隨時間遷移而愈益明顯。

台籍高官從政的四種類型

1949年初，國民政府軍事潰敗，開始播遷去台，1950年中因美國之介入與援助，使蔣家之政軍大勢稍定。當時以文人政府為架構，而以軍制為主導的台灣

軍事統治政權的結構中，國民黨最高當局的班底皆為由大陸移轉而來的。在這些紛然複雜的領導結構中，諸多政治領袖是從昔日派系勢力中傾軋搏鬥脫穎而出的。他們有出身軍系，有學習法政，有從事黨工，也有從行政系統層級而上；大體上這種結構尚能適應當時專權封閉的權威結構的運作。

當時出身台灣本島的政客，可以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舊社會地主，這些日據時代的中產階級，他們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淵源至深，在現實社會中，他們所憑藉的是土地資本；但是當土地改革之後，部分土地零散移轉到佃農手中，他們已非壟斷的權威多數；但由於傳統農業社會的倫理制度猶存，因此他們仍然象徵社會的權貴。

第二類是傳統士紳，這些人在日據時代或以經商致富，或以擔任公職得以攏聚財富，也有以行醫而羅聚社會聲望。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他們之中有些在地方成為鄉紳，亦有轉於政治投資，在政治上競選公職者。

第三類人士是抗日志士，由於日本人統治台灣帶來的民族歧視和權力壓迫，使不少台灣人起來反抗日本統治當局權威。1945年台灣光復後，不少台人納入國民政府體制中，從政或從商；另外也有部分人士，仍然基於「台灣民族」的意識鬧「台獨」，也有因不滿國民黨的統治作風而對抗國民政府，結果導致這一類人士多半遁走海外或被捕入獄。

第四類是長期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半山」，他們曾因遊學、經商或避難到過大陸，和中國大陸淵源甚早，有些人甚至在國民政府中謀得一官半職。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由於地緣關係，因而受到「層峯」的重視。

由於受到日本統治達半世紀之久，在日本政策下，醫事人才多，法政人才奇缺；再者台灣光復至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這一階段，本土從政者以地主和傳統士紳為多，抗日人士和「半山」人士數量到底較少；同時，蔣介石失敗移轉去台灣，帶來不少國民黨黨工、行政和技術人才，使得早年台籍人士在權力核心中，難以施展所為，亦無法在政壇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將來角色愈形加重

到了八十年代，國民黨遷台已邁向四十個年頭大關，由於台灣中智階層增加，濃厚本土意識的復燃，和台灣省籍人口強大比例的壓力，國民黨當局瞭解擢升台籍政客已屬必然趨勢；尤其蔣經國最近十年來，由於種種複雜的設想，更朝「台人治台」的方向大步跨進，於是有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吳伯雄、黃尊秋等人迭受重用。

就這當中所有台籍高層政治人物而言，林洋港是最特殊的一位，李登輝則是當中最幸運者。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總統」位，幾乎是平步青雲，李登輝沒有受到半點挫折。李登輝在剛接任「副總統」時，沈潛了一段短暫時日，當時層峯許多重要的公文，都由「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直接呈給層峯批閱，李登輝連看都看不到。擔任「副總統」一年後，情形有了顯著改善，蔣經國遇有重大政策性問題時，逐漸會請李登輝共同商討，聽取他的意見，使他對決策的影響力大幅上漲。此外，為了給他一點聲望，層峯也開放給他較多的政治籌碼，諸如代表

「總統」出國訪問、慰問前線將士，參與高俊明、林義雄「特赦案」的商討等。

從就任以來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李登輝已經完全取代謝東閔在國民黨決策系統的地位，其影響力甚至超過謝東閔。像在外交事務方面，李登輝不論就形象或基本訓練而言，都比謝東閔更容易有表現。

表一：以技術官僚姿態躍登高層的台籍政客

姓名	籍貫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目前在台灣主要職務	在國民黨內職務
李登輝	臺北縣	1923年	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經學博士	「總統」	國民黨中常委
連戰	臺南	1935年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行政院」副院長	國民黨中常委
施啟揚	臺中	1935年	西德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法務部長」	國民黨中常委
郭為藩	臺南	1937年	法國巴黎大學教育學博士	「政務委員」	中央委員
高銘輝	臺北	1931年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副秘書長」	中央委員
林清江	雲林	1940年	英國利物浦大學教育學博士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長	
郭南宏	台南	1936年	台灣交通大學研究所，美國西北 大學電機博士	「交通部」部長	

表二：從國民黨推薦「選舉」起家的台籍政客

姓名	籍貫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民選經驗	目前在台灣主要職務	在國民黨內職務
林洋港	南投	1927年	台灣大學學士	南投縣長	「司法院」院長	國民黨中常委
黃尊秋	彰化	1922年	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	「監察委員」	「監察院院長」	國民黨中常委
劉闊才	苗栗(客)	1911年	日本關西學院法學博士	「台灣省議員」 「立法委員」	「立法院副院長」	
林金生	嘉義	1916年	日本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	雲林縣長 嘉義	「考試院副院長」	中央委員
高玉樹	臺北	1913年	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學士	臺北市長	「政務委員」	
張豐緒	屏東	1928年	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政治學碩士	「台灣省議員」 屏東縣長	「政務委員」	中央委員
吳伯雄	桃園(客)	1939年	台灣成功大學學士	台灣省議員 桃園縣縣長	「內政部長」	國民黨中常委
高育仁	臺南	1934年	台灣大學學士	「省議員」 台南縣長	「台灣省議會」議長	國民黨中常委
張建邦	宜蘭	1930年	美國伊利諾大學教育學博士	「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會」議長	國民黨中常委
邵恩新	臺北	1924年	小學畢業 高考及格	「臺北縣長」		中央委員
陳金讓	臺北	1930年		「國大」代表	「臺北市國民黨部主委」	
蘇南成	臺南	1936年	成功大學學士	「臺南市議員」 「臺南市長」	高雄市長	
陳孟鈴	臺中	1934年	淡江大學學士	臺中縣長	「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長」	
吳水雲	花蓮	1930年	台灣師範大學學士	「省議員」 「花蓮縣長」	國民黨中央「文工會」副主任	

表三：企業界的台籍富豪政客和大商家

姓名	籍貫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目前在台灣主要職務	在國民黨內職務
林挺生	臺北市	1919年	台灣大學學士	「大同關係企業」董事長 「大同工學院」院長	國民黨中常委
辜振甫	彰化	1917年	台灣大學學士	「臺泥關係企業」董事長 「台灣全錄企業」董事長	國民黨中常委
吳三連	臺南	1899年	日本東京商科大學	「畢臺南紡織財團」董事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自立晚報》發行人	
王永慶	臺北	1917年	小學畢業	「台灣塑膠」、「南亞塑膠」、 「台灣化纖」等公司董事長	

表四：台灣政府系統出身的台籍政客

姓名	籍貫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當初職銜	目前在台灣主要職務	在國民黨內職務
洪壽南	南投	1913年	東京帝大學法部	「地方法院」院長	總統府資政	國民黨中常委
邱創煥	彰化	1925年	政治大學碩士	「銓敘部」科員	「省政府」主席	國民黨中常委
許水德	澎湖	1930年	日本碩士	「屏東教育局長」	「臺北市長」	國民黨中常委
趙守博	彰化	1941年	美國伊利諾大學 法學博士	「救國團」組長	國民黨「中央社工會 主任」	
施金池	臺南	1928年	台灣師範大學碩 士	「北門高中校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中央委員

表五：半退休的台籍政客

姓名	籍貫	出生年份	最高學歷	過去主要職務	目前職銜	在國民黨內職務
謝東閔	彰化	1908年	廣州大學學士	「台灣省主席」 「副總統」	「總統府資政」	國民黨中常委
戴炎輝	屏東	1909年	日本東京大學法學 博士	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	「總統府資政」	國民黨中評委
徐慶鐘	臺北	1906年	台灣大學農學博士	「內政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總統府資政」	國民黨中評委
李連春	臺南	1904年	日本神戶商校畢業	「台灣省糧食局長」 「政務委員」	「總統府國策 顧問」	國民黨中評委
蔡鴻文	臺中	1910年	嘉義高農	「台灣省議會」會長	「總統府國策 顧問」	

歷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簡表

姓名	籍貫	就職年月日	最高學歷	任職前主要經歷	卸任後主要經歷
陳儀 (1883—1950)	浙江紹興	1945·10·25 (台灣省行政長官)	日本陸軍 大學畢業	浙江省長、軍政部常務次長、 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行政 院秘書長。	國民政府顧問、浙江 省主席、1950年以所 謂「通敵陰謀叛國罪」 被蔣介石處決
魏道明 (1901—1978)	江西德化	1947·5·16	法國巴黎 大學法學 博士	司法行政部長、南京市長、行 政院秘書長、駐法大使、駐美 大使、立法院副院長。	離職後赴美，1964年 起歷任台灣駐日「大 使」、「外交部長」、 「總統府」資政。已故。
陳誠 (1898—1965)	浙江青田	1949·1·5	保定軍官 學校砲科 畢業	師長、軍長、總司令、戰區司 令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軍政 部長、參謀總長	台灣「行政院長」、 第二任「副總統」、 已故
吳國楨 (1900—1984)	湖北建始	1949·12·21	美國普林 斯頓大學 哲學博士	漢口市長、重慶市長、國民黨 宣傳部部長、上海市長	台灣「政務委員」、 辭職後赴美，被蔣介 石解除一切職務並開 除國民黨黨籍。已故。

俞鴻鈞 (1898—1960)	廣東新會	1953·4·15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上海市長、財政部政務次長、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	「行政院長」、「中央銀行」總裁。
嚴家淦 (1905—)	江蘇吳縣	1954·6·7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福建省建設廳長、財政廳長、台灣省財政處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總統」、國民黨「中常委」。
周至柔 (1898—1986)	浙江臨海	1958·3·16	保定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	師長、副軍長、中央航空學校校長、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	辭職後奉召回役，擔任總統府「參軍長」，國民黨一級上將，已故。
黃杰 (1902—)	湖南長沙	1962·12·1	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國防部次長、湖南省政府主席、台灣警備總司令。	台灣「國防部長」、「總統府」戰略顧問。
陳大慶 (1905—1973)	江西崇義	1969·7·5	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	師長、軍長、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局長、警備總司令。	台灣「國防部長」，已故。

謝東閔 (1908—)	台灣彰化	1972·6·6	中山大學 畢業	高雄縣長、台灣省政府秘書長、 救國團副主任、台灣省議會副 議長、議長。	第六任台灣「副總統」、 「總統府資政」，國民 黨中常委。
林洋港 (1927—)	台灣南投	1978·6·8	台灣大學 政治系畢 業	台灣省政府秘書、南投縣長、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長、台北市 長。	「內政部長」、「行政 院」副院長、「司法院 長、國民黨中常委。
李登輝 (1923—)	台灣台北	1981·12·5	台灣大學 農業經濟 系、美國 康乃爾大 學農經博 士。	「農復會」組長、「行政院」 政務委員、台北市長。	第七任「副總統」、「總 統」、國民黨中常委。
邱創煥 (1925—)	台灣彰化	1984·6·9	台灣政治 大學研究 所肄業。	銓叙部司長、省社會處長、中 央社會部主任、內政部長、行 政院副院長、台灣省省長。	

封面設計 ■ 王愛玲

ISBN 962-226-176-0

定價三十元正